

EBOOK.COM 游书网
www.eobook.com



赴历史之约

目 录

1	总序	万燕
1	耶拿小组的夜莺	
33	塞纳河畔的火凤凰	
69	哀泣的缪斯	
107	赴历史之约	
132	道德的暧昧性	
175	疾病与负轭作为信仰之隐喻	
214	附录：	
216	后记	

总序

万燕

事情还得从1998年9月20日在河北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说起。那天晚上,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座谈“女性文学与出版”的话题,我刚从门外走进会场,就被主持人提溜到话筒跟前“贡献”点子。脑子还没回过神来,只得硬着头皮上阵,贡献了诸如“女学人随笔丛书”、“女学人评论丛书”之类的歪点子,心想:谁爱折腾谁折腾去吧。

就此搁下不提。

转眼到了1999年初,广州方面有人策划出版“女博士随笔丛书”,向我约稿。后来七搞八搞有点“丛”不起来,要交给书商去操办了。我想,与其这样不尴不尬,不如把自己去年那个歪点子做起来,或许更有价值。恰逢7、8月间身体不适,无法写作,就和出版社张罗起这件事来。

当“点子”付诸实践时,一系列的问题也跟着出来了。

例如“女学人”这个概念的确立。人们会凭思维惯性质问:某某某能算女学人吗?那么,什么样的人算“女学人”?书斋出身有学位者?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自我潜心于某一研究领域却无职称者?不以任何学术为业的学养浸润者?答案非常不确定。

再例如是否只收文学领域女学人的随笔?其他领域的收

不收？如果收了，她们是否能较好地以散文随笔的形式传递双重可能性——即在保有自身领域特点的同时创造散文随笔的独特风采？如果不收，这能算作规模比较整齐的女学人随笔丛书吗？丛书的姿态又应该如何？前卫的？不时尚的？怀旧的？在汗牛充栋的随笔集、散文集里，在众音浮喧的女性丛书里，再增加这么薄薄的十本书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而且，我们和大家一样，渴望也害怕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里面好书成林，坏书成堆，我们的丛书会尘埃落在哪里？

问题确实很多，但是有两点定位最初就很清楚：避开小女人气，避开纯学术性。

站在这两点定位上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图景就变得渐渐明晰起来：为了保有丛书的特征和实质，我们不再执着于“女学人”的内涵和外延，这个词不再受“术业有专攻”的囿限，而是定位于当代知识女性的内在面目，同时注重作者本人的思考、学养和对文化的关注，注重老、中、青三个年龄层面的视野，注重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文化意义，注重多个领域的重要作者和内容。情怀或浓或淡，状态或中心或边缘。

仅以领域的确定而言，我们采取了作者和内容双向互补的方式，形成社会、翻译、文化、历史、艺术、文学六大板块。例如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她本人的学术定位决定了她的大部分随笔要以社会学的形态出现。当她用沉着朴素的笔调谈论“我的女性观”、“我对‘一夜情’的看法”时，实际上已经走出了高深的社会学研究，走进了社会关怀的领地。同样，从事东欧文学译介的崔卫平亦是同一性质，她敏于思辨的特长，借助对中国以外作品和人物的理解，反弹到中国文化本质之

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多元的思考状态。而张文华的“术业”身份没有这么固定,她一直淡入淡出于社会,却长期浸染于文化,对音乐、绘画、自然、精神、文学、人情、学术、人生往事今情的独特品味,奠定了她隽永醇厚的底蕴。艾云也非学历史出身,但她的这本书可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中规模最齐整的一本“课题性随笔”。她以西方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六个杰出女人为题,杂糅了史实、随笔乃至小说的笔法,在事实中想象,在想象中思索,在思索中升华,显得既大气又绚烂。马莉的定位则非常别致,她写诗,办过画展,但是这些表面的艺术形式,远远比不上她的文本的内在艺术状态,她用变幻迷离的语言,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氛围,即使在大量的书话中也弥漫不已。

此外,作为体现文学性质的散文随笔,文学领域的作者自然还是占了较大比重。德高望重的乐黛云先生,以她凝重深邃的眼光纵横古今中外,笔墨所到之处,无不抉幽发微、沉潜蕴藉。当代著名评论家李子云,以数十年不变的诚实优雅,从容辗转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飘扬出令人回味的音色。作家、学人双栖的徐坤,把机智鲜活的面目从小说的“虚”外化为散文的“实”,独特的智慧与调侃渗透在热气腾腾的笔墨之中。至于女性文学专家林丹娅的幽默典丽,则将智性的思考和知性的怡情集于一身,不卑不亢,不张不扬,境界十分深远。

显而易见,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希望由此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纷繁多姿的,同时能够全部归附到知识女性的主体上来。因此,她们个人的情感、经历、眼光也以不同面目定格在丛书之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哲学等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而缺失了。

纵观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化,女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低估。而这些女人当中,有一批自学养出发、自专业领域出发而渗透随笔散文的女人,尤其坚持了自己超然的追求和声音。而这一切,都是她们以女人的身体拥有、感受着的。正如龙应台所言,当她面对社会历史、面对先人古书时,她还必须面对“我是个女人”的体验,这种体验直接反证了当代知识女性的“学养——情怀”之宝贵,这种宝贵可以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作为一套随笔丛书在文化史上最具价值之处。

正是这种宝贵促发了“当代女学人文丛”的诞生和面世,促发了作者们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促发了各种有关插图和封面的奇思异想(插图分色块和线条两种形式,基本上每二至三篇文章配一幅)。这个过程可以用几句老话来形容:“初生牛犊不怕虎”;“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个中情形即约略可见了。

但是,从过程到结果,毕竟是一种流动不羁的形态,其中潜伏着许多变数,丛书的疏漏之处未免影响了策划初衷的逼真再现,这当然是由于我们视野和精力的不足造成的,还望读者海涵。

这套书付梓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很长——跨越了两个千年。这种交织着现代迅疾与古老漫长的时间隐喻性,无疑借学养中的女人的书写,暗示了全部女人命运的缩影。从这个缩影走进,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在生活中,女人与人类历史一致而又不一致的变迁。

2000.2.8 于深圳大学海青楼 201 室

耶拿小组的夜莺

——卡洛琳娜(德)

当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曾盛赞德国。因为她看到的德国,虽然气候总是阴悒湿濡,人们总习惯于在严寒冷峭的日子围着火炉啜茗或是遐想,但那终日蜷曲的生活则培养了人的内向性。内向性首先让男人更添无限魅力。总是紧蹙眉头,眉心打成一个结,面孔肃穆并且不拘言笑,增添着神秘意象。并且,执起批判的武器,通过语言的方式征服和改造世界,给历史留下另一种证明。这样的男人真让女人迷恋。

可斯达尔夫人也没有想到,这些如奥林匹斯山诸神般的男人因了自己的太过坚毅与强大,则将女人覆盖了。太过的热爱,彼此不生任何的间隙与龃龉,女人感到心满意足时,情感在充实以后,那文字的力量却在淡薄和削弱中。其实,有一些失落,男人带给女人不大不小的麻烦,反倒可以使女人因抑悒而生出无穷思绪感

慨，造就出一些文字女人来。当男人强大到把女人整个包容起来的时候，女人只想躺在一个温暖的港湾休憩，那文字的使命就不知不觉会放弃。斯达尔夫人生活的法国，较之德国是更感性的。在沙龙中出入辞藻华赡并风度翩翩的男人，让女人恨也不是爱也不是，恩恩怨怨结结缱绻，却因演绎的万古风流之事，令女人缜密展开的内心更为起伏无定了。法国男人搅扰着女人，令她们时时的幸福又时时的愤懑，但是所有感情的磨砥则玉成了许多的法国女人。男人有狂迷的热爱又有些公子哥儿般的薄幸，则使女人自由摔阖的生命状态达臻极致。即使碧山暮霭，秋云暗重，纵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眉头与心头之事总是男人的赋予，与男人纠缠不清的历史命运使女人发挥着想象力。除斯达尔夫人外，乔治·桑、波芙娃以及杜拉斯等等，优秀的法国女人，通过语言创造了一种辉煌。

并不是说德国没有女人通过语言创造辉煌，后来曾有汉娜·阿伦特以其不逊于男人的睿智与理性为这个国度的妇女赢得过名望与光荣。但在更早时间，其实是可以有女人秉书于史册之上的，但不知是由于早夭的天命，抑或是太过热爱情感的暖融，竟使她只以灵感启迪了男人，却没有留下更多的著述。这就是下面所谈到的卡洛琳娜。但这里仍有一点儿对前面所论的更正。即浪漫派时期的德国男人，好像身上流淌着更热烈沸腾的血。他们不像后来那般仅以冷峻酷傲著称。那时，他们并不是那么冷漠寡淡，其人生旨归和艺术旨趣都与女人热烈的爱情分割不开。他们并没有想到给女人以覆盖以囚禁，而是放女人以充分自由。比如谢林，他对卡洛琳娜的热爱几乎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他也没有那过于阴鸷枭骜的个性而对女人造成压制和贬抑，但卡洛琳娜自己对人事对世界入

木三分的犀利深刻更多表现在与友人通信之时 ,和她随时随地发表的议论里。她不像法国女人那样急于进入历史 ,而只是成为男人生命闪光的部分 ,成为他们灵感和智慧之源。这也许不经意中形成德国女人的共性 :宁愿生活在辉煌男人的身后。或许是卡洛琳娜过早的香消玉殒而使得自己思想的锋芒还未及闪烁便阴阳两隔而入虚无泥土?总之 ,她率然随意 ,并没有留下认真构想的文字和书籍。关于她 ,留下了人的余香 ,也留下种种的遗憾。

她可不是病院的常客

18 世纪末的德国 ,在艺术思想上出现了一批与以往传统大相径庭的叛逆者。这些人不再是启蒙时期精神与理性的拥戴者。这一次 ,德国将见识另一批人 ,这是另类 ,在刀刃上起舞 ,在悬崖边踟蹰 ,时而发出某些颤栗和痉挛的表情 ;但是 ,正是这些人将把艺术与思想从温柔敦厚的暖床引入凄迷之地 ,也同时将艺术与思想引向更深入之境。这里要推翻的是过去所谓的高尚、均衡、雅致当然还有自制 ,这就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和浪漫派。

对于这秉持新的艺术主张和独异生活形态的人 ,有人则不那么友好的形容为浪漫主义的病院里收容的古怪人物。比如写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勃兰克斯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这病院有那么多古怪人物 :一个患肺病的兄弟会教徒 ,带有亢奋情欲和神秘渴念的诺瓦利斯 ;一个玩世不恭的忧郁病患者 ,带有病态的天主教倾向的蒂克 ;一个有天才的反抗冲动 ,以《路琴德》一文惹恼寻常观众审美趣味的弗路德里希·施莱格

尔；一个被监视的梦想家，沉溺于半幻境中的霍夫曼……

你尽可以把他们形容为古怪甚至是可厌的人，他们的确是破了生活的和谐与生命的正常，但同时他们也破着生活的固着与平庸。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是在金蛇狂舞的时刻，一向滞重沉郁的德国民族，因了浪漫派，其民族肌体被注入了一种狂烈而直感的新鲜液体，逼使她沉迈的旧皮哗哗脱落。

这里有一个女人则不是病院的常客，她那样健康明媚，风情万种。她被形容为“耶拿小组的夜莺”。她无疑是此时浪漫派的中坚，这就是卡洛琳娜。并且，她和这个时期这个派别中的两个都极为出色的男人有婚姻的联系，这两个男人分别是威廉·施莱格尔与谢林。其中她与谢林的恋爱与婚姻更是令后人无可释怀。

先说威·施莱格尔。他与弗·施莱格尔是兄弟俩。弟弟弗·施莱格尔以其感性的极为锐敏见长，他的《路琴德》是当时震撼不歇的一本违忤传统却又立意崭新艺术新颖的小说。而哥哥威·施莱格尔则稳健持重。他的建树多在理论上以及译介上。是他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由英国译介给德国的读者。1797年，三十岁的威·施莱格尔发表了她的莎士比亚译本的第一卷。接着还有另外卷本的陆续发表。在这些译著之后的评论和研究性文章中，人们总能发现一种女性情感的流露，这是从施莱格尔的其他作品中所不常见的。

这是卡洛琳娜的手迹。

卡洛琳娜(1763~1809)与威·施莱格尔1796年结婚。她出生在一个著名的东方学教授的家庭，二十一岁时嫁给了拜梅尔医生。四年后这位医生去世，她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人们并不认为她是一个绝色美人，可她却具有独特的魅力。

仿佛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了她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要充当起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女人被赋予特殊使命和享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崇拜爱情是其运动的重要核心,这又是将幻想变为行动的重要手段,女性在这时必然的成为男性艺术创造的酵素、拜倒的对象,同时又是他们并肩战斗的伴侣。比如在弗·施莱格尔那部引起毁誉截然两种不同评价的小说《路琴德》中,通篇呈现着浪漫主义艺术的主张和实践,那即是:享受快乐是大家的平等权力。此时男人被确定为刚毅勇敢的标准已不再是清心寡欲中的建功立业,而是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快乐,而且也要使女人享受快乐,施莱格尔毫无忌讳地说道:“高度的艺术嗅觉存在于性冲动之中。”小说在谈一个男人也即作为一个英雄发育成长的历史,青少年时期,他身上炽烈燃烧着无对象的爱情之火,这破坏了他的肌体。后来进入恋爱阶段,他渴望可是又害怕使自己心爱的姑娘失去童贞。因而在关键时刻什么都没有做,而姑娘好像对没有把她引诱到底感到不满意。后来是接近“半上流社会”的妇女,他与朋友的女友陷入爱情无可自拔,然后又与别的女人发生爱情。到最后,他终于找到的安宁和归宿是与成熟心智和肉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使他感到愉快的事是性欲热情的奇异一致以及从彼此占有中得到的相互快乐。

当时的时尚充满革命意喻。胸怀裸露着,衣服讲究东方式的宽大。在一些最出色的少妇中间,情调推崇放荡。当时的路易斯·费迪南王子的情妇之一保·维泽尔的美丽风流在街衢里巷为人谈论。政治家兼哲学家洪堡曾步行几十里路去看她。而那个莽撞的王子对她也是爱得要命,频频书信中散发

着烫人的热焰。苍白忧郁的蒂克也为她留给自己的深刻印象隽怀不已。那是浪漫主义时代,也是思想观念革命与解放的时代。施莱尔马赫曾在当时的一份重要刊物《雅典娜神殿》上发表的片断《为贵妇们所拟的理性问答》中,号召妇女要冲破性别束缚,他甚至非常惊世骇俗地提出,许多尝试都是必要的;“如果把三四对夫妇聚在一起,并且允许互换配偶,那么真正的好姻缘就可以出现。”再比如弟弟弗·施莱格尔同多罗特娅结合不久,费希特便走入他们的生活。三个都很高兴住在一起,费希特甚至计划永远这样过下去。他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正设法劝说弗·施莱格尔留在柏林,同时劝说威·施莱格尔同他太太也迁到这里;“如果计划实现,我们,也就是施莱格尔兄弟、谢林(也一定得把他找来)和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家庭,租一个大寓所,雇用一个厨子,等等。”但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原因在多罗特娅与卡洛琳娜不和。

这就是当时浪漫派对爱与欲重新认识,它在肯定人性中积极的冲动,不再是清教徒式的仅仅局限于精神范畴的思念和眷顾,而是将人的绝对激情放在纯粹的肉身敞开中。尽管不少人对这种远悖传统常规的言行充满驳斥与诋毁,但是,思想以及感情正是在种种不规则形式中迅速展开和发育。

那么此时,那种心智和肉体的力量都十分孱弱的女性已不再是人们为之崇拜的,美丽已不再是惟一的对女性称誉的标准,青春年少也不再拥有被首肯的价值。而像卡洛琳娜这样的女人,却在不知什么时候准备停当,她正躬逢其时,准备出场。

卡洛琳娜必然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宁馨儿。她天性聪颖,感觉敏锐,善于交往,而又有那种略带狡黠与邪恶的能量交融

一起带出的魅惑性,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她成为社交界的灵魂。她使男人为之倾倒,使诗人和哲学家获得灵感,她总是被爱慕的气氛所笼罩,她勇于面对自己的命运而不计后果,而这正是浪漫派女性所特有的气质。

关于她,也有一些恶意的传闻,有人称她是“魔鬼夫人”。但弗·施莱格尔在《路琴德》里对她的描述是:

“她天性中具有女性所特有的那种高雅和优美的气质,一切都是那么神圣但一切又不那么温驯,不温驯中糅合着雅致、文气、女性的温柔。其中的每一个特点都得到了自由的、强有力的发挥和表现。每个特点又好像是惟一而不再重复的。然而这是各种品质的丰富而奇妙的结合,而决不是简单和杂乱的拼凑。因为它是激发的灵感,是生机勃勃的和谐,是爱。她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以一个真正演员的表现力精细入微地表演某一个喜剧情节,又能用娓娓动听的音调迷人地朗诵崇高的诗句。她时而以卓越的才干吸引整个社交界,时而又整个身心充满灵感,时而像一个温柔的母亲那样庄重、谦逊而友善地规劝和帮助别人。任何一个普通的情节,由于出自她之口,再加上她讲述的风度,都会变成一个美妙的故事,令人神往。她极其敏感而聪颖,对周围的一切她都怀有兴趣,经她富于创造性的双手安排的一切以及从她甜蜜的口中讲述的一切,都变得十分高雅。任何一种善良和崇高的作为,对她来说,都不会神圣或寻常到影响她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其中的程度。她

对每一个暗示都心领神会,即使问题尚未挑明,她就已能做出回答。”

写这些的弗·施莱格尔是卡洛琳娜孩子的教父,他也爱上了卡洛琳娜,然而那时她已是其兄的未婚妻,否则,她会成为他的情妇。这一切我们又可以在《路琴德》中有所发现。

威·施莱格尔在格廷根大学时就认识了卡洛琳娜,并爱上了她。可她当时拒绝了他的求婚,他们的交往不久就中断了,但还有书信联系。后来又经过一些年月。卡洛琳娜结婚生子,并且丈夫去世,再后来,卡洛琳娜因受到不公平的嫌疑而被捕。她在狱中写信向施莱格尔求援。由于他的交际关系和她自己兄弟的奔走,终于弄到一份释放令。施莱格尔以其固有的安详和骑士风度,将见弃于众人的卡洛琳娜托付给他的弟弟照顾。弟弟起初对卡洛琳娜认识一般,并且还抱有成见,但随着认识的加深,他差一点陷入与卡洛琳娜的爱情中。这就有了我们在上面见到的他在小说中的动人描摹。弟弟知道哥哥对她的感情,他不能卷进去,而退出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他坦率而又于无奈中克制地说:“我根本没有预料到那种纯朴和真正神圣的诚实感……她给了我一个非常生动的印象,我渴望争取她的信任和友谊,但正当她似乎表现出若干同意的時候,我便非常确切地看出,单是想尝试一下便会引起最激烈的斗争,而且如果我们之间可能形成一种友谊的话,那也只能是许多次荒唐努力的晚熟的果实——从此,每一个自私的欲望都被放弃了……我现在同她保持着最单纯、最质朴的关系,像儿子一样敬畏,像兄弟一样坦白,像孩子一样天真,像陌生人一样无所求。”

1796年,哥哥施莱格尔同卡洛琳娜结婚。

多年前向她求婚而遭拒绝时他对她怀有的强烈感情于今已为新的平实亲切的感情所代替。卡洛琳娜想必也是如此。她原本拒绝的这个人,在她生死攸关的时刻救了她,她嫁给他,当然不纯然是出于感激,爱在这里面当然是不浅的因素,但他们终归还不是那种完全默契和完全的心灵占有,这就为那个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依卡洛琳娜的才华,在耶拿,当时所有知名人士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耶拿小组”正式的形式和命名恐怕与卡洛琳娜的在场有很大关系。人们那时是那么的年轻和英姿勃发,还没有出现消极和懈怠的种种中老年的特征。人们渴望和欢呼爱情,崇拜女神,卡洛琳娜以其才智和风情必然成为这个圈子的魂灵。在那时,她同歌德、赫尔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蒂克、施莱尔马赫和哈顿伯格等人经常往来。歌德正是在这一时期同这个年轻的流派发生着亲密的关系。卡洛琳娜常常是同歌德一起吃早餐,而同费希特一起吃晚餐。

浪漫派正在形成中,它的各个不同的成员第一次在耶拿聚会,自此,耶拿小组成立,浪漫主义开始在德国滥觞。

卡洛琳娜在这个圈子里起的什么作用,人们日后只能从与别人对话的记录和她与友人的通信中见出。但无疑她是这个圈子真正的缪斯。卡尔德隆和阿里奥斯托和天才的翻译者格里斯,把她奉为“所认识的最富有才气的女人”。斯特芬和洪堡也有类似的说法。许多男人承认:她理解每个细微的暗示,她甚至能够回答没有说出来的问题。向她发表长篇大论是不可能的,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对话。而当对话越来越有兴味的時候,她脸上就有聪明的眼神和可爱的表情,演奏出永远

新鲜的音乐。读一读她的书信,就仿佛看见了这些眼神和表情。她的信写得那么透彻和亲切,就仿佛在同通信者面谈一样。凡是只知道她的这一面的人,可能认为她仅仅是可爱,认为她将成为一个迷人的女演员,认为她那些典雅言词只要添上韵律就会变成精美的诗。然而,就是这个女人,她在任何必要的时刻,都能表现出最惊人的勇气和精力;而且,正是她的性格的这一方面,形成了她用以评判男人的高标准。

弗·施莱格尔在《路琴德》中写下的这些话,为日后人们进一步了解卡洛琳娜提供了真切的形象。

第二次婚姻中的卡洛琳娜无论灵魂还是形式都置于耶拿浪漫派的中心。她将自己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帮助丈夫。威·施莱格尔在谈到他的一些文章时说,它们“有一部分出自一个才女之手,她要当一个出色的女作家,才能绰绰有余,只是她志不在此。”

那么她志在哪里呢?

这时候的德国女人,显然还没有走到20世纪上半叶汉娜·阿伦特那样的状态。此时的18世纪末,德国女人还更多地沉溺于爱与被爱中,她们的卓越才华都表现在爱上。那时的爱情是人们头顶照耀的辉煌的太阳,并不像后来的人们为它加上太多滞重复杂的方面。女人在爱情的庇护下,欣欣向荣。卡洛琳娜还不想用不顾一切的投身于写作的方式来获得一场历史的证明。她总被男人簇拥着,她甚至连孤单感也被剥夺了,她几乎啜饮不尽爱的美酒,她只要出场,用她有力的语言和与友人自由舒畅的通信就把心头的所想表达和渲泄了。她要成为一个女作家其才华当然是绰绰有余,那资质可属上乘,可她似乎更倾心于恋爱的事业而不是写作的事业。原本施莱

格尔的爱不会使她那般专心所属,日后也许会因过重的失落感成就她作为写作者的身份,可贺也同时可惜,一个使她完全投放爱的对象的那个人出现了。她领受了自由解放过后,那自己想要恪守的古典与绝对同一的爱。她不想再想入非非,从而因感情的沉溺而遗忘了另一场历史的嘱托?当男人太过坚毅和伟大,女人的倾慕变得毫无条件。比较起来法国男人虽然也是那么热爱女人,却又无法忠诚不贰,他们总有追花逐蝶的好奇与游戏状态,女人在格外沮丧绝望时,必然的要借助语言将自己救渡出来。后者使她们感觉的是更牢固有力的托撑。德国女人在情感上获得终生庇护的幸运,之于历史,她们则是悄悄地躲开了。她们要寻找那暴风骤雨般的感情,要理解世界斑驳陆离的那一面,可表达的冲动并不是那么强烈。

卡洛琳娜应该留给历史更多的东西,她却因为那爱太过自足而把别的毫不怜惜地放弃。

“因为你身上有诗”

有一颗新星即将升起。

浪漫主义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哲学家谢林。这时,二十三岁的谢林已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并且他的哲学思想逐渐显示出新的、比费希特在当时还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1797年谢林在莱比锡潜心钻研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这一年对于形成浪漫主义的新的思想潮流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浪漫主义者曾经有过一段对费希特的迷恋。他曾因注重个人创造潜力和他学说的道德感染力而受到浪漫主义者的赞颂。但后来,费希特准备牺牲活生生的生命方式来实现其道

德格言则又使人不满起来。因为后来浪漫主义者更推重的是强烈的个人感受性以及道德的非优越性。而现在,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思想与浪漫派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赞同浪漫派的许多信念,分担他们对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理想的失望,支持他们企图在哲学、科学、艺术中寻找精神生活的新途径。而且谢林身上的诗人哲学家气质,他对艺术和诗歌的兴趣促使了他与浪漫派更进一步的接近。他有时会去参加耶拿小组的聚会,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卡洛琳娜,卡洛琳娜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谢林。

谢林很快给卡洛琳娜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在写给弗·施莱格勒的信中称他是一个“穿透墙壁的人”,随后她又补充说:“请相信,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比您想象得更有趣的人物,具有真正天然的气质。如果拿矿物相比,他是真正的花岗岩。”对此弗·施莱格勒写来一封戏谑的回信:“谢林这个花岗岩能在何处找到一个与他般配的女人?她至少应该是玄武石。这决不是空话,我觉得他恋爱的本事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谢林恋爱的本事对于破坏弗·施莱格勒哥哥的家庭幸福则绰绰有余。

她发觉自己爱上了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人。这一年谢林二十三岁,而卡洛琳娜已经三十四岁。这没什么,那一时期,女人比男人年长许多绝不会成为恋爱的障碍,它甚至已成为新的时尚。当时在法国,已有评论界提出对青春和美貌如何认识的问题。于尔·贾南以形象的笔墨写了这些:

过去,就小说和戏剧来说,三十、四十岁的女人都被认为不会再有任何可能发生爱情,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新的广阔的明媚天地的发现,她在戏剧和小说里占有了最高的统治地位。

新世界代替了旧的世界，四十岁的女人代替了十六岁的少女。

“谁在敲门？”戏剧以深沉的声音问道。

“是谁在那儿？”小说以更温和的语调问道。

“是我！”十六岁的少女以颤抖的声音回答。她的牙齿像珍珠，胸脯雪白，体型柔美，带着明朗的笑容和温存的目光。她接着又说：“是我。我和拉辛笔下的朱丽、莎士比亚笔下的戴斯德梦娜、莫里哀笔下的阿格涅斯、伏尔泰笔下的扎伊尔属于同一个年纪。是我！我和阿里奥斯特、勒萨日、拜伦和司各特书中的年轻姑娘们属于同样活泼可爱、让人高兴的年纪。是我！我是天真的少女，满怀希望，对未来抱着极其美好、无忧无虑的态度。我处于思想纯洁、动机高尚、高傲而又天真的年纪。先生们，让我进来吧！”十六岁的可爱的少女对小说家和戏剧家们这样说。但小说家和戏剧家都同声回答道：“孩子，我们正为你的妈妈忙着呢；二十年后再来，那时我们再看是否能给你派用场。”

戏剧家和小说家会这样说：“谁更有故事？那个只会哭、爱、叹气、希望和颤抖的小女孩，我们能把她写成什么角色呢？那些三十多岁四十岁的女人，她不哭，只抽泣，她不叹气，却会发出如狼般痛苦的叫声；她不爱，她已识破爱情真相，只让爱慢慢消磨自己，她不微笑，她发出意味深长的声息，她不做梦，却只行动。只有她们能爱能恨，能受苦也能思考，她们才能创造声情并茂的故事，演绎无数动人心扉的情节。”那时的人们说：“在十六岁少女的心里找不到爱情。”

法国的时尚是如此，同一时期的德国的浪漫派运动当然是最好的共鸣之和声。卡洛琳娜正值充满玄奥莫测故事的年龄，她没有想过年长于谢林会成为对她向往幸福生活的一个

阻碍,她有绝对超越世俗判断和普泛价值的勇气,更何况,人们那时已不再想到要娶本分但却寡淡乏味的女人为妻,而是渴望在同一等值的精神向度里创造崭新的不会枯竭的爱情生活。夏洛琳娜为此有充分的信心。

她爱谢林,可此时她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谢林对她的诱惑力竟然无动于衷,这使夏洛琳娜感到嗔怒。有人向她传达了他的话,他决不让自己受到引诱。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也更增加了她的好奇心。她向诺瓦利斯倾诉说:“说到谢林,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态度更强硬的人。我们在一起,几分钟不说挖苦话,就难以相处。然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毕竟是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所以我总想更多地见到他并且使相互之间能够更信任些。他总是对我和对施莱格尔家中洋溢着的那种戏谑气氛表示赞赏。然而由于他天生不那么开怀,所以他不能马上体验戏谑的愉快方面。紧张的工作常常妨碍他与人交往。他不能肤浅地闲聊或与人瞎扯,所以他身上总有某种拘谨成分,至于这种拘谨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我还一时猜不透。前不久我们庆祝了他二十四岁生日。他当然有足够的时间变得更温柔些。”

她在等待。

早在1799年春天,谢林就开始在威·施莱格尔家入伙吃饭。但是他留意的不是家庭女主人,而是她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儿。此时的夏洛琳娜已三十六岁,她的女儿奥古斯达已经十五岁,正值初蕊般楚楚动人的年龄。谢林当时绝不会想到恰恰是年长于他的夏洛琳娜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他的终生挚爱。他现在还那么年轻,也还更容易被新鲜的景致所吸引。女儿奥古斯达是个害羞的姑娘,但她很有性格,也已见出斐然

文采。她对他的殷勤并不领情,并且敢于当面顶撞这位教授。但后来奥古斯达还是与谢林要好,但这是一种女儿对父亲那般的爱。她从小丧父,对继父她总觉离心离德。她在仿效她的母亲,卡洛琳娜对在磨难中帮助她的第二任丈夫的感激之心并没有化为爱情,并且感激也很快地消失,他们之间开始变得冷淡。

在奥古斯达被送到外地熟人家里去的几个月里,卡洛琳娜终于找到了通往谢林的心灵之路。谢林不可能不为她聪颖的头脑和出众的才华所折服。她此时已参加了浪漫派的一切尝试。她写稿改稿,发表匿名评论,并且时而执笔,时而间接地对别人施加影响。她原来就有甚至比男人更强烈的政治革命热情,此时,在文坛的争辩论战中,她又重新找到另一种施展抱负的天地。

谢林正热烈从事初期的著述,焕发着激情,闪耀着天才的光芒,而且是歌德的宠儿。他一开始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卡洛琳娜身上,而她则把心思放在了他的身上。这个罕见的妇女为他所沉迷。在她终于得到了谢林之后,她曾给远在外地的女儿写信,不禁炫耀起自己的成功:“你最近一次讲谢林的那些话是不恰当的。如果你真要大发雷霆地反对他,那么我会认为你是在嫉妒自己的妈妈……我告诉你,正像谢林所证实的那样,他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他暗地里在我的帽子上插了一些我非常喜欢的黑羽毛。但愿你能想一想,我当时竟是那么腼腆。”

亲朋好友们开始发现,施莱格尔家中正酝酿不愉快的事情。一些风言风语正在流传。费希特不无担心地从柏林写给自己妻子的信中说,请留心谢林和施莱格尔。我请求你看在

我们爱情的份上……谢林在搞臭自己的名声,我为他感到惋惜。假如我在耶拿,我会规劝他的。麻烦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当事者总以为人们似乎什么也没发现,因为在丑事没有公开之前人们是不会说什么的。难道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把事情从此了结?

费希特是真的为谢林好,还是将他们已露端倪的思想分歧带进对生活事件的过激判断里?但谢林不可能就此了结,他已深陷其中。年轻的男人那涌动的爱清澈纯洁而又坚定无畏,这使卡洛琳娜不仅感到震撼,而且也收起自己平时的戏谑放任态度,为这场感情投注着少女般单纯的热情,可又比少女有着更深刻有力的理解。这里,还有一个偶然性却又是悲剧事件促成了谢林与卡洛琳娜的这场恋情,这就是卡洛琳娜女儿奥古斯达的不幸亡故。而浪漫派的敌人利用这一悲剧炮制了一个小册子,宣称是谢林用他疯狂的自然哲学和他所推荐的药方杀死了这个孩子。这当然是纯属子虚乌有的造谣。通过这个令人悲哀沉恻的事件,谢林与卡洛琳娜因悲伤,因无助被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更感到人世无常的虚空,孤苦的心都渴望深深的慰藉,又加上卡洛琳娜对谢林已经有的那般的倾慕,他们终于走拢了一起。

他们陷于被攻讦之中。尤其卡洛琳娜丧女之痛和对新的处境已不能从容裕如地对待,1800年3月,她的状况变得很坏,精神和身体都需要疗治,这一年,她决定去有矿泉的地方疗养,谢林不久便在那里与她会合。

那么,威·施莱格尔在这里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被遗弃的丈夫?谢林的情敌?显然,浪漫派对爱情的放达观念在这时派了用场。施莱格尔当然不快,但他所持的态度是宽宥谅解。

当谢林与卡洛琳娜变得难舍难分,并且决定把她原有的婚约解除时,施莱格尔极其豪爽地表示同意。不仅如此,他还同谢林继续保持极其友好的通信。这两个原本是情敌的男人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还互相以言行支持帮助对方。而卡洛琳娜在施莱格尔早已注意到她与谢林极不寻常的关系之后,她与他也仍然继续着十分情谊的往来。

她甚至让他仲裁她与谢林之间的某些争论。例如,她在1801年5月给施莱格尔写信道:“请仲裁一下谢林和我之间的如下争论:可以这样来写六步句吗?我认为最后两行写得很笨,他却坚持要那样写。”施莱格尔后来甚至还陪着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慕尼黑去拜访过这一对夫妇。这显然是后话了。这由此可以理解浪漫派的理论及其在头面人物生活中的应用。哪怕是再严重的个人纠缠和恩怨,也不能拆散这些由于思想一致,以及争取共同斗争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不可让步的。既这样看待别人的自由,也为自己要求这样的自由。

浪漫派所要追求的是新的伦理基础。有许多这样的离经叛道之理论,谢林与卡洛琳娜不过是身体力行罢了。况且他们一旦相爱,那本身是何等谨严与古典。比起施莱尔马赫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主张,他们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施莱尔马赫的文章总显得乖张不已。他每每痛斥贞操的观念,认为这是偏狭与陈腐,是普遍的荒谬。他认为人身上的一切精神性恰恰都是从一种近乎本能的、模糊不清的内在冲动开始。他认为作为人生最高性能的爱情,经过第一次最轻微的感情尝试,就可能达到圆满的成果吗?难道它比吃喝这类简单技巧还要容易吗?他质疑。爱情需要初步的尝试,但不会从中得到永

久性的成果,但是它却使感情更加明确起来,使爱情的前景显得更加伟大和高尚。施莱尔马赫说,真正的爱情是由此可以完成自己气质的那种,并且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优美而可敬。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说是永恒的了,它是最后一次也是最美的一次正当结合,再采取任何观望和逡巡的态度都是矫揉造作的了。但是,如果找不到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就不一定非要在一定的对象身上发生关系,因为那像一阵过眼烟云,它不久就让位于另一种更明朗、更深切的情感了。爱其实充满了尝试性,然后如梦初醒、难以为继。而只有割断这场关系,才可能对这场尝试进行回忆和思考,并且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当初的憧憬和感情,但这将是为另一次的更好的尝试做准备。施莱尔马赫禁不住发问:“难道有什么义务,非要在同一对象身上进行这另一次尝试不可吗?这种义务的根据又在哪里呢?”

这是典型的反道德倾向,也就是要推翻一切的实用法典,那维护人类幸福的天才可以也必须把那本邪恶的《圣经》上的每一页都撕掉,人们才能读到他们心中的题词。用僵硬的胸衣和盛装打扮起来的道德,如果朝向自然的镜子照一照,将会怎样为自己可憎的形象感到惊愕啊!

观念已经不成问题,关键是谢林和卡洛琳娜都认为他们彼此的爱可以令自己的气质发生更好的变化,也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优美和可敬。没有什么能够阻遏他们的结合。

卡洛琳娜可以成为男人灵感的源泉,她不着意著述,但信件是她智慧生活最好的表现。她用大量的时间写信,即使对于近在咫尺的朋友,她也更喜欢用书信的形式表达思想与情感。她当然不会放弃与谢林的通信,她在那里既有火辣辣的

情感：我的心，我的生命，我自己的一切都在爱着你。对此你不必有丝毫的怀疑。昨天施莱格尔把你的信转交给我，那一刻我感到多么光明多么幸福。”但她另外的信则见出一个评论家的真知灼见。虽然这是她拿谢林和费希特相比较，不免有偏爱她的心上人之嫌疑，但她充满细腻和准确的判断力则跃然纸上：

最亲爱的朋友，你大概不会希望我来告诉你，费希特的精神境界究竟扩张到什么地步，虽然你几乎这样表示过了。尽管他具备不可比拟的思想力，有条不紊的推断方法，行文流畅而又确切，并有自我的直观和一个发现者的热忱，我总觉得他还是受到局限的。其所以如此，我认为，不过是由于他身上缺乏神圣的灵感。如果说你冲破了他无从挣脱的圈子，我相信你不是作为哲学家——如果这个名字在这里用得不恰当，请不要见怪——才做到这一点，而毋宁是因为你身上有诗，而他身上没有。诗引导你直接走向创造，正如知觉的敏锐引导他达到的彻悟。他有最亮最亮的光，而你却有热，光只能照明，热却能创造。——我不是很巧妙地看到这一点了吗？就像从一个钥匙孔里看到一片无限的风光。

这些话于今看来依旧会令无数掉书袋子许久仍不得要领的男性评论家汗颜。她判断的清晰与准确，还有辞藻的形象、幽默和美妙，可谓评论文章中的妙文。

她把她的才华都放在书信中。在她书信的另一个地方，

还可以看到她对黑格尔的一段有趣评论颇不符合一般人对这位哲学家的印象：“黑格尔在扮演情郎角色，到处向女人献殷勤。”在另一地方，还见出她对蒂克一部小说所做的尖锐中肯的评论。她的感性思维丰瞻，理性判断又是那般如斧凿般确切，她作为一个诗人或一个思想家都的确是绰绰有余。只是她志不在此。

“上帝把她给了我，死亡不能把她夺走”

谢林要到耶拿大学任教。他暂时得与卡洛琳娜分离。在离别时他们商定互换戒指，谢林很快就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戒指寄来。她深为感动，她认为这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真正的订婚戒指。她对谢林充满了爱，但对施莱格尔并无愧疚，有的只是如兄弟姐妹般的关爱。她不希望他再为她与谢林的事烦躁不安。她说：“我不再否认他是我的朋友，可是我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越过这条已经商定的界限。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誓言，我将恪守这一誓言，因为我已经把他当作我孩子的弟兄放置在我的心间。”并且她与施莱格尔的通信继续进行，并且比先前更真挚、更坦率和更素朴的形式展开着。当男人女人不再为感情之事而受折磨，当他们坦然以朋友之谊相处时，那些内在的精神性东西则又回来了。卡洛琳娜在同一天内给谢林和施莱格尔写信。她写给谢林的信是拿他同费希特比较，从而肯定谢林因诗意而具有的热量与创造力。而她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又继续这一思路，阐释诗意是每一个不免一死的人相依为命的东西，这是她对谢林的热爱，对施莱格尔信赖的思维呈现。她的才华只愿意表现在信件

中,她不厌其烦地写信,信使她的对谈更自然也更舒展,她的信读起来几乎是字字珠玑。她对施莱格尔写道: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艺术作品更真,批判照常进行,躯体正在腐烂,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世界在某一时刻会像小纸片那样突然燃烧起来,那么只有艺术作品才会是走向神的世界的最后一些火花,只有在它们熄灭之后才会出现一片黑暗。”

愈加的了解,使卡洛琳娜与谢林不仅是灵与肉的水乳交融,而且是在思想旨归上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此时,谢林与费希特的哲学论战已经开始,费希特新近出版了一部著作:《就最新哲学的真正本质向广大读者作太阳般明晰的报道》,谢林与卡洛琳娜一起嘲笑这个自负的标题,一首嘲讽诗瞬间拟就了。模拟柏林一个智者写给自己读者的方式:

你不要对太阳的光辉表示怀疑,
你也不要对星辰和黑暗表示疑义,
你只能相信我的话:
我是智者,而你是傻瓜。

她告诉施莱格尔,这首即兴诗的基本思想属于谢林,而最后一行则是她写的。

谢林现在不仅感情上充盈美满,而且已经在哲学上展露锋芒。在他与费希特不同的哲学论战中,他渴望一个同道,这样,在一个论述他与费希特之区别的著述者中,他惊喜地发现

了黑格爾的名字。这是他在图宾根神学院时同住一个寝室的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同学是诗人荷尔德林。

黑格爾在謝林的視野中已消失多年，直到1800年才重新露面。他在作長期的家庭教師之後，似乎已經在暗中做好了充分準備，他將在不久的將來創造出他龐大的體系。並將對德國造成新的震撼，那如巨人一般的光芒將照耀在德意志的上空。但現在，他還是處境蹙迫。他比謝林年長，却絕沒有謝林這般的名望和地位。他現在迫切需要一個更好的學術環境，迫切需要繼續自己的學業和已經開始的學術研究工作。他從法蘭克福給謝林發來了一封信，講明了他的想法。謝林當即向這位大學時代的好友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他轉到耶拿並把他安置在自己的身邊住下，作為一名副教授開始上課。黑格爾的哲學處女作《費希特和謝林哲學體系之間的區別》就出現在這一時期。顯然，黑格爾是站在自己的保護人這一邊的。

對謝林來說，黑格爾是他的一个重要發現。此時的黑格爾，已三十歲了，似乎在學術上還不見作為。但他勤勉、毫不自負的個性，還有反對費希特，這使謝林覺得他是最好的志同道合的戰友。並且，還有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及其互補。兩人的才能不同，謝林產生思想，而黑格爾能把這些思想加以深化，使之貫徹到底並形成體系；兩人性格也不同。謝林是個感情沖動的人，而黑格爾則相當理智。但正因為這差異構成了友誼的基礎，謝林稱譽黑格爾是“內心散文和外在散文的純粹典範”，而自己則是太過詩意了。他需要一個具有清醒理智的人為伴，猶如浮士德之需要靡菲斯特一樣。他們在一起創辦了《批判哲學雜誌》，這上面刊登的文字不署名，但兩位編輯也

即是作者，不请外人撰稿。后人无法分清那上面的文章究竟出自哪位哲学家之笔。

谢林生活与感情的幸运并不能排除掉他要应对的许多哲学论战和人生诽谤。关于卡洛琳娜女儿奥古斯达之死责任的追究又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的敌人继续攻击他是此次不幸的罪人。诬陷之辞，流言蜚语之中，他又一次想到向他的原本是情敌的威·施莱格尔求援。

他们的关系似乎是难以理喻的。在爱情上是情敌，在斗争中却是战友。他对谢林对自己家庭的介入不可能不反感，但他不会将私事与公事搅到一起，在关键时刻，他肯定会向谢林援助。他安慰谢林不要折磨自己，把奥古斯达之死归罪于他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施莱格尔保留着她的病情及与死亡有关的全部材料，其中也有谢林的处方。从处方上看谢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然后，施莱格尔写了痛斥对谢林诽谤的小册子，给谢林以支持。

斗争在继续着，生活也在继续着。卡洛琳娜与谢林几经磨难，终于在1803年6月正式结婚。她到了谢林从小生活过的地方，卡洛琳娜深情地对自己的女友描述道：我看到了一切，他曾经靠奖学金生活和苦熬的地方，他在这里获得了硕士学位，内卡河在他的窗下流过，河上漂着木筏，我听到了各种古老的传说，他用温柔动听的语调给我讲述了这些，我到了他度过童年的贝本豪森。

1805年4月，谢林出发到慕尼黑争取到任命，卡洛琳娜暂留维尔茨堡。有一封保留下来的他写给她的信的结尾是：“到你的朋友身边来吧，没有你，他就郁闷不乐。我的天下无双的、心爱的永恒的情人。”

他们曾去见过谢林的双亲，他的父亲对卡洛琳娜表示好感，还因为她是他认识并尊敬的著名东方学家米哈艾里斯教授之女。

在卡洛琳娜暂留在维尔茨堡的时候，她给谢林写去充满爱和体贴的柔情缱绻的信。也会缕述琐屑之事，比如，他只带走十一件浆洗过的衬衫，一件留在家里了；“愿你的细心不要担忧它丢失了”。听到有关爱慕她的凯列尔教授的谣言，就立即澄清：他常常傍晚来访，但遵守礼节，只逗留到九点半以前。让谢林别为钱操心，卖掉家具后，她会有足够的盘缠去慕尼黑的。她还传递对丈夫极为重要的消息：费希特的新著《论学者的本质》出版了，据发表的书评判断，书中包含着对自然哲学的攻击。卡洛琳娜摘出有关引文，替他在慕尼黑如何行动出谋划策。“在那里努力成为当地人。我的谢林待物愈自如，他就愈能像太阳一样征服善与恶。”

谢林在卡洛琳娜温馨的爱的氛围中，可以忘却一切的烦恼进行阅读、写作和战斗。他有推动之力，觉得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并且，他终生都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战胜人间首要的恶——死亡。

殊不知，平地起风雷。那最大的恶此时却是张开魔鬼般的大口向他心爱的人袭来。

1809年9月7日，卡洛琳娜猝死于风华正茂之时。此时他们结婚已有六个年头。

在此之前的若干天，一天傍晚，在谢林父亲的房里，他们夫妇两个凭窗眺望风景。她忽然说：“谢林，你信吗？我将死在这里。”他怎么也不会作此设想。她非常健康，而他久病之

后却很虚弱。由于他必须休养、解闷，他们来到了马尔勃隆谢林的父母这里。他们想在春天实现计划已久的意大利旅行，新的奥法战争耽误了他们。慕尼黑变得很不安全。政治告密与迫害的气氛使夏洛琳娜深感苦恼。两个月来，她护理有病的丈夫，而现在8月中旬，他终于能下床了，他们便出发去符腾堡。

尽管天气不好，他们还是常常步行。9月初，旅行三天之后，他们回到家里，夏洛琳娜突然感觉很不好。谢林请来本地医生，诊断出是痢疾。母亲得的是把女儿带进死亡的同样的病。那时候，痢疾都会死人，如今看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但历史是无法超越的。谢林派人到斯图加特请已成名医的弟弟。但一切太迟了。

最后的日子她很平静，既不感觉到疾病的淫威，也不感觉到死亡的逼近。她像她一直希望的那样死去。最后那个傍晚，她变得轻松而快乐，她那多情的心灵重放美丽光彩，她那动听的嗓音宛若音乐，灵魂飘浮在那应当抛弃的躯壳之上。凌晨，她睡着了……安静，毫无挣扎，表情明朗，表达出内心的宁静。她那样躺着，谢林的泪水潸潸滴在她的遗体上，他没有料到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望着她，谢林感到宽慰，因为她的脸是那样开朗。但他却不得不和这张脸告别，他不得不把他心爱的人送去坟墓。

夏洛琳娜有巫术一般的能力，可这次，她确实是被自己的讖语说中。

如她希望的那样，她被葬在马尔勃隆，在大教堂的一侧。那里至今还矗立着墓碑，碑上可以读到已被几度风雨侵蚀了的隐约可辨的哀戚的墓志铭。那是谢林的立碑，上写：“为纪

念忠贞不渝的爱妻”，而立碑者是“彼之鰥夫谢林”。那上边还刻有谢林写于生死两界的永远记忆与怀念：

上帝
把她给了我
死亡不能
把她夺走。

谢林却还是感觉到了上帝把她带走以后巨大的真空，感觉到了自己孤苦伶仃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难耐。人们的安慰、怜悯都无助于他的虚无。人们，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法理解命运给他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因为卡洛琳娜不单单是个可爱的女人，是伴侣，她已化作了他自己的部分，是激励他创造的隐秘因素。她走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也死掉了。工作的时钟停了，纵然修复，走得也跟过去不一样了。他还将活很多年，多于他已经度过的那些年头，而她却不在这个世上了，阴阳从此相阻。当然也不时有一些独创的思想来光顾他，并且相当不坏地记录到纸上，但许许多多都停留在未完成状态，也不期望有更出色的作品付印。这里有种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卡洛琳娜不在了。在思想文化史上还很难找到另外的例子，一个女人在一个哲学家的创造生涯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谢林给卡洛琳娜的弟弟写信：

她是无比独特的生灵，要么爱她的全体，要么根本不爱。直到最后的日子，她完全保持着这种征服

人心的本领。神圣的联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在患难中彼此信任。自从我失去了她，一切创伤又重新裂口。如果我不是她所爱的人，那么，我对她的哀悼也就像哀悼任何一个人那样平常，为那样一颗心灵、一位罕见的女子的逝世而悲伤。她具有男子的开阔的胸怀、敏锐思想和女子特有的极其温柔多情的心灵和智慧。多么独特！

他有段时间神情恍惚，总在非梦非真的状态下。可他知道自己在短时间尽快找到一种充实。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今后却只考虑创作，他甚至要向所有的朋友保证，今后完完全全只为崇高的事物生活。这个生命已不能再有别的价值。他说自己不能擅自轻生，把它贬值是耻辱。忍受它的惟一办法是用永恒的眼光去看它。在我们失去了一切：祖国、爱情、自由之后，活下去的惟一理由只能是要完成我们业已开始的事业。

在慕尼黑他感到沉痛，他请了长假到外地，他说现在有的是时间，却不知该如何打发。他去妹妹家，准备开始必要的阅读和为哲学座谈做准备。但午饭后忧伤袭来，泪水不断。他在反复问：我的卡洛琳娜在哪儿？

但他明白他必须克服忧伤。在卡洛琳娜离去之后他单独过的没有她的生日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克服不了的激情。狂怒者在君主面前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淫欲面对天真无邪和美德而平息下来。为了成为自身激情的主人，一个人总是需要某种外界的东西来震动他，吸引他，制造出紧张状态。”

他必须制造出紧张状态以冲淡卡洛琳娜离去以后给自己

带来的巨大沉痛、哀伤与虚空。那是另一种激情，负面和病态的激情。他以大量的阅读作为自己走出哀伤的办法。这是一种情感转移。只有在自己制造的绝对紧张状态中，去克服那无可克服的悲伤，他才能重新振作。毕竟，时间之水早晚会冲淡这种悲伤。人总得设法活下去。

这就是谢林。现在来看，这种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此深情的怀念听来简直如天方夜谭。人们现在是遗忘得太快了。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真挚热烈地去体会两性相悦的所有美妙和欢悦，更遑论在另一方离去以后。人们现在的情感价值在变得相对，同时，那情感的浓度在稀释，情感质量也在下降。那时的人们，却体味着什么叫情感，今人可以不屑一顾的冷漠待之吗？而在午夜时分醒来，尤其是在经历情感磨难之后，难道想起这些，没有愧疚和被拨动某一根神经的触痛？

卡洛琳娜的不幸早逝对谢林的人生及学术生涯都带来无可估量的打击与改变。1804年谢林在《哲学与宗教》一书中曾否定个人之永生，但在1809年卡洛琳娜逝去之后，他宁愿相信灵魂不死，相信她正站在彼岸微笑地注视着他。他原先清新明媚的自然哲学将为幽晦隐曲的神秘主义所代替，他的思想开始逐渐转向宗教。那是由于对亡妻深深的思念而宁愿相信一个来世。早期谢林的哲学，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真诚的青春思想”，并且恩格斯以生动洋溢的笔墨评价说：“他敞开推究哲理之门，在抽象思想的斗室内散发出自然界的新鲜气息，和煦的春光撒满落在范畴的种籽上，在它的身上唤醒了——一切沉睡着的力量。”

而现在，那新鲜的气息，那和煦的春光都随一个女人的离去而不复存在。谢林把自己关闭在阴郁沉重的闸门内，写作

和读书成为他惟一的安慰。

就在这孤单无助的时候,有一个女子正悄悄地走向他的心灵。这一次不再是历史性的,却是更人间化的走进。这个女子依旧是同卡洛琳娜有关联的,她叫巴乌琳娜,她是卡洛琳娜亲密女友的女儿。她是最早向他发出唁慰的一个。她称卡洛琳娜为自己的第二母亲。她说:

我觉得半个世界崩溃了,何等的灾祸,何等的痛苦,时间不能摧毁她,她永垂不朽。但我不应当用自己的悲伤来搅扰您了。原谅我,能够的话,让我知道您的情况。我们对她的爱联结了我们,如今回忆又把我们连在一起。

谢林回信道:“让我们的记忆联结我们。我不会感到自己完全孤单。谁在卡洛琳娜生前爱她,也就在她死后替我保持友好的情感。不要嫌我冒昧,我请求您不但怀着同情之心想到我,而且尽量多给我写信。我一定复信。而倘若我的痛苦意识能打破在天之灵的宁静,那么卡洛琳娜一定会为了您替未亡人所做的一切,为了来自您的每句安慰的话语,而感谢您的。”

巴乌琳娜与谢林频频的通信开始了。但此时,他只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见过她一面,别的都没什么印象了。是对卡洛琳娜共同的记忆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卡洛琳娜逝世周年到了,巴乌琳娜给他寄来照例表示同情的信。这一年,她二十二岁,年轻的姑娘慰藉了谢林孤寂的心。但他们现在远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通信继续着。信件显然变得热烈起来。谢林通过自己的弟弟打听巴乌琳娜的情况,他最感兴趣的是她的健康状况。并获悉:少女巴乌琳娜健康正常,在德行和灵性方面找不到更出色的了。他的确已经对亲人的离去怕透了,他如果有心再重新选择一个伴侣,他最关心的是健康。“我准备忍受一切,但是对我所爱的人的痛苦和疾病,我却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决定见一见巴乌琳娜了。1812年,在卡洛琳娜死后三年,谢林带上马尔库斯教授去同巴乌琳娜见面。教授凭他老医生富有经验的眼睛,一眼就看出巴乌琳娜娇弱的外表后面那健康的秉赋。谢林对她的一切都很满意,在他们分手之后,他旋即给她写信:

从散发着你的气息的房间里出来不久,在我们刚刚离别一会儿,我就给你,我的生命写这封信。坚信此刻搁在信纸上的手,将比它所写的更早地放在你的手里。如果信在我之后到达,你至少会看到,我对离别有何感受,你还可以把我的感情同会面时我给你的感觉相比较。我可爱的孩子,我希望老天将不会让我长久承受孤独的痛苦。我向你承认,这种孤独对我的折磨要比我的预料更甚。祷告时,我的嘴唇和头脑在为那同一样东西,为现在构成我生命内容的东西不停地祈求。最主要的是,我对爱情的信仰,对全世界难以想象的纯洁神圣的爱情的向往,得归功于你。

谢林回到慕尼黑,很快得到婚姻许可。婚礼在不久的夏



天举行。这一年，他三十七岁。他向弟弟描摹他的新家眷：她二十三岁，高个子，身材匀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产物，不如说更像是幻想的作品。她不是美女，但她通体有一种征服人心的特别魅力。她身体柔弱，但没有任何妇科病，生命力旺盛，

脸色鲜艳,性格稳定而开朗。我的朋友马尔库斯以医生的身份担保我的幸福。最主要的,大家都承认,她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她真挚地爱我。我不曾见过这样一颗心,恶在其中罕能生根。我们的思想完全一致,这对于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坚信,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按照我的趣味我的志向建立,而它们同时又是她的趣味和志向。她受过家务教育,我希望她能胜任我的家务。

第二次婚姻已明显见出谢林考虑问题的实际性。当命运把他和卡洛琳娜连结在一起时,他没有考虑对方能否胜任家务,也没有考虑健康因素并具体入微到是否有妇科病,他更没有想到要以自己的趣味和志向建立共同的生活方式。那时,没有任何查询和进行任何权衡。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再也找不到像卡洛琳娜那样的女人了。他现在已听命于上天给他安排一个温馨暖融的人间的家了。

婚后巴乌琳娜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取名卡洛琳娜。

巴乌琳娜是人间的妻子,而卡洛琳娜是天上的仙侣。这样的女人,只能是在凡界外的虚无中与她会面了。

1854年,谢林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巴乌琳娜始终守候在他的身边。他安静地睡着了,不知是否魂魄已飘向卡洛琳娜?

塞纳河畔的火凤凰

——斯达尔夫人(法)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革命。革命的结果的确造成了动荡与流血,但在这场以反抗旧制度为宗旨的革命中,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得以树立。

有一个法国女人在这时格外引人注目。她虽然并没有直接投身于革命,但革命在她身上的种种影响显而易见。无论她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总之,政治活动促使了她的内心不仅朝向情感领域开放,而且抓住逻辑理性,把女人的智性运动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斯达尔夫人。

大凡进入智性活动领域的女人总是手中有一支笔。因为历史总与观念相关,与语言相关,是观念与语言使历史成为了这样子或那样子。德国诗人海涅曾经对法国人讲到这种力量:—

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海涅认为康德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把处决了欧洲“自然神”的宝剑，而卢梭的著作到了罗伯斯庇尔手中，则变成了一种沾满血渍的武器，摧毁了法国的旧制度。海涅并预言，有朝一日，费希特及谢林的浪漫信仰，将由他们狂热的德国信徒，转用于抗拒西方的自由文化，因而产生可怕的效果。

当然，海涅讲的是男人，更多的是讲他们那摧毁性的力量；而握有观念和语言的女人，因了她内心的绵密柔长，因了她直感的引导，可能会具有另外一些建设、生长等柔软性力量。斯达尔夫人身上女性与男性的智力活动都同时展开。她的一生倘若没有她的著述作底蕴，即使她在沙龙中如此的摇曳生辉，历史总是会很快忽略掉她的。但她却是有著作的，这些著作伴随她生命的不同阶段和她的不同经历，其中当然包括她强烈的感情经历。也就是从她之后，法国女性在文学艺术界活跃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乔治·桑、波芙娃及杜拉斯等等。让我们沿着她几本重要著作的轨迹来看看这个女人斑斓、多姿的一生吧。

一、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

1788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热尔曼娜·内克出版了她的《论卢梭书简集》一书。这是斯达尔夫人（1766—1817）的原名。年轻的姑娘，对卢梭作品中弥漫的忧伤、抒情的笔致钦慕不已。卢梭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总能令年轻的一代热血沸腾。虽然热尔曼娜并非出身寒门，但她并

不是作为世袭贵族的家庭背景使她对自由的字眼有天然的亲合。

她的父亲内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和法兰西有着不解之缘。内克原为日内瓦的一个著名金融家,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凭藉才干能力起家的新型资产阶级。1776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下台,国不可一日使如此重要位置悬虚,于是,内克被推举到这个位置上去。在当时政府高官执掌要务的大臣中,他是惟一非贵族出身者。他即位之后,财政危机日紧,又加上法国时值战争,军费陡增,于是内克提出让僧侣贵族纳税、减少宫廷显贵年金的方案。路易十六迫于形势,同意了内克的方案,但宫廷特权者则联合起来反对内克,内克被迫辞职。嗣后,卡伦接任。他与玛丽王后关系暧昧,受其庇禄,他以迎合贵族的办法为其保持官位。他常常笙歌宴乐于宫,令王后开心,又以各种津贴来博取宫中显贵的拥戴。他装出债务一到期就能偿还的样子,大举借债,把内克任上积攒的一点钱全部花光。此时连债源也已枯竭,无奈之中,只得实奏国王:国库已完。路易十六于是又想到内克,意欲使他复职,命他即刻筹措一笔巨款。内克凭自己在金融界力量,弄到巨额借款,使国家暂度难关,然后一一实施改革经济及税收之措,并再次担任财政大臣。内克再次上台,仍以削减贵族利益,强使他们交纳税金为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他深得国人以及第三等级的欢心,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给以不大不小的冲击。

热尔曼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她深深渴望着自由。她从小就和当代最有名的人物接触,她机敏的答话,使人惊奇的创见,都惹人喜爱。她不是那种惊艳型美丽的女孩

子,她肤色微黑,但眼睛里却闪耀着机智的目光,露出天性善良的神情。这个性格活泼、善于辞令、聪颖出奇的孩子是她爸爸的骄傲。他对他的慈爱也报以无限的热爱和崇敬,而且终生如此。这从她的大部分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她的母亲是个很有才智的人,由她所主持的哲学、文艺沙龙是当时社会名流聚会之所,在社交界颇有影响。热尔曼娜未婚时已参加沙龙的各种活动。频繁的社交使她勤于阅读社会和阅读人的灵魂,思想早早地臻于成熟。但她母亲却不大喜欢她。她的母亲沉默少言,有些刻板,十分强调责任,相信教育决定一切,天性不起多大作用。她对小事也是斤斤计较,认为从道德观点来看什么都不是小事。对卢梭的教育理论这位夫人自然非常反感。但结果卢梭这个相信天性、相信天生美德的人却受到她女儿的敬仰。她的女儿,由于身受严格约束之苦,非常喜欢不是经过培植而是由健康富饶的天性中自然产生的品质和美德。卢梭让她心动。

热尔曼娜早慧。她从十五岁起就开始写文章,写小说和悲剧。她的一本题为《蒙莫伦西》的悲剧,是她对在法国独立战争中出了名的年轻的蒙莫伦西子爵开始发生好感时写的。

后来,她和一个天主教徒恋爱,由于父母反对,她不得不拒绝他的求婚,但他们终生都保持了忠实的友谊。1786年,她顺从母亲的意思,和瑞典驻巴黎大使斯达尔·荷尔斯丹男爵结婚。这位年岁比她大一倍的新郎当时似乎是一个招人喜欢的贵族,一位彬彬有礼的大臣,同时又是一个自私自利、挥霍浪费的人。新郎向她父母表示,他绝不违反她的意志把她带回瑞典。从此,热尔曼娜成了斯达尔夫人。

结婚以后她依旧享有了她的自由,这使她能够从容进入

思考和写作中。当时法国的风尚便是如此,贵妇人可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有自己喜欢的人与事,她们这一切是通过沙龙实现的。

婚后的斯达尔夫人家很快成为饶有意味的沙龙。斯达尔夫人原来就有的出色的社交能力,显贵的出身和个人才华,使她成为巴黎社交界的灵魂。

应该说沙龙在法国已经有相当的历史传统了,这不是斯达尔夫人的首创,首创者应该推举为17世纪的朗布依耶夫人。朗布依耶夫人原是意大利人,嫁到法国之后,对法国宫廷生活之粗俗深感惊讶,于是决定在自己的家里主持沙龙。她容貌艳丽,潇洒超脱,聪明机智,富有魅力,在宾客之间周旋交际,形成一种和谐气氛。她主持的沙龙格调高雅,趣味高尚,甚至超过法国王宫卢浮宫的聚会。她请意大利建筑师造了一座新颖别致的府邸,规模不大,却布置精美,装饰素朴,令人赏心悦目。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色调是鲜艳热烈,刺激人们感官,而朗布依耶会馆著名的“蓝室”则以淡雅取胜。为保持沙龙的水平 and 声望,朗布依耶夫人对客人的选择非常严格。她的客人几乎都是相貌出众、态度雍容、才智敏捷又有自由支配时间的青年绅士和淑女。他们定期在朗布依耶沙龙见面,组织化装舞会、音乐会、游园会和集体游行,还经常外出郊游和观剧。男女客人们时常半真半假地调情,一见钟情或弄假成真的爱情纠葛也时有发生。当事人兴味盎然地模仿言情小说里主人公的言行举止,而旁人则饶有兴味地注意这些风流韵事的发展。参加沙龙的客人最喜爱的娱乐形式之一就是谈话。在和自己感兴趣的对方谈话之前,往往要做精心而细致的准备,以使自己的谈吐诙谐幽默、机智风趣。因此,在这种

沙龙中,谈话作为一种艺术达到17世纪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峰,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提高了法语表达水平,为正确而优美的法文提出了一种标准,有助于文学的发展。

闲话少叙,且说斯达尔夫人的沙龙。这里可没有朗布依耶夫人沙龙的旖旎婉约,这里是另一种风格,更具有政治的、政论的色彩。

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路易十六此时又因内克代表资产阶级以及第三等级利益的改革而又一次罢免了他财政大臣一职。宫廷侍从送他一道国王手谕,谕令他立即离开法国。原来,国王要秘密流放他了。他即写奏折表示服从王命。旋即又吩咐家仆,将他遭致流放一事传播到社会上去,以便制造舆论,交待完毕,他便携夫人前往布鲁塞尔了。翌日,全城人皆知内克被罢免且已流放,巴黎到处是愤怒、抗议的人群。人群高喊:“还我内克,彼乃我父!罢免反革命大臣!”于是,慑于众怒难犯,国王又一次召回内克……

斯达尔夫人悉心关注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她为老父沉浮于宦海的命运而挂虑,同时,也忙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她虽然刚开始为革命而欢呼,为那彻底同旧的传统决裂的豪迈的革命者而欢呼,并祈盼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法兰西,并且她也因卢梭的学说为大革命的人们所运用而欣慰,因为这个人正是她所敬仰和爱戴的。但是,大革命越往后发展越显出的血腥意味,以及她显贵的家庭和出身,必定会使她的政治目标是以制定议会宪法为主。她在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希望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她固然曾经十分推崇卢梭,但是更多的是在艺术气质上对他的迷恋,他那感伤的、抒情的笔致令年轻的女子动心。但即使在《论卢梭书简

集》中，她仍是不会全面领会卢梭的“含意”“契约”之说，只是以青年人的热情欢呼国民公会的召开，希望伟大的法兰西民族能够通过开明、理智与和平的途径，取得其它民族靠大量流血取得的幸福成果。她那时便已理智地呼吁全国负起责任，不要走过头，超出大家公认的目标。在全书结束时她直接对卢梭说了一段话，哀叹他没有多活一些时候，能看到即将来临的壮观景象，并鼓舞和赞赏自己的父亲内克，说他配得上有卢梭这样一个同胞、赞赏者和评判人。

但革命爆发以后，其发展不可能停留在她所希望的限度：只取得英国式的宪法。罗伯斯庇尔接过的正是卢梭的旗帜，雅各宾党人正是接过卢梭“含意”理论内在的对“一致性”、“公共性”的极端强调，而将道德理想变成了道德嗜血。断头台树在广场终日不停，混乱中，贵族与革命家都被推向那里，恐怖成为革命的代名词。

斯达尔夫人特殊的背景使她在大革命中安然无恙。在她的父亲不久又不得不逃往国外之后，她仍留在巴黎。她凭借丈夫地位的保护，拯救了恐怖统治下的许多无辜受害者。在那个勇敢的德国人鲍尔曼的帮助下，她救了一个人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她当时的情人，前国防部长纳尔朋。鲍尔曼在1792年让他安全抵达英国伦敦。斯达尔夫人甚至还制定计划让王室逃跑。她的行动引起了革命领袖们的仇恨。费了很大事，她才逃脱群众的报复。她在她的朋友蒙莫伦西的陪同下逃到柯贝别墅，这在以后成为她流亡时期一个存身之地。蒙莫伦西是一个贵族，也处在危险之中，就装扮成她的佣人。后来她到了英国，在这里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为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辩护。她并不认识王后本人，但王后的命运使她深感

难受。继这个小册子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也是为时事写的，题目是《论热情对个人及国家幸福的影响》，这是一篇演说式的文章，谈爱情，谈革命，谈野心。这当然都是斯达尔夫人感兴趣的认为是热情的内容构成。

她在巴黎的家已成了政治集会的地点，斯达尔男爵在革命爆发时却同情自由派的人。而斯达尔夫人的政治影响正在日益显示，在她的活动之下，法国著名家族的达勒朗当了外交部长，虽然后来他并未怀有感激情绪来进行报答，她曾在给他的一封信的末尾中写道：“再见了！你感到幸福吗？以你这样聪明的头脑难道你看不出一切事物核心里的东西——不幸？”

很明显她具有18世纪的一些特点，例如好交际、爱谈话而且十分健谈。19世纪的女作家乔治·桑和人一起时总是沉默寡言，只有在写作时才透露内心的想法，而斯达尔夫人则有生动的即席发言的能力，什么问题经她一讲就完全清楚了，并且她有使人感动的本领。认识她的人都说，和她的谈话相比，她的书简直算不了什么。一位评论她的人写道：“在听她讲话时，简直不可能不同意她的话。如果这些不是她写下来的，而是她讲出来的，我就不可能加以评论了。”一位有地位的贵妇人开玩笑说：“要是我是女王，我就命令斯达尔夫人不断地和我说话。”保存下来的她无数的话语，虽说经过刊印减色不少，但仍然能使我们看出她谈话时的才气和新意。有一天，她谈到父母不应当包办婚姻，而只应当让女孩子自己去选择对象时笑着说：“我将强迫我女儿去为爱情而结婚。”后来拿破仑的一个朋友有次通知她，如果皇帝能肯定得到她的感情，他可以把她父亲交给法兰西银行代管的两百万法郎还给她。她答道：“我原以为得有一张出生证才能拿到我的钱，没想到会要

求我发表感情宣言。”

但在由社交时代发展起来的这种能说会道、善于说俏皮话的能力后面，蕴藏着充沛的热情和丰富的思想，这是为19世纪所欣赏的。这是一个真诚坦率从不矫揉造作的女人，爱他人的天性，对那种不可能指导天性反而和天性相冲突的观念她非常反感。她从年轻起就热情地主张平等，这又是受了卢梭的影响。她甚至认为人在能力上所有的人都几乎相等，只有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稍稍有点差别。从她坐在她爸爸膝上起，她就怀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由能使人幸福，能使人把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发挥出来。这个信念从未动摇过，不管是在那年九月当她被迫从恐怖统治下逃出来的时候，还是在执政时期她被独裁政权驱逐出来的时候都是如此。尽管恐怖统治当时是由于试行平等造成的，独裁是从自由演变成的。

在斯达尔夫人家里，聚集了一大批外国外交家，对政府不满的新闻界人士和参与秘密活动的妇女。1794年年底，她的沙龙里来了一个英俊风流的外省青年，他叫贡斯当。从此，她和这个男人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暴风骤雨般的恋爱。这一种关系对于这两个同样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来说，一生都有其深刻影响，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以及写作生涯。

二、爱上贡斯当，是她一生的心醉和心碎

这个名叫贡斯当的年轻人刚刚来到巴黎，这是他的理想抱负促使他长期想来的城市，现在他第一次见到了。他1767年出身于瑞士洛桑一个法裔贵族家庭，先辈原是法国新教徒。南特敕令废除后，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到瑞士。他的母亲在他

出生不久即死去,他的父亲是个性格冷淡、老于世故的人,但是却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贡斯当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正是那里的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受到亚当·斯密和亚当·佛格森等著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由此奠定了他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并奠定了他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终生不变的推崇。1785年至1787年,他会见过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并自称是孔多塞的弟子。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写作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论宗教》,这部著作断断续续写了一生,直到三十年后才完成。

这部著作写作伊始是在夏丽叶夫人家里。夏丽叶夫人是个有才华、有自由思想的瑞士女作家,在荷兰出生但完全法国化。当二十一岁的贡斯当与她最初相识时她已四十多岁。正是在这个女人的家里,在她写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坐在一旁写他的这本书。这书随着他看法的变化和比较定型,不断地进行修改。三十年后,他在出入议会和巴黎赌场之余省出时间把它写完,但当时他则是在夏丽叶夫人家中开始。第一部分写在一副扑克牌的背面,写满一张就递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贡斯当被任命为布伦斯维克女公爵的宫廷侍从。处在这个地位,他听到人们带着恐惧和憎恶的情绪谈起革命。不过他已经对这场革命做出了独立的不带偏见的估计。在布伦斯维克和在别处一样,他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谈恋爱,一个紧接着一个。他开玩笑地把“多变的太阳其实不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出于厌倦,他结婚了,但蜜月一过,他就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不久他又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女人这时正在要求和丈夫离婚。为了这个女人,他后来又回到布伦斯维克。她的本名是夏洛蒂·冯·哈登堡,好些年之后

她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这个期间在他给夏丽叶夫人的信中,贡斯当既显得聪明诙谐,同时也显得漫无目的和有厌烦情绪。他嘲弄那些愚蠢的小心眼的同事,有个时期他甚至嘲笑他自己对心上人的感情,直到后来他突然想到拿后一个问题开玩笑是不恰当的,他才不这样做。这时,他的生活既无中心又无目的。

然而到了1794年底,却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这就是他到了巴黎,遇上了斯达尔夫人。这时候贡斯当是二十七岁,斯达尔夫人是二十八岁。

他被介绍到上流社会。他漂亮的外表和出众的才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白里透红的面孔和金黄色的头发使他很像北欧人,在思想上他则是敏锐的法国人,在文化上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给当时那些最有才华的法国女人留下的印象,即使环境使他们疏远或分开也从未磨灭过。不久大家都知道斯达尔夫人对他的赞赏变成了火热的爱情。她向这个正在成长的政治家灌输了她对政治自由的信仰,对个人权利的热爱和对一个保证实现这些权利的政府的期望。她有火一样的热情和事业心,相信语言和行动有力量不顾命运的安排来影响和改造人生,这些都给他很大启发。他一改无中心和无目的性,开始投入到生机勃勃的事业之中,其中包括政治参与和艺术创造。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也对贡斯当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贡斯当一生的理论活动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断反思。曾经,他像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对革命前的旧制度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与轻蔑,他痛恨旧制度的政治迫害与宗教迫害。他认为,“旧

制度是一个腐败、专断、与软弱的混合体”推翻这种制度是完全合理的。他热情讴歌大革命的最初阶段。但他同时意识到法国人未能适可而止，未能像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那样，以短暂的、流血最少的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导致雅各宾独裁那样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他对法国大革命有所评价，但严格说来，在1795年以前，他只是大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是斯达尔夫人将他引入革命的中心。他与斯达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斯达尔夫人与他的相爱，使他结束了颓废消沉的生活。1795年，斯达尔夫人邀请他在她瑞士的柯贝别墅度过，第二年她就与自己的丈夫分开了。当然她与贡斯当的公开关系，与丈夫的分居使她的名誉受到损害。但由于这些，由于她和他的关系，由于她和上层社会的分歧，回过头来似乎给了她更大的热情和反抗思想，并因此形成她文艺作品的核心。

此时的斯达尔夫人狂热地爱他，贡斯当肯定是她1797年生的女儿阿贝迪娜的父亲。从1796年开始，贡斯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政论论著，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这部论著中，他极力鼓吹“结束革命”。他写道：“我强烈希望结束这场革命，因为继续革命会伤害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主张加强我们的共和国。人类命运中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事业都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贡斯当日益成熟。很明显，斯达尔夫人和他互相帮助，正在创造他们一生的黄金时

代。没有对方,他们谁也不可能写出自己最佳的作品,因为这里有强烈的感情和智慧作为双重的吸引。

应该说,斯达尔夫人更爱贡斯当一些。

1799年,拿破仑执政。初期他给法国制定了一部宪法,给专政统治蒙上了一层假自由的面纱。这年他任命他过去的热情崇拜者贡斯当为护民委员会委员,而贡斯当也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作保护共和国与革命成果的人。然而,随着拿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的外衣,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贡斯当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拿破仑的独裁,被欧洲各种反拿破仑的力量视为英雄,也使第一执政极为恼怒。1802年,拿破仑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说护民委员会中有五六个玄学家罪该淹死。同年,他被赶出立法院。

斯达尔夫人也和贡斯当一样对拿破仑由欢迎到反对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的阶段,她的这种态度好像更多的是与感性内容相关。1797年底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以后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巴黎,可以说是凯旋而归。这时他给斯达尔夫人造成了特别好的印象。她找一切机会接近他,感到既被他吸引又被他压倒。每当她设法引起他注意时,她这个通常滔滔不绝的人却仿佛给愣住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无法接近使她感到痛苦。有一小段时间,她肯定是想成为这个当代凯撒的朋友。当她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时,她是极感失望的。从这时起她就参加到他政敌的行列中来,但有一段时间在牵涉到他的时候她仍然心怀钦慕,直到她完全被拒绝时她的感情才变成纯然仇恨的情绪。

从这个时候起,同拿破仑的对抗成了斯达尔夫人生活里

的主导思想。在意大利战役之后她曾把他看成自由战士，给他写过热情的信，并说服他把她父亲的名字从流放人的名单中划掉。但现在这位第一执政官在她看来，只是“一个骑马的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报怨她煽动所有人反对他是有道理的。

她过去的热情变成了激昂的仇恨。她在她的客厅里和他进行一场真正的斗争。她和贡斯当不倦地对他的同僚、他本人和他的行为进行讽刺。她嘲笑他个子小、脑袋大，傲慢而又笨拙，是个坐上国王宝座的布尔乔亚，对有教养的妇女的才智感到恼怒，连话都说不连贯，全部的口才无非是骂人。说他有天才是骗人的鬼话，他连一个大将军都算不上，在马伦戈他惊慌得不知所措，要不是戴赛来帮他的忙，这一仗就打输了。

从热情变为仇恨，这从她在这一过渡时期所发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里既有对拿破仑统治的讽刺话，也有对他个人的恭维话。

自从贡斯当第一次在护民委员会发表反对拿破仑的一个建议之后，她在巴黎的家就没有人来了，她的一切邀请都被婉言谢绝。她始终敬爱的父亲内克的书《对政治和金融的最后看法》发表之后，拿破仑明显感觉到这是在与自己作对。斯达尔夫人与父亲被第一执政官明令驱逐出巴黎。贡斯当跟着斯达尔夫人来到柯贝，也被禁止返回法国。由此开始了流亡生活。

有心爱的人陪伴，这使流亡的日子好过了一些。但是，这对斯达尔夫人也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她只有在首都才能真正地生活，她是那样离不开她的朋友们，那样想进行思想交流，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当代的大事，把她从家里和祖国这样硬逼出去对她是极大的痛苦。后来她在《流亡十年》的书中写

道：“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份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上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

后来当她听到丈夫病倒时，她去看望了他，并把他一直护理到死。

在流亡期间，他们俩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写作。她的柯贝别墅成为一个另外的思想文化中心。随着她热情性格的发展，思想见解的加宽和朋友的增多，她的影响又一次扩大。她在柯贝简直像建立了一个朝廷。来自欧洲各地的杰出人物都云集到她这里。在她家里可以见到像贡斯当这样的政治家，她迷恋他时把他称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有像希思蒙迪这样的历史学家，维尔纳和厄楞士雷革这样的诗人。德国的亲王们、波兰的亲王和公主们这样一些出身高贵或才华超人的人物也到她这里拜访。

此时的斯达尔夫人，无论政治见解、艺术感受和个人魅力都达到成熟。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斯达尔夫人多么聪明有才智。有人形容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才气的女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她身上有些男子气。她有宽阔的身材，轮廓鲜明的面貌。她并不十分漂亮，但她明亮的棕色的眼睛却有十分吸引人之处。她富有女性的那种本领，能吸引人，巧妙地控制人，把一些性格非常不同的男人聚在一起，在爱情方面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不管她在哪里出现，她总能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有才智的人，甚至把他们从年轻漂亮的女人身边吸引过来。当然人们知道，除这些之外，她还有钱，并且好客，每天给人们丰盛的款待。因此人们也就不会奇怪她像一个女王或仙女一样，把许多人吸引到她的魔宫里来了。她吃饭时手

边总有一支带叶子的小树枝 给她拿在手中玩 ;人们几乎感到这是为了表示这是她的领地 ;佣人每天都得在她的盘子边上放一支 ,对她来说它像刀叉汤勺一样需要。

1803年 ,斯达尔夫人出版了《黛尔芬》,这是仿照卢梭的《新爱洛绮思》以书信形式分五部分写的一部长篇故事。从中不难找出许多个人生活的印象和记忆 ,这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但本书的主题是恋爱着的妇女和社会的冲突以及社会如何冷酷无情地摧毁个人的幸福。从这里可以看到她和她丈夫以及和贡斯当的关系。斯达尔夫人在写这部书时 ,丝毫没有怀疑贡斯当将很快和她结婚 ,以使她的女儿阿贝迪娜变得合法。1803年到1804年她和贡斯当旅居德国 ,她一心一意地爱他。但很清楚 ,贡斯当并没有报以同样的感情。只是出于他的软弱和同情心 ,他才没有让她知道他经常在和夏洛蒂·冯·哈登堡通信。他可能找了一个借口 ,离开斯达尔夫人一个人前往魏玛。1804年 ,在那里他把席勒的《华伦斯泰》译成法文。1805年不是贡斯当而是威·施莱格尔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陪着斯达尔夫人来到意大利 ,这次旅游在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柯林娜》中记载下来。1808年夏 ,贡斯当悄悄地和他的夏洛蒂结了婚 ,斯达尔夫人对他的变心是那样耿耿于怀 ,当她偶然间在日内瓦附近遇见这对新婚夫妇时 ,她和他大吵了几次。夏洛蒂被她的情敌的猛烈的妒忌心弄得悲观绝望 ,企图自杀但没有成功。斯达尔夫人对贡斯当仍然有很大的魅力 ,她确实说服他离开他的妻子 ,同她一道回到柯贝住了一段时期。

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上的恩恩怨怨 ,从他们各自出版的不同的长篇小说中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1806年 ,贡斯当

写出了他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斯达尔夫人则于1807年出版了她最好的小说《柯林娜》,小说各自透露出他们不同的感情和复杂的心理活动。

三、女人宁愿为爱所束缚, 男人认为爱是一种负担

贡斯当不愿同斯达尔夫人结婚,是由于他觉得那强烈的爱不堪负重。他借《阿道尔夫》之书将它和盘托出。这部小说对于理解他同斯达尔夫人的关系极其重要。

《阿道尔夫》是一部从事心理分析的新型小说的原型。讲的依旧是爱情故事,却不是自足的、圆满的爱情,而是描述大革命之后法国新一代人动荡不安的心理情绪。他描写爱情的产生爱情的力量,却又描述它的衰退和死亡。在歌德的《维特》中,是男人在爱,在苦恼,在愤怒中陷入绝望,和他比起来,女人则健康、坚强,没受损伤——也许有点冷淡平凡。现在则轮到女人了。

阿道尔夫是个很年轻的人,他过过一定的放荡生活,但也认真下功夫学习过。这其实是贡斯当自己的自画像。在这个有才情的人身上,不满与厌倦总是如影相随。他越是感到自己没有大志,越是自负;自负是那些意志和能力有缺陷的人拿来填补自己的东西。他愿意去爱一个人并且被人爱了,他欲把爱情作为自尊心的滋补剂。

而她又是谁呢?

阿道尔夫认识她时,爱莲诺尔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初次体验爱情的少女。她比他大出不少,是个妇女,在

发生新感情之前已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爱莲诺尔本来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享受种种乐趣,她却放弃了。她现在一旦爱上了阿道尔夫,就准备对他无限忠诚,并为他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而阿道尔夫这时也被她深深吸引,他在她的身上神秘地感到凝聚和蕴藏着激情、温存、热忱、才智和经验的宝藏。于是他的渴望与她的悔恨,他的虚荣心和她的绝望心情,他的青春活力和她的失望情绪,就像钟表机件中的两个齿轮一样,紧紧地啮合在一起。不难预见开始时这种感情会燃起多么炽热的火焰,仿佛两人都赢得完全的持久的胜利和灵魂得救似的。她现在的感情是个新的奇怪的混合物,包含近乎狂热的感情。而他仿佛是被狂喜和幸福的情绪弄得如醉如痴了。但一开始他仍然感到不舒服的是,在伯爵离家的那一两天,她几个小时不看到他都不行。他想离开她时她留住他不让走,他走时她又要问他什么时候来。这种无限的深情最初使他很高兴很得意,但不久他发现他的时间被她占掉,连一小时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都没有。他不得不拒绝一切邀请,并和所有朋友都断绝了往来。原来她是他生活的目标和目的,现在却成了身上的累赘,并成为无法向对方诉说的隐痛。

很多人的苦恼是爱别人而别人不爱自己。阿道尔夫的苦恼则是他已不再爱对方了,而对方还爱他。他们见面时他故意显出高兴的样子,这一点爱莲诺尔一下子就看出来,接着发生了一场斯达尔夫人让贡斯当经受过的那种可怕的争吵。她火热的恨至激烈时就接近仇恨的情绪。阿道尔夫不时有气无力地向爱莲诺尔表白一下自己的感情,但这只不过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上出现在枝头几片脆弱灰暗的树叶而已。他的日子白白混过去了,他青年时的希望一个也没能实现且前途

渺茫,前面总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爱莲诺尔。

贡斯当也许已经感觉到他和斯达尔夫人在一起所感到的束缚和厌倦。在贡斯当的一本传记中有句饶有意思的话:“这一年贡斯当很高兴,斯达尔夫人到俄国去了。”

爱莲诺尔做了极度的努力,想引起阿道尔夫的妒忌来争取,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各方面都让他感到和她断绝关系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为了父亲,为了他的前途,甚至为了把他绑住又受他折磨的她,他都有责任这样做。她接到一封信,从中明白了他的意图,不久之后她患上致命的热病死掉了,临终时还在说她多么爱他。

阿道尔夫一获得自由就明白了,这自由现在对他已毫无用处。他不知道拿自由怎么办,他渴望旧日的桎梏。

《阿道尔夫》里处理的是不变心的条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爱情会继续下去,在什么条件下不行。他已不相信那纯粹的爱情。这里,男女双方需要多少友情,多少献身精神,多少虚荣心、名利心、崇拜、尊敬、肉体上的吸引力、希望、幻想、失望、仇恨情绪、厌烦情绪、热情、自私的打算等等,才能构成双方称之为爱情的那个混合体。经过这些分析,这种感情已失去了它超自然的性质,人们对它的崇拜也就不会有了。贡斯当在书中描述的已不是爱情的诗意,而是它真实的心理状态。这里,以往那动人的传奇故事没有了,在那种故事中恋人们除了相爱,什么事也没有,他们一早起来就谈恋爱,不吃不喝,可以谈一整天,为了爱情可以彻底不眠。而在《阿道尔夫》里,恋人们却感到时间的损失是真正的损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自然主义的特点。

女人在爱情上总是比男人更痴迷一些。如此冰雪聪明的

斯达尔夫人却也总是丧失理智，她为什么就看不出来贡斯当与她在一起时流露出的麻木和厌倦？刚开始，她清新明爽的气质，拂去了他心头的阴霾和消沉，然而现在他已经成熟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政治思想家。况且，他身上那么强烈的创造激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于女人身上的。他对斯达尔夫人的感情是不同于其它女人的，但他又不想终生终世与她陪伴一起。在最初的流亡岁月，有相依相伴中的鼓励，然而当生活又一次定型在那里，他就又得寻找新的刺激新的灵感。那柯贝的女主人怎能理解他种种的活思想呢？

相反，在斯达尔夫人的两部长篇里《黛尔芬》里的列本赛是经过美化的贡斯当。斯达尔夫人对这个人物的恋爱能力没有丝毫的怀疑。导致黛尔芬悲剧的只是传统的社会习俗与偏见。列本赛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引导她：“你能不能听一听一个大胆的有益的劝告？你要照着做就能把你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你能不能采取一个将冒犯你一生惯于遵从的东西，即公众舆论和现有的习俗，但符合道德、理性和人道的步骤？”

1807年出版的《柯林娜》是她游历意大利之后的产物。她通过柯林娜之口描述了美丽非凡的意大利风光，又同时描叙了这个女诗人依旧在传统习俗之下的命运：智力较高反而遭致不幸。此书的情节是这样：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奥斯俄尔德勋爵失去了他最亲爱的父亲。为了散散心，他来到意大利。他到达罗马时正好碰上女诗人柯林娜豪情满怀地被抬往主神庙。虽然这样抛头露面，在大庭广众面前出风头和他理想中的妇女形象是不相符的，他却被她吸引住，不久就强烈地爱上了柯林娜，爱她的既有才华又坦率自然。但尽管他和她的接触使他看到了她全部美好难得的品质，但他始终担心她不适

合作一个出身高贵的英国人的妻子。要是在英国,他会选择一个软弱胆小、兢兢业业、感情深重的女人作妻子,在那里料理家务的美德是妇女的光荣和幸福。柯林娜却不是这样的女人。他存在一种不健康的顾虑:他死去的父亲会不愿意让柯林娜这样的女人作他的儿媳。

后来,他见到了柯林娜的异母妹妹路希尔。她的谦逊和女性的妩媚一点点地抹掉了她姐姐给他留下的印象。离远之后柯林娜的出色才华就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她那样无拘无束地大胆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在这样一个国家不是婚后幸福生活的好征兆。在这里,家里柔和的灯光可以使女人显得更可爱一些,路希尔柔和的性格和这种光线是非常调和的。和柯林娜结婚会是对社会的一个挑战,这样,他也会感到对不起他的父亲,而和路希尔结婚却相反会受到社会的一致赞扬。和柯林娜结婚就等于和异国的遥远的东西结合,长久下去会和这个国家的精神格格不入,而和路希尔结婚,他等于和英国本土结合。柯林娜在苦恼焦急之中跟着来到英国,在她了解了他的思想状态以后,把他的戒指退还给了他。奥斯俄尔德以为她已不爱他了,就和路希尔结了婚。他后来才知道他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故事以他的悔恨和柯林娜的死亡悲惨地结束。

不难判断书中哪些情节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奥斯俄尔德忧伤地思念他的父亲,使人想起作者写这本书时正在为内克的死而悲痛。奥斯俄尔德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她自己性格的反映,这就是他在决定走哪一步时像女人一样犹豫不决。另外他父亲最后几年为他的行动而烦恼,这一点可能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在其他方面奥斯俄尔德显然基本上是

贡斯当的画像。许多细节说明，斯达尔夫人在写这部书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贡斯当。奥斯俄尔德是爱丁堡人，贡斯当的青年时期一部分也是在这里度过的。书中说他比柯林娜小十八个月，斯达尔夫人也正好比贡斯当大十八个月。更有力的证明是，在整个性格方面，他对外界表现出骑士般的勇气，而对爱自己、自己又长期爱慕的女人却表现得怯懦而缺乏情义。为了她比自己强就避开她，最后还把她抛弃掉。

斯达尔夫人塑造的女主人公的主要特点就是她自己个性的写照，这是她自己理想的典型。柯林娜不像黛尔芬那样把自己限制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她突破了给她划定的范围，她是人人谈论的女诗人。斯达尔夫人赋予她以自己的外表，也是加以了理想化，她有她自己的眼睛，甚至有她自己别致的打扮，头上缠一条印度披巾。她让她也具有自己一般清楚活跃的头脑，但一旦感情像鹰爪一样抓住她之后，她的头脑就没有用了，她成了任它摆布的俘虏。她自己如此，柯林娜也如此。和斯达尔夫人一样，柯林娜也流亡在外，具有流亡者的想法和悲哀。柯林娜也像她的塑造者一样，希望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使她能被召回国，恢复自己的权利。斯达尔夫人还使柯林娜具备了她的文化知识。像她那样企图把天才的幸福和爱情的幸福交织在一起，正像她在主神庙被带上的花冠是长春花和月桂交织成的一样。但这办不到，松散开来，织不拢去。当然，她也知道幸福只是一掠而过，迅速消逝的光点。她说出动人的话，由此也可见出斯达尔夫人写作的文采风流。她说道：

“耶稣允许一个失节而可能感到悔恨的女子用最珍贵的油给他涂脚；有些人劝她把它留下派更好的用场，他责备他们说：不要管她吧，你们不常有我和你们在一起。”唉！在世上

一切美好崇高的东西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都很短暂。老年、疾病、死亡很快就将从天上降落在花朵上的甘露吸干。让我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爱情、宗教、天才、阳光和芳香、音乐和诗都糅和在一起；只有冷酷、自私和卑鄙才是真正的无神论。主说过：凡属两三个人以我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我就在他们中间。“啊，主呀，如果不是为了领略您美丽的自然所赐予的一切美妙的东西，并为此向您致敬，感谢您赐予生命，特别是感谢您使另一颗，您造就的心充分而完全地和我们的心相通，那么以您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柯林娜这个女预言家成了被压垮的陷入绝望的许多人之一，通过她的口，本世纪的天才发出对社会的抗议。

斯达尔夫人的文学活动可以说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男性的，一是女性的。这就是既表达思想，又描绘感情。这种双重性在《柯林娜》一书中可以看出来。毫无疑问，这本书作为智力活动的产物比作为幻想创造的成果价值更大一些。在感情的处理上表现出的特殊的热忱和某种温情说明斯达尔夫人仍是很女人意味的。心理学当时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但斯达尔夫人做了努力来表现女性的心理特点。等到有一天要进行认真的努力来这样做时，斯达尔夫人的作品将成为最有启发作用的材料之一。

斯达尔夫人常常捉摸不透贡斯当，她想嫁给他，通过婚姻的形式使她成为他的全部。但是不行，贡斯当总游离于她之外。尽管她是那样一位雄心勃勃的女人，是受人敬仰的柯贝女主人，但她最终的理想仍然纯粹是关于个人的，是很质朴的，那就是得到爱情的幸福。包括成名，那也是当女人所有最殷切的希望都破灭之后的所为。对斯达尔夫人来说，感情就

是一切,贡斯当是她的太阳,他的才情智慧以及迷人的形象,都常常令她心醉又同时令她心碎。在贡斯当以后,所有的男人她都视而不见。她想有更大的名声更多的智慧,依旧是想吸引住贡斯当的目光,让他感觉到她同其它女人的不同,而且她又相信迷信观念和语言力量的贡斯当非常看重这些。她借柯林娜之口说:“在我追求荣誉时,我总是希望这会使人爱我。”

但是斯达尔夫人却是达到了她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虽然她在某种失落中有淡淡的忧郁和感伤。人们到她的柯贝别墅去,就像五十年前人们到附近的费尔奈去一样,那里住着一个非凡的人物伏尔泰,他也遭流放,且在晚年他的身边聚集了欧洲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人们不禁要把费尔奈的这位老人所产生的影响与柯贝的女主人发挥的影响加以比较。伏尔泰在费尔奈度过的那些年头从各方面说来都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荣的时期。正是在这里他作为正义和信教自由的维护者单枪匹马,凭着一支笔做武器,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他帮助人打官司,将人从被诬陷的境地解救出来,他为受屈辱的不幸者提供避难的地方,他还救有人命。那些年间,伏尔泰还挤出时间把费尔奈由一个穷村改造成为一个繁荣的市镇。他还热情地为法国的农奴制的废除而奋斗;他还写了许多重要作品,并在那里盖了一座私人剧场,聘请许多优秀的演员在那里演出。

柯贝的名声不能和费尔奈相比,但也有相当的名气。从这个流亡的地方,同样传出要求公理正义的强烈愿望和对自由真理的热爱。斯达尔夫人的才情远不能和伏尔泰相比,而且她的任务完全属于不同性质。教会外部的权力已暂时被打

破,而且她头脑中的宗教思想也太重,不会允许她跟着伏尔泰的步子走。政治专制已经如此明显,仅仅因为她在她那部谈德国的作品中没有提法国皇帝的名字,就被认为是政治示威而予以制裁。但是尽管革命完成了种种外部的大变革,有一样任务却是没有完成,那就是消除由宗教、道德、社会、民族以及艺术上的偏见构成的那座大山,这座山比拿破仑的帝国更沉重地压到欧洲身上,也正是它使帝国的产生成为可能。伏尔泰自己就卷入许多偏见,特别是艺术和民族方面的偏见。

斯达尔夫人则在柯贝同所有的偏见斗争。她和伏尔泰一样,也找出时间来履行她的社会职责,她也有自己的剧场,她既为它创作剧本也参加剧本的演出。柯贝别墅的女主人也和费尔奈的哲学家一样,也是在思想上毫无拘束,在目的上同样崇高。她比较不那么幸运,不那么有力。但由于她是女人,又受了许多痛苦,就更引起人们的兴趣。伏尔泰为别人做了许多事,斯达尔夫人维护了她自己。但她的生性热情和聪颖过人,她的热心肠后来发展成了宽阔的胸怀和慈善心,她的聪明发展成一种近乎天才的接受和复现能力。并且她不断扩大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接受能力,及时破除偏见,从而使自己不断准备去理解新事物。

但她总是有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忧郁和感伤,众多的来访者不能冲淡这种情绪。这里有去国离乡的原因,也有她与贡斯当聚聚离离的阴晴圆缺,当然也有她在恐怖统治下所遭受的不自由的种种痛苦,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惟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

当然,依她健康理性的头脑,她对人生采取的是比较开朗的看法。一个对她很了解的亲属写道:“可能有时候她谈话中

尽说什么生、死、忧伤、热情的自我牺牲等，可是当这些话像传染病一样在她那一圈人中传开，甚至在佣人中也开始听到谈这些话时，她已经对这些讨厌得要命了。”

情形不仅是令她感伤的，还有新的迫害在等着她，而她也需要振作更大的精神才能抵御一切的暴风雨。

四、她认为德国是热情的故乡， 这再一次激怒了拿破仑

1804年和1807年，斯达尔夫人曾两次到德国访问。第一次是在她接到驱逐令后，她通过拿破仑的哥哥、先后当过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国王的她的一个朋友约瑟·波拿巴相助，得到了一份去德国的护照。在那里，她与席勒多次就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互关系作多次长谈，还天南地北地问了歌德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歌德和其他著名人士最感吃惊的是，她不仅愿意认识他们，还想在各方面对现状施加影响。她谈起话来，就仿佛行动的时候已经到来，他们必须起来行动似的。她从魏玛又来到柏林，结识了路易·费迪南亲王，被接纳入费希特、雅各比和亨利爱特·赫尔兹等人的圈子，还带走了威·施莱格尔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一次，贡斯当陪伴着她。但1805年她游历意大利时，则是由威·施莱格尔而不是贡斯当陪同。第二次去德国，也就是在1807年，她在这个国家呆了一年，她不断学习德语，研究德国文学，她为德国而心动，决定把她所看到的这个新世界完整地介绍给她的同胞。在回到瑞士之后她就开始着手撰写她的三卷本巨著《论德国》。这部书于1810年完稿，而围绕它的出版则是磨难重重。

一开始,巴黎的书刊审查员对她的书进行了多次审查、修改、删节,然后在大砍大杀后剩下的部分盖上了他们认可的印戳。一共印一万本。但就在准备发行的那一天,警察总监派宪兵来到出版商的店里,在派人把守了每一个出口处之后,按照政府的命令开始捣毁这一万本书。同时斯达尔夫人接到命令要她交出手稿,这是她六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也代表了她的希望。并要求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法国。

使她倒霉的原因是由于她的近作丝毫没有提到皇帝,并且它不忠于法国。她这样一个孱弱的女子竟敢说法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源泉已近乎干涸。竟把受人蔑视的德国看成在诗歌上比法国更高超,把令人生厌的背信弃义的英国看成比法国更坚定、更真心热爱自由,把垂死的意大利——这个被法国征服的一个省份看成具有纯朴的风俗和高明得多的艺术值得人去效仿。

区行政官被派去索取《论德国》这部书的手稿,斯达尔夫人把一份草稿给了他,把手稿保存了下来。她被阻止渡海到英国,她沮丧而伤心地再次回到柯贝。

这里还有新的迫害在等着她。她的两个儿子被通知永远禁止返回德国。而她在瑞士境内也不得随便行动,只被允许在离柯贝六英里以内的范围活动。她同时被孤立起来,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在她家住了八年的施莱格尔奉命离开,提出的笨拙借口是她反对法国是由于受了他的影响。她的一些友人,如蒙莫伦西由于在柯贝住了几天也遭流放,贡斯当曾经盲目迷恋过的雷卡米尔夫人因来不及通知,她对她作的短时间访问也受惩罚,她父亲在当总理时的一个同僚也因在柯贝对她作礼节性访问而遭放逐。

处境可以改变。后来有人对她说：“只要你说一小句或是写一小句关于罗马王的话，欧洲所有的都城都会对你开放。”对此，她的回答是：“我希望他有一个好保姆。”

处在这样孤立和受严密控制的地位，她决定作一次果断的努力逃离柯贝。她想去美国，没有护照去不了，否则途中她可能会被逮捕。她很清楚，倘若这样在引起一阵公愤以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政府把她悄悄投进监牢，不久她将完全被人忘却。后来她决心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逃走。在1812年的一天，她和女儿一道乘马车离开柯贝，手上拿着扇子，车里连一个箱子或一件行李也没有。她们安全抵达维也纳，最后在到达圣彼得堡才算脱离危险。

在这前一年，即1811年，已经四十五岁的斯达尔夫人私下里和一个二十二岁的法国年轻军官洛卡结了婚。这个人受了重伤来到瑞士，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完全是一个病人。斯达尔夫人对他表示的同情引起了 he 强烈的感情，后来他们秘密地结了婚。洛卡在俄国边境与斯达尔夫人会合。

《论德国》给她带了这么大的麻烦，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

首先可以确定，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法国文学中是划时代的，因为它不是偶然地而是从原则上和一切陈旧的文艺传统决裂，指出了新的生命源泉。这也是斯达尔夫人的文化修养和聪明才智最成熟的产物。在她较长的作品中，这样全神贯注于主题，显然完全忘记了自己，这还是第一本。在这本书中，她不再去描写自己，只是讲到在德国旅行以及和这个国家那些卓越人物谈话时才提到自己。她不再那样自我辩护和自我赞赏，而是向她的同胞全面地介绍了一个崭新世界。

法国人对德国文化生活的最新了解是，柏林有一位国王，他每天由法国学者和诗人陪着吃饭，把他写的无足轻重的法文诗送给伏尔泰修改。法国人否认有一种德国文学的存在。然而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就仿佛变魔术似地产生了一种伟大的文学。

法国人由于斯达尔夫人的书，而一直觉得德国人天真、善良、坦率。因为当她认识这个民族的时候，是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地位空前低落的时候，因此她得出结论，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和平的，带田园味道的。在她看来，炉火的热气、啤酒和烟丝的气味造成了一种气氛，使这个民族形成一种古怪的迟钝、沉闷的特点，同时她还认为，他们的力量完全在于他们诚挚、认真的品格和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她从不疲倦地赞扬德国人正直诚实，只是偶尔间含蓄地谈到他们一般都比较粗俗、不够圆通。德国的精神生活必然给斯达尔夫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她自己的国家里一切都僵化成了规章和习俗，在那儿衰老的诗歌和哲学已奄奄一息，而在德国，一切都处于动的状态，充满新的活力、生命和希望。

她发现法国和德国思想上的第一个差异是他们对社会的态度不同。在法国，社会所行使的支配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国人天生那样的社会化，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必须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行动、思考和写作。1789年的革命，只靠派出信使带去消息，说最近的市镇或村子已拿到武器，就立即使革命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德国则相反，没有什么社会；那儿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原则，没有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行事的愿望，在语言和诗歌方面也没有专模的法则。

斯达尔夫人感到同法国精神生活大不相同的另一个特点

是德国文学中理想主义占统治地位。斯达尔夫人一贯把热情看成救世的力量,而她认为德国是热情的故乡。这时已蕴涵了她对德国浪漫派无条件地推崇,而对实验的自然科学贬低的态度。她对歌德也有误解。这一切可能是同她的德国朋友施莱格尔夫有关,他作为浪漫派的核心人物,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了斯达尔夫人。这就使得她浮在表面的认识运动之中,其他的就察觉不到了。

作为一个女人,描述德国,必然要注意到那里的女人。斯达尔夫人描写德国女性时显得亲切热情,却也有一些讽刺的味道。例如她说:

她们有独特的引人之处,动人的声音,金色的头发,明朗的面容;她们谦逊,但不像英国妇女那样羞怯;人们可以看出来,她们不常碰到比她们强的男人。她们总是用她们的敏感来使人高兴,用她们的想象力引人兴趣,对诗和艺术的语言很熟悉。她们靠热忱来卖弄风情,就像法国女人以她们机智和轻快的俏皮话来卖弄风情一样。完全忠诚是德国人性格中的突出特点,这使爱情对妇女幸福造成的危险性较小,她们对感情的信心可能比较大一些,因为对她们来说感情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在这里对轻蔑和不忠实的担心要比别处少一些。在德国爱情是一种宗教,不过它是一种诗意的宗教。她们表现热情已成习惯,对她们来说这种热忱仅仅是装出来的东西。她们不像法国妇女那样坦率直爽,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她们是虚伪的,不过她们不能看清楚和判

断事物的本来面目。……

在斯达尔夫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在德国几乎与她是同时期,曾有一个妇女被称之为“耶拿小组的灵魂”、“浪漫的夜莺”,她就是卡洛琳娜,原来嫁给施莱格尔,后来嫁给谢林。她的聪慧才智不在斯达尔夫人之下。可惜她为那对幸福不造成危险的忠诚炽热的爱情所惑,而对于拿起笔更多的将文字留在历史上的欲望,是远远比不上这位柯贝别墅的女主人。

自从同盟军向法国进军以来,斯达尔夫人对拿破仑的仇恨就变得不那么强烈了。她由于不得不希望拿破仑胜利而感到难过,但她已经没有办法把他的利益和法国的利益分开了。拿破仑在最后百日当政时期曾向她表示和解,她没有理会。她活着看到他最后垮台,也痛苦地看到波旁王朝重新上台。比起他们所取代的独裁者来说,他们是自由更凶恶的敌人。

1816年,她在巴黎又和贡斯当聚会,但是在第二年便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嗣后,法国历史上还出现过比她更有才气、写得更多的女人,但像她那样宽阔而深刻的女人,已是罕见。

五、留在她身后之事的补充和交代

写到这里,就不能不最后交待一下贡斯当的命运了。

他比斯达尔夫人多活十三年。

1813年,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他出版了抨击拿破仑的两个小册子《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

1814年,贡斯当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回到巴黎,成为一

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赞成复辟,并为争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努力。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时,他先出逃,然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在国务委员会担任议员,为拿破仑草拟了一份宪法,并将在逃亡期间继续写就的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论适用于一切政治的政治原则》在这一年出版。

1816年,他和斯达尔夫人在巴黎有了最后的一次聚会,第二年,她就逝去了。贡斯当不可能不为这个女人的离去而悲伤。这一年,他也已是一个五十岁的不年轻的男人了。

常常,他会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在他这一生,有两大嗜好:女人及赌博。当然,当政治家和思想家才是他的正业。他的血似乎太旺,好像总也没有办法完全燃烧殆尽。他一生爱过许多女人,与斯达尔夫人却是最本质、最永恒的联系。他们是由于共同的志向和抱负走到一起,还有在相互间的冲突与和解中带来的种种非同寻常的感受。谁也没有斯达尔夫人那样让他的心跌宕起伏却又沉厚坚毅。总之,他在她身上看到的是振奋,是一个永恒女性带领他飞升的那种境界。他在别的恋爱中无法获得这种强烈的感情和思想在共同启迪下展开的高尚感。他已经是够出色了,但原有的虚无论和怀疑主义倾向在它们没有得到健康有力的引导时,它就可能是一种阴暗的毁灭性力量。他必须找到一个非凡明亮的存在来撕破如此阴霾重重的岁月。他在斯达尔夫人那里找到了这种明亮的光源。虽然她并不十分的娇娆妩媚,但已经够了,一个杰出天才女人身上强烈的力量之吸引,岂是那貌美年轻者可比?他和斯达尔夫人彼此的推动还有折磨,促使他们俩都写出了平生最好的作品。他才气袭人,却不是那种苦在骨髓的人,他天生有一种幻梦和享乐主义倾向。但这享乐不是口腹

之乐也不是优渥闲适,而是那种高度的刺激与亢奋。爱欲与赌博,都可以使人摆脱日常性,而他是如此恐惧日常性。

但正是这个人身上的任性放达的生活倾向,倒是成全了他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从1815年至1830年他逝世,他一直是法国自由派的领袖人物。说来也怪,大凡没有道德优越感的人,都本能地对自由的生活有一种向往,而那些颇具道德理想者,却容易有对专制秩序的好感。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个著名革命派人物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身上就有这两种表现。罗伯斯庇尔是个完美论的理想主义者,革命性立场十分坚定。他凡事肃穆庄严,没有日常的种种坏毛病和不良倾向。他没有什么世俗羁绊,回避女人,不要私产,一心只是投身革命。但也正是这个秉持道德优越论者,却是使大革命日益走向暴力和血腥的始作俑者。他自己最后也被这场革命推向断头台。山岳党人有高高昂起的头颅,他们激进、毫无妥协和通融,但正是他们在人民、公意的一致性和共同性目标之下,完成了由道德理想到道德嗜血的全过程。丹东原本是罗伯斯庇尔忠实的战友,但丹东的革命性和阶级觉悟似乎不那么坚定不移。他爱慕富有的资奁殷实的有产者女儿,他在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日子居然还想着添置房地产业豪宅,他绞尽脑汁想把自己原本卑微贫贱的出身姓氏换改成有贵族徽记的姓氏。他不仅仅是从革命中获得了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感到利益对于人的真实诱惑。当一个人想到利益,并且是个人私利时,他的革命意志就已经薄弱了。他已经开始有了对世俗生活的种种打算和筹划,这是与纯粹的革命追求和道德理想背道而驰的。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觉革命竟是与恐怖联系到了一起。当他躺在舒适的天鹅绒被褥之中,旁边有娇

喘吁吁的爱妻相伴时,他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这时的想法与在广场沸腾的人群中,在潮湿的地下室、在男人聚集的烟雾缭绕的会议厅时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时的感觉是只想安逸、酥软,心里窃想:让革命见鬼去吧。他有这样的念头,必然会被他忠实的战友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消灭。

贡斯当一生的理论活动,都是同对大革命的反省反思连在一起。他天性倾向自由,但在那里有更理智的成份。相比之下,斯达尔夫人就比他带有的感性色彩更浓郁些。斯达尔夫人对卢梭始终抱有好感,并引他为自己思想的启蒙者。卢梭那饱满诗意的语言,敞开胸膛让世人看到他的忏悔勇气的表现,都让年轻的斯达尔夫人倾慕不已。然而她没有看到卢梭的负面。

而贡斯当的自由观则是在对卢梭的批判中确立的。1819年,他在巴黎的皇家中学做了一次有名的讲演,题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这篇演讲关系颇大。

可惜,斯达尔夫人已命归黄泉,无法聆听他这次极其精彩的演讲了。

贡斯当重点讨论了卢梭的学说、意义及谬误。卢梭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自由,但他所谈的则是积极自由。但这自由是转让给集体的,个人并没有实现。卢梭并没有为个人价值争得位置,因此,贡斯当针对而言:“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这种人民主权的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导致新的独裁制度。”贡斯当谈论现代自由观,也即后来被伯林阐释的“消极自由”。

贡斯当在分析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之区分时谈到：“古代人的自由观是积极参与政治权力，而不是和平地享受个人独立。它主要要求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断的权利。那时，古代城邦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并且由于奴隶制度的存在为自由人提供了充分的闲暇，使他们可以有时时间和花费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与公共事物中。行使公民权是古代人的惟一职业，也是他全部生活的乐趣所在。在古代社会，政治是人们生活的中心。而在现代，政治则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地位下降，人们必须从事生产和交换，并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个人价值。”

接着贡斯当为现代人的自由下了确切定义，我们忍不住仍要在此摘录如下：

“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实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者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

贡斯当的判断清晰明确 ,于今读来 ,仍然有现实意义。

可惜斯达尔夫人是再也听不到了。她一生都在为这个渴望自由的骄子 ,为这个潇洒倜傥的男人 ,为这个杰出的政治家而心碎。她一旦结识了他 ,目光就再也无法从他身上移开。虽然依她那样的地位、才情和气质并不乏男人的簇拥 ,大革命前法国国防部长纳尔朋也曾是她的情人 ,但她一遇上贡斯当 ,就再也无法同其他男人共享鱼水之欢了。

贡斯当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 ,他以多病之躯参加了革命。他为路易——菲力浦的上台做了巨大努力 ,并与基佐一起起草了宣布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告人民书》。国王给他的回报是任命他为国务会议中一个部门的主席 ,并赠给他二十万法郎以偿还赌债。

1830年11月 ,贡斯当逝世 ,享年六十三岁。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历史的帷幕拉开而又阖上 ,人是有生亦有死。可是 ,却有那充分的个人 ,虽无以颐养天年 ,却以自己多情多彩的生命 ,为后人留下咀嚼不尽的话题 ;并且他们又以自己远大卓越的思想 ,拨开迷雾 ,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哀泣的繆斯

——安娜·阿赫玛托娃(俄)

莫非当年十字架旁的不是我，
莫非沉入大海的不是我，
莫非我的嘴忘却了
你的滋味，苦难！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诺 贝尔奖获奖者、美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曾用《哀泣的繆斯》作篇名，这里作一借用。他所论的是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的诗歌创作，评论十分准确和饶有分量。他说阿赫玛托娃属于那类既无家传又无可见的“发展过程”的诗人。这种诗人纯粹是“发生”出来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已有成了定规的词汇和独特的敏感。而她，则有充足的天赋，从来不需要模仿他人。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现象是，她有数不胜数的模仿者，却从来

没有能产生一篇令人信服的仿佛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最后，这些模仿者之间的相似远胜于同她的相似。布罗茨基说阿赫玛托娃的语言特点是由一种比精心推敲的风格更难把握的品质造就的。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将法国自然主义者布封有关的“自我”观念的著名等式的第二部分加以改进。不仅如此，她留在历史上的独特的引人之处还在于她美好的形象。她有着惊人的美貌，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类似东方人那样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似的浅灰蓝色的眼眸，身材苗条，体态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轻盈。无数的艺术家为她作素描、彩绘、铸像、雕塑、摄影。至于献给她的诗歌，合起来比她自己的全部作品之数更多。她的外貌令人啧啧称绝，而她的文字则证明了一个女人内在气质和才智完全可以与之媲美。她的作品是有形和无形两方面品质的结合。

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有“20世纪的萨福”之称，也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抒情大师。她的诗具有古典诗歌的优美、清晰、简炼与罕见的和谐，是古典诗歌传统与俄国诗歌现代经验的有机结合。

这样一个将美貌与光荣集于一身的女人，却被形容为“哀泣的缪斯”。她很早成名，从十八岁发表诗歌起，到《耶稣纪元——1921年》作为她出版的最后诗集，其后四十四年里她没有出版过自己的集子，发表也很困难。其间，她为了入狱十八个年头的儿子能够从强劳营获释，曾经写过一些爱国的战争诗章和歌唱和平重归人间的打油诗，但都不能算是她的出版物，而国家出版社为此所作的编辑不过是向一直注目着阿赫玛托娃的公众，尤其是外国公众，表明阿赫玛托娃还活着，健康，并且忠诚。这个哀泣的缪斯，不幸与她总形影相随。她结

过三次婚。第一个丈夫、著名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枪决，第三任丈夫、艺术家尼古拉·普宁被捕后不久死于狱中。还有友人的相继遭捕和死亡，儿子长期关押狱中，自己没有生活来源和经济保障，被病魔缠身……总之，一个女人所能承受的所有苦难她全部尝遍。她生得是如此惊艳超绝的美，并且上帝把那一份天才般的诗情与智慧给了她，但她一生却是在血腥中度过。她有可能被摧折，但她却坚持着以生命的柔韧和顽强活了过来。另一个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却没有活过来。她一个人以其孱弱双肩去对抗历史时间的黑色侵袭，然后去解决死亡的最终难题。她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与亡者在对话中交流以求得生的依凭，这是防止话语滑为嚎叫的惟一途径。她个人以菲薄之身躯对抗历史的巨大挤压，却没有空瘪，没有因抽搐而变形，面孔依旧典雅、美丽。

缪斯哀泣着，却同时美丽着。美丽便是对抗一切淫威的所有力量。一个女人，需要拥有多么巨大的忍耐、信念和绝对的审美才能在苦难面前作如此的坚持。她坚持着，坚持着对抗所有的平庸与邪恶。政治的邪恶有时是同政治的平庸无可区分的，极权统治的绝妙之处是将审美情趣下降，人的非人时代开始。在这无底的深渊中，活着，已经是不简单的一件事。阿赫玛托娃却不仅仅是维持着最低限度的活，而且她依旧活得美丽惊艳。即使快要活不下去了，也要撑着，不可随便结束自己的生命。茨维塔耶娃却是在生活的百般无奈和折磨面前，用一根绳子套在自己的脖颈，于盛年选择自戕。她这样做也不是由于软弱，而是她较之阿赫玛托娃有更桀桀不驯的个性。她那热烈奇想的能力，那上下腾宕的情绪与感受，使她的现代品格更为昭著明彰。她的所有举动都是艺术蹶颠状态下

的绝舞。她累了,就想伏在俄罗斯大地母亲的怀里休憩。白桦林依旧飒飒发出响声,传诵着献给一百年后的你的清唱,而红草莓依旧又大又甜,因为它是由一个女诗人的血浇灌。这是茨维塔耶娃的人生写照。而阿赫玛托娃则是那悠长深广的质地,她的存在本身便象征着优美与高贵。在她的一生中,时间同她的对话借助若干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天真、恋爱、信仰、经验、疲劳、历史、疾病、罪孽、腐败等等。所有种类的语言她都要一一品尝,她使最低劣的生活变得透明和崇高,最终她想要获得的是非凡圣洁的体验。这一切可以从狂迷的爱情开端,也可以从哀泣的苦难肇始。她的一生必须在真实事件中,其中包括掺进灾难性戏剧,这才能够探索出她本人以及痛苦的可能极限。虽然,幸福的场面也贯串着类似的探索,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有痛苦的彻底。这是起始,也是终端,通向上帝之路。极限,痛苦的极限,眼看就要断裂;巨大的缭绕,摇摇欲坠于深谷之时的惊心动魄,却是用一双纤手牢牢拽住自救的绳索。坚持,全部的隐忍、克己,以及内在的顽强之抵抗。悲剧作为一种戏剧在她身边上演,作为一种氛围将她笼罩。这悲剧事件带到这个有着惊人美丽和非凡领悟能力的女人身上,注定是为了造就她火焰与泥土、黄金与铅石般既纯朴又高贵的质地。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不仅属于时间,而且属于时间中的时间元素。她能够将一切变成精华,无论何等的丑陋、糟粕。她不是属于一种血缘的贵族,而是那独异于世的分泌吐哺和消化的器官,她将一切草料咀嚼,却养出了粉雕玉琢的皮肤,明亮迷人的眼睛和轻盈柔软的腰肢。这注定是上帝带给人类的礼物而不是尤物,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佳作。

俄罗斯民族，她的儿女个个都是绝顶的出色和优秀，你简直无法说清这是为什么。偏偏苦难也时时笼罩在这个民族的上空，它仿佛要用极限来考验这些出色子女的耐力和坚毅，故意要在他们身上施虐施暴。

一、我曾经狂野、冷酷、快乐， 根本不知这是幸福

1889年6月的一天，在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奥德萨近郊大喷泉，安德烈·高连科海军工程师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儿。父母亲当时都不曾料想这女孩儿日后将有如此的美丽，还有如此的智慧以及如此的悲剧。童年生活并不美好，这女孩儿日后说，她的童年只是在“斑斓的寂静中成长”，而“人的声音对我而言并不可爱，我能听懂的只有风的声音。”风的声音，还有对诗歌怀有极大兴趣的母亲那美丽的形象。——母亲那双清澈的眼睛，如大海般蔚蓝深邃，令人过目不忘。还有她罕见的姓氏、白皙的手臂，以及作为遗产的善良，这一切已经以最初的审美及世界的高贵种植下来。阿赫玛托娃听着风的声音，在寂寞无边的大庭已悉心体味到她出生年代的特征。那特征是古典的，尚未被摧毁的，又是引人入胜的，那里有着长及脚踝的白色裙裾的窸窣声，方格毛毯、胡桃木框的镜子、长毛绒面的扶手椅和煤油灯发着温馨暖人的光，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代的俄罗斯，这是审美的俄罗斯，又是贵族的俄罗斯。她的美貌得益于天生丽质，却又因了她心灵的敞亮，因汲取周围一切的和谐宁谧而被浸润滋养。

在她不到十三岁那年，全家迁入皇村，即今天的普希金

城。于是，这个原名叫安娜·高连科的少女也有幸徜徉于普希金曾漫步其间的街心大花园和林荫道。她后来写道，这是个迷人的玩具城：宫殿、花园随处可见，它们曾毁于战火，后又重建，但风格却与战前大相径庭。奶妈曾带她去富丽堂皇、翠绿欲滴的花园，或带她去玩耍的牧场，杂色马驹驰骋的赛马场，年代久远的火车站。夏天她与家人到黑海边，从此，她与大海成为好朋友。

一切，都在这个少女不动声色的谛听与观察中。她的种种触觉被拨动，于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内心。那幼小的身躯和灵魂还不足以担起太久的记忆，却是体味着当下，常常有深深的感动。出神时，骨髓中的凉气穿来有阵阵颤栗，诗歌，成为多梦少女的必然选择。因为在诗中，她可以凭窗而坐时，体味夏末的黄昏，看黑夜如何落幕，然后神秘的鸟啼、虫鸣响起。内心豁然，领悟即至，却是目光宁静，形容矜持、语言坚定。这少女凭窗的姿态，使她发展了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和声音。她朦朦胧胧意识到她来到世上的使命，一方面是倾听，另一方面是歌唱。虽然这歌唱不是幸福的甜蜜，而是苦涩的难捱。这是本质性歌唱，从心底发出，美丽、清凉、广泛、深入，不是抵达太阳的辉煌，而是代表月亮的隽永，还有忧伤。

十三岁那年，少女便酷爱诗歌，并且熟知波德莱尔、魏尔伦以及法文诗。十七岁时，当父亲得知她开始写诗，他要求她不要玷污他的姓氏，她答道：“我不需要你的姓氏！”她选择了一个鞑靼姓氏，从此，安娜·阿赫玛托娃出现了。从此，这个名字将被载入俄罗斯文学的史册。她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她这个姓名中五个开口的 A 音照布罗茨基的说法是具有一种摧人心醉的力量。它们把这个姓名的占有者牢固地放置在俄罗

斯诗歌字母表的最高位置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姓名是她写下的第一行成功的诗句,它造成令人难以忘怀的听觉效果,这足以证明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在听觉上有着多么良好的直觉和素养。从此,这个名字将声感和历史感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意义。

在她十四岁那年,比她年长三岁的另一个少年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狂热地爱上了她。对他而言,安娜是海之女神,是目光忧郁的美人鱼,是月亮女神,是夏娃。从那时起,即1903年之后整整的十年,无论是结婚还是分手,阿赫玛托娃在古米廖夫的生活和诗歌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几乎可以说他的全部诗歌灵感都源于她,源于他对她感觉和感情极其复杂的成分,无论恨爱。

古米廖夫心境高远,但外观上看却是个行动笨拙的青年,略带高傲的神色掩藏了内心的自卑。他博览群书,很早就开始写诗。那时他狂热地崇拜法国象征派作家。在诗中他把自己描绘成征服者,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不喜退让。他见到阿赫玛托娃时,她已出落成一个个子高挑的大姑娘,满头浓密的黑发如瀑布般直泻,白皙的双臂细嫩修长,略显苍白的脸上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在皇村幽静的池塘边,她是美人鱼,是女神。古米廖夫被她迷人的形象所吸引,不仅在诗中如此称呼她,还请一位朋友画了一幅“海中美人鱼”挂在家中。

在她十六岁那年,古米廖夫因为阿赫玛托娃不愿认真对待他的爱而陷入绝望,在复活节那天企图自杀。她为此感到震惊和恐惧。她与古米廖夫大吵了一架,两人决定从此不再见面。这件事,使她过早体会到死亡阴影的笼罩。她在晚年所写的诗中已意识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特殊性,美貌注定带

给她许多麻烦：“我已明了我注定/要犯下的种种罪行。”她认为人们越是对她倍加称赞,赞不绝口,她就越是害怕活在这个世界上。

1906年春,阿赫玛托娃又遇到古米廖夫,两人重新和好,并在整个冬季保持通信。但尽管如此,阿赫玛托娃仍是不能认真对待古米廖夫的恋爱。而古米廖夫似乎是堕入情网愈来愈深。他从不错过每次见到阿赫玛托娃的机会。为了离她近一些,他住进了她家的隔壁。而她总不能迫使自己动心,她也许压根不能迷恋他这种人,感动依然无法代替不了爱情。他再次遭到拒绝,他深感失望,初秋在巴黎又试图自杀。10月,他未告知父母,借钱来到阿赫玛托娃正在读书的基辅,试图再一次说服她嫁给他,但这次求婚又和前几次一样未获成功。12月他试图服毒自尽,过了一天一夜之后,人们才在布隆森林中找到昏迷的他。

1907年,十八岁的阿赫玛托娃考入基辅女校法律系。次年4月,古米廖夫在去巴黎途中顺路来到基辅,又一次徒劳地向她求婚。下一次相逢是在1908年夏,阿赫玛托娃到了皇村,而后古米廖夫在去埃及的路上在基辅逗留两日。在开罗的埃兹贝花园内,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自杀。事不过三,再狂热的爱情毕竟也会成为遥远的记忆,直到这次事件,古米廖夫才算开始厌恶起自杀的念头。

在阿赫玛托娃,她真的是怕极了,她担心古米廖夫多次试图自杀总有一次会使他丧命。她开始有些动摇和妥协。1909年11月她对古米廖夫坚持不懈的劝说作了让步。他们在基辅的‘艺术之岛’晚会上相遇,她终于答应做古米廖夫的妻子。1910年4月25日,年轻的情侣在第聂伯河后的尼古兰村教堂

举行婚礼。阿赫玛托娃的亲戚认为这个婚姻注定会失败，因此没有一个人参加她的婚礼，这使她深感耻辱。

日后阿赫玛托娃说，这个婚姻并非他们夫妻关系的开端，而是“终点的开始”。这场婚姻不能说是勉强，却是太过异常。几次自杀而求爱的坚贞不渝，都会成为过去。在阿赫玛托娃，已留下有不寒而栗的惊恐，并对这个求爱者身上的自我毁灭的决绝有种后怕。再说，这一切并不能激发她的爱，而是揪出她的愧疚和妥协。在古米廖夫，以性命为求爱之代价，再值得他去爱的女神，在狂热过后，他也不免恼怒，为自己的轻生和过于执著的狂迷而感到自羞自尊，然后又会殃及他人。他们本来是不该走到一起的，的确是因为他的顽强不懈。况且，又是两个诗人的结合，总是非人间的东西；况且，又是这样两个独异常人的诗人的结合，更是不可能人间长期驻扎。他们注定是不能过好完整的夫妻生活。从这时起，阿赫玛托娃一生的悲剧性命运似乎已经开始，已经定下寒楚苍褐的基调。但对他这个人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她总是被迫、勉强、勉为其难。缔结一场婚姻的前奏是由那么多血色事件构成，那黑色阴影是一群不祥的乌鸦缠绕在她身旁，她命运中的劫数是躲也躲不掉的。

对于古米廖夫来说，梦中的神秘女神，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象，他顽强的个性是偏偏要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他在不可得之时，宁愿去为她一次再次地死，他不会激流勇退，他一定要摘到月亮上的那颗蓝宝石，让美人鱼游弋在自己后院的池塘。诗人自有其诗人的生活逻辑和爱情法则。他与其说是爱阿赫玛托娃，不如说是爱自己的感受性，能够刺激自己灵感迸发的失望和绝望中的绝对体验与感受，然后将它转变为诗。

与其说他是在殉情,不如说他是在殉诗。对语言的狂迷和对爱情的狂迷交织一起,构成古米廖夫早期诗歌的风格。

两个诗人的结合,绝对不是一件幸运的值得称道的事。他们互相吸引,却又互相揣测着对方的活思想,哪怕每一个细微的感觉与眼神。古米廖夫对阿赫玛托娃的倾心是真的,婚前长期不倦地追求她,但在婚后,他立刻为家庭的束缚而感到苦恼。1910年9月,他离家沿着阿比西尼亚开始长期旅行。他在途中曾寄给阿赫玛托娃一首诗,诗中叙述着他如今变得病弱、无力,诗的结尾是:

一个女人在角落听了他的遭遇,
眼睛里隐藏起一丝恶毒的得意。

1910年到1911年这个阶段,古米廖夫在非洲长期旅行。1911年春,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这些集子中的许多诗篇都可以见出一位被抛弃、失去爱情或失去情人的女性形象,这当然不会是阿赫玛托娃所谓哀哀无告的形象,但它作为诗集的基本主题,描述了她在特定时间内心灵的特定状态。它包括了过去在内的此时此刻,并不暗示任何发展。尽管阿赫玛托娃笔下的女主人公有各种各样的外部特征,但总见出一个在黑面纱下紧握双手的妇女,这个人就像是“被丈夫用”对折的带花纹的皮带”抽打的农妇。

在读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时,人们很容易受到诱惑,把作者想象成要么是被丈夫鞭打的农妇形象,要么就像安年科夫在“耶稣死亡”中塑造的面容怨戚的照镜子的妇女,要么是一个用披巾裹着双肩,在台上朗诵诗的身材高挑的女郎,正如后

来她本人在“流动狗”咖啡馆朗诵诗一样。事实上她身上综合了这三种形象。

总在忧郁中，于是转向风，犹如在童年时听懂了风的声音。而这一次则不是在风中寻找慰藉，而是祈求在风中被埋葬。

儿子尼古拉·列夫 1912 年 10 月出世了。但他们的婚姻并未如古米廖夫在婚前所想象的那样成为“玫瑰色的天堂”。友人后来回忆说，当然，他们都太自由太著名了，不可能成为一对喃喃细语的“蓝灰色小鸽子”。他们的关系很快暗藏危机。从阿赫玛托娃一方来说，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从古米廖夫一方来说，他不愿屈从于任何魔酒，想要保持独立和对这个，唉，永远游离在他之外的，他始终摸不透她的心，这个多变的、不向任何人屈服的女人的尊严。

古米廖夫诗曰：

我了解这个女人 沉默，
痛苦地厌倦了说话，
她是活在她张大了的
瞳孔的神秘闪烁中。

她的心灵只会如饥似渴地
为诗句的铿锵的音乐而开放，
而对愉快的人世生活，
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阿赫玛托娃老年时谈论到与古米廖夫一起度过的生活时

间说,他们似乎是两个生物间的某种结合,而不是真正的婚姻。这样的两个人,住在神秘的高空,互相承担某些模糊的义务,彼此之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维系。

是的,阿赫玛托娃始终要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中她才能展开诗绪,她并不适宜作一个敦厚温良的贤妻良母。其实早在他们结婚前,古米廖夫在《亚当之梦》这首诗中就已明白了他即将娶的是什么样的妻子并描述道:

这就是夏娃——放荡,语无伦次,
这就是夏娃——圣洁,目光忧郁。
一会儿是月亮女郎,一会儿是人世姑娘,
但到处,永远都是别人的、别人的。

婚前她是别人的,而婚后呢?她却仍然是别人的。关键是她的心不在他那里。在古米廖夫1912年出版的《异国天空》诗集中,一些致妻子的诗揭示了他们夫妻的矛盾本质。

时至1964年,在阿赫玛托娃的耄耋之年,当她与自己的传记作者交谈的时候随口念了这首诗,并解释自己与古米廖夫的关系时,她指出“别人的”一词并补充道:“整个悲剧即在于此。”

古米廖夫爱她,却又厌倦惯常的家庭生活,这使得他始终处在流浪途中。但他却不能离开她。这个创造出阿克梅主义理论的象征主义诗人,是将她的形象作为一个生动的象征在创作中予以反映。在他狂热的爱情背后实际隐藏着对一个“女王”——一个“另一世界”姑娘——的爱。阿赫玛托娃为了真正的生活,曾企图抛弃这顶“女王”的桂冠。当她拒绝嫁给

他时,这种爱竟成为年轻诗人企图自杀的原因。古米廖夫体验过对女王、女巫、堕落的夏娃的爱,而不是对于妻子那样有血有肉的女人的爱。

你若比天使美丽三倍,
你若是河对岸柳树的姐妹,
我将用我的歌声杀了你,
却不让你的血洒落在地。

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他们在精神中搏斗着,厮杀着,并非在现实世界,而是在另一个由梦、诗歌组成的精神世界中。在这里,只有通过赎夏娃的罪亚当才能回到天堂。因为正是夏娃的缘故亚当才会失乐园。但亚当却是既不能与她一起生活也不能没有她。阿赫玛托娃肯定是背叛过自己的婚姻,但古米廖夫却怎么也不会放弃她,他说与她“分享过/最初的黑暗,/无论你成为谁的妻子,/我们罪恶的婚姻/都要维持下去。/我们对此相互隐瞒,/瞒着自己,瞒着上帝,瞒着末日”。

阿赫玛托娃一直在忧郁中度日,与古米廖夫结婚并未治愈她的孤独。她与在许多方面都和她相似的古米廖夫都不曾明白,他们这样子还为何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更不知如何抚养他们的孩子。阿赫玛托娃意识到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母亲,于是就把孩子托付给不大看得起她的婆婆教育。剩下的,就是只有他们两人的问题了。

二、听见雷声你会回忆起我 你会想 她曾期盼过暴风雨

阿赫玛托娃的诗开始刊登在各类杂志上,引人瞩目。她已成为阿克梅派的中坚。关于这个流派的来历是这样的:在较早时候皇村举行的“诗人车间”的一次聚会上,古米廖夫提议脱离象征主义。他们根据希腊语的“阿克梅”一词提出“阿克梅主义”,认为只有这个词才能确切地表达他们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即与象征主义的朦胧相对立的清晰。因为这些年轻的诗人以亚当单纯的目光看世界。他们的要求和世界观有其宣言是一致的,即回归尘世。他们拒绝到另一个世界寻求解救,坚信上帝就在人间,在现实生活中,生命是上帝的恩赐。他们不可能脱离更加严肃的现实世界,而只能通过理解生活,体验生活来理解上帝的使命。

戈罗杰茨基为新流派写宣言道:“阿克梅主义的玫瑰以它独特的花瓣、香味、色彩再次展现自我的美丽,而不借助与神秘爱情或其他物体的一般相似。”

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虽然仍是龃龉不断,他们在嫉妒背叛,甚至是在诅咒太过日常化情形中度过,并且写作取材于这些日常事件,但一些重要的诗人聚会,他们仍是成双结对的出入。

1913年,彼得堡“流浪狗”夜酒馆。这是流浪艺术家们非常喜爱的一间俱乐部。他们经常聚在这间窗户堵得严严实实,墙上由画家谢尔盖·苏杰伊金绘满鲜艳图画的地下室。

穿一件紧身的黑色绸衣,腰间佩着硕大的椭圆形宝石,阿

赫玛托娃轻盈地走进来。在入口处稍作停留，在向她迎面奔来的酒馆主人的坚持下，她把自己的近作塞进一个猪皮封面的本子里。

古米廖夫身着长礼服，系着黑色领结，眼睛不错过任何漂亮女人，在桌子间倒退着走，不知是要以此遵守宫廷礼仪，还是对背后向他射来的剑一般的目光有所顾虑。

尽管一般读者都把阿赫玛托娃的每行诗都看作自白，并且她作为一个漂亮女人在彼得堡社交圈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但她还是成功地在自己的生活前竖起了一道不透明的屏风。她在文坛已不需要任何人扶持。但她对此还像以前那样谦虚，认真地准备每一次亮相。画家尤里·安年科夫这样描绘当年的二十四岁的阿赫玛托娃：“这位腼腆、典雅、大方的美人儿，梳着直直的刘海，盖住额头，带着非凡的半似走动、半似手势的优美朗读——几乎是演唱她的早期诗歌。我不记得还有谁像阿赫玛托娃那样掌握这种朗诵技巧，这种音乐的含蓄美。”

只有阿赫玛托娃能赢得许多的画家、诗人和评论家的目光，她的美具有本质的穿透力，给人间带来惊奇，使尘世的审美尺度得以拔高。诗人、评论家涅多布罗沃曾这样描述她：“不能用简单的漂亮二字来形容她，她的外貌非同寻常，应该为她作一幅列奥纳多式的画，亨斯伯式的油画肖像，水胶颜料圣像画，更应该把她放在描绘诗歌世界的马赛克壁画的最重要位置……”

就是这个讲了以上这段话的人，后来深情地爱上了阿赫玛托娃。他同时是她所遇到的对她的作品理解最正确、最充分的一位。而且其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仅理解她是个什么样

的人，还能预见她将成为怎样的人。

他认为，对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来说，“诗歌是生命的拯救者”。他又说到，尽管她描写不幸的爱情，但她的声音中并没有软弱或感伤主义。而且她的忧郁、凄凉心境的产生是因为她希望深刻体验各种感情。他建议阿赫玛托娃完成普希金的遗训：

“走吧，沿着那隐秘的幻想昭示你的方向。”

她写过他，却是写她不祈求爱欲，只是久久地面带微笑的凝视。显然，她不能以深爱的方式回报这位可爱而又可贵的朋友。这使她始终感到内疚。这种感情在她的诗中有所体现，说的是：亲近的人之间有一条界限，热恋和激情也不能将它逾越。哪怕唇与唇在可怖的岑寂中融合，哪怕心儿因爱情而碎裂。友谊在这里无能为力。岁月，充满崇高的炽热的幸福。当心灵自由自在，当心灵与欲望的迟缓慵懒格格不入。

追求它的人——神魂颠倒，
而获得它的人——忧郁苦恼……
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我的心
在你温柔的手下并不狂跳。

这是诗人最优秀和最冷酷的作品之一。她只有友谊，而没有爱欲，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就是这真实残酷的感情。1919年，可贵的朋友涅多布罗沃死于结核病。

涅多布罗沃并不是惟一认为该为阿赫玛托娃画肖像的人。从古米廖夫起已有多位诗人为她作诗，刻画她的形象。对她以后的挚友、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她是带着古

怪的救世主烙印的黑色天使，而勃洛克则在她的美丽中发现了魔鬼的痕迹。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创作了组诗《致阿赫玛托娃》。

为阿赫玛托娃作的诗、画、雕塑作品迅速增加。早在她去世前，这些专为她创作的作品几乎已经是无与伦比了。她是一件杰作，是上帝带给人间的一份礼物，是俄罗斯黑土地盛开的名贵之花，是清寒孤冷的月亮女神。

她必须写诗，并没有想到为历史，而是因为她做一般的女人，比如妻子和母亲不可能做得更好，而她做诗人则可以做得更好。她天生是属于那种为诗而存在的女人。她的诗并不高深渺茫，而是切近，就在你日常瞬间许多无以言说和很难捱过的时表。她写自己种种的心理活动，你和我同时的背叛，却又无法矫正自己全部感觉的矛盾与挣扎。有内疚，有自尊心的受伤，如哀泣的糜鹿。但她更多的如布罗茨基所言：“是自责而不怨天尤人，是雄辩的宽宥而不是谴责；是祈祷而不是呼喊。她向人们展示了她从19世纪俄国散文中学得的全部细腻情感和复杂心理以及她从那一时代诗歌中染上的高贵气派。此外，这些诗里浓重的讽刺和超脱的口吻也与众不同，它们是作者形而上思辨的产物，而不是遗世独立的捷径引导的结果。”

1914年，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的出版使她成为俄国最受欢迎的诗人。战争的硝烟已经笼罩在俄罗斯上空，而《念珠》却一版再版。如果说《黄昏》主要叙述一位被情人抛弃的妇女，她上天无门，只能等待死亡，那么，在《念珠》中诗人则逐渐找到得救的道路。而第三本诗集《白色鸟群》也为强大的希望之流涌入。

但这些集子都远离了阿克梅主义所谓男性的生活观，而将读者引入一个封闭的、充满感伤情调的私生活世界里。她既没有去史前时代寻找灵感，也没有到异国风情中获取题材。虽然她使用的是狭窄的生活材料，却为俄国诗歌恢复了澄明世界和具体形象。她不但克服了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也克服了古米廖夫的自命不凡。勃洛克发现了这一点，把她同其他阿克梅主义诗人区别开来：“只有阿赫玛托娃是个真正的例外，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个阿克梅主义者，但无论如何，在她疲乏的、病态的、女性的和内省的风格中是找不到半点旺盛的体力和精力的。”

即使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但爱情仍在继续着，希望和绝望交织的感情也在继续着。

难言之隐的爱情不单单是与古米廖夫的夫妻生活。1913年，青年诗人科尼亚泽夫因无法忍受对美丽的舞蹈家苏杰伊金娜的单恋而自杀。阿赫玛托娃当时也爱上了这位诗人，她在后来所写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生动地再现了1913年。这本集子有科尼亚泽夫的影子，也有曼德尔施塔姆影子的重叠。那些优秀的男人，是阿赫玛托娃都想牢牢拥在怀里的。她与古米廖夫是在某种神秘的精神高度上订婚，这种精神联系非常强烈，几乎整整十年在影响着古米廖夫的诗歌和她自己的诗歌，但他们却完全不适合家庭生活。她在诗中总见出一个人物欲携她同赴地狱。这威胁到她的自由、诗歌、个性：

浑浊的眼睛，
紧紧盯着我的戒指，
明朗而又凶恶的脸上，

肌肉纹丝不动。

她与古米廖夫结婚,而她又都同时热爱着除他们之外的男人和女人,这是创造的“力比多”使他们必须要无视传统秩序和伦理。彼得堡的夜风总是过分温柔,让人迷乱心性,诗歌朗诵过后,总有无法平息的感情潮汐指派着他们去体验边缘狂舞。深夜不愿睡下,却是枕在爱人的臂弯,不是家的暖床,而是途中相遇的草苔,这里才散发出醉人的幽香。阿赫玛托娃已理解了尘世间男欢女爱的意味,也理解了种种的伤痛磨舌:

尘世的饮料太甜,
爱情的网太紧密,
但愿有朝一日孩子们,
能在课本中读到我的名字。

她明白她日后之所以能有人记住她的名字,就在于她那份无人取代的矛盾重重的心理体验。在心理体验中,总是将自己关闭于幽所,故此,她的诗被称之为“室内性”的女性诗歌。阿赫玛托娃并不避讳自己诗歌的“室内性”,相反,她非常看重自己嗓音的“女性”音色,并强调说,女性诗人的主要任务是“充分表达自身和周围世界中最为隐秘的和异常单纯的东西”。她将爱情体现的难言之隐与女性心理的全部微妙和盘托出。

1918年4月,她与古米廖夫的关系彻底破裂,从此她再也没有回皇村的家。她对那里始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

她把这种感觉解释为对古米廖夫惨死的一种预感。

1918年4月,先后在巴黎和伦敦逗留的古米廖夫回到俄罗斯,阿赫玛托娃提出离婚要求,5月他们共同去古米廖夫的母亲那里看望已六岁的儿子,这是他们两个的最后一次见面。同年8月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三年之后,1921年8月,古米廖夫因彼得格勒大学教授塔甘采夫及有关人员被判犯有反革命活动罪而被牵连,遭逮枪决。他是因此事被契卡人员处死的近60名男女中的一员。从此,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出现一个新的音调——恐惧:

你已不在人世，
不能从雪地上站起。
身上二十八处刀伤，
枪杀有五处。

给男友的一套新装，
我已在痛苦中缝制。
这俄罗斯的土地，
喜欢将鲜血舔舐。

三、顺着或者逆着涅瓦河的水流， 只要能离开自己的坟墓

阿赫玛托娃早年的声誉达到最高峰。1916年初,《阿波罗》杂志刊出了阿尔特曼为她画的肖像,这使得她的容貌为人

所知。楚楚动人的外表、风度以及她那著名的披肩，这一切构成了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1917年，她的诗集《白色鸟群》问世。人们似乎总能从她的诗中找到现实的真实。这本诗集的一大部分是献给1916年2月她在皇村遇到的艺术家安列普的。曾先后在巴黎及伦敦侨居的安列普回国是为了参战，奔赴前线之前的他再次同阿赫玛托娃会面，并送给她一件礼物，这是他在一座被毁的教堂里发现的一个祭坛上的十字架。与安列普聚散的种种细节都被她写进诗里。阿赫玛托娃与有些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用感情深浅程度而不是用见面次数多少或持续的时间长短来衡量。这种人为数不多，安列普就属此例。尽管1917年以后她才从他那里得到过二三次音讯，而两人在1965年才得以重逢，但他却在她的生活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她并没有同安列普发展到更深一层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婚姻关系。他们在精神上有更紧密的联系。而阿赫玛托娃在1917年前后，是决定同希列伊科谈婚论嫁的。

希列伊科是一位著名的亚述学家兼诗人，据说他才十三四岁就已翻译了一篇用古埃及文字写成的文章。在与古米廖夫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后，阿赫玛托娃与希列伊科结婚并赴莫斯科，想在那里定居。后来又返回彼得堡，他们成了“喷泉街”上的住户。

后来阿赫玛托娃坦言自己的初衷是想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做点事。而且，在认识希列伊科之后的一段时间，阿赫玛托娃的确在诗坛有所沉默。也许她觉得，若为了他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才华就能解决婚姻中常遇到的麻烦，她就试着那么做。她已经不会再有与古米廖夫共同生活时的那种对抗。

然而这一次她又错了。

希列伊科需要的是纯粹的妻子而不是女诗人，他把她的手稿都扔到了火炉里付之一炬。从最开始起，她所描绘的对他的感情就没有乐观积极的色调。1917年她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内容大致是：你不许我欢笑，也不许我吟诗，而祈祷早被你列入禁条。你逼得我既脱离人间又背离上天。仿佛你已把地狱和天堂搜遍，夺走了我自由的灵魂和意志。但是，阿赫玛托娃却仍然依从了他，虽然认为他是严酷的情人，却是任凭那像烈火，像镣铐般的爱情，将她幽闭。自从与古米廖夫分手，她是太想获得一次成功的婚姻了。

但日子的确不是太好过。1918年4月，她又一次写诗，其间仍是这种哀怨、无助：你为什么要惩罚我？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甚至她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有必要，你就把我处死，但千万别对我这样残酷，你不愿同我生养孩子，又厌恶我写的诗。她觉得自己在备尝折磨中逐渐变得面色发黄，体弱多病，拖着双腿、步履艰难。希列伊科的形象经常出现在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对我来说，丈夫是刽子手，夫家是牢狱。”她有许多诗好像写着献给希列伊科，但她为的是阻止流言的传播。她第二次婚姻注定了不幸与悲剧的结局。

当然，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阿赫玛托娃在1918年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人联系起来。与古米廖夫婚姻生活的失败，使她渴望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的证明。希列伊科的残酷与专制被她误以为是这种东西。她曾将自己比作一个旅人，在井水下毒从而自掘坟墓。由于焦渴难捺，一旦发现了这口井，她全然不会意识到井水有毒，就喝起水来。

在这一时期,她诗中频频出现“暴君”的形象,同时出现的还有“真正情人”的形象。

1922年夏天,她与希列伊科分手,终于摆脱了他的统治。

自此,她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创作的欲望。1921年,她写下了二十五首诗。

不断的写诗,又不断的恋爱。当然在恋爱的失败中,她将自己定位为“女朝圣者”,希望通过皈依的形式来使自己净化、纯洁并重新获得力量和平静,但这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不可能在完全没有男人的世界一直孤独下去。她即使不去寻找,别人也会寻找她。与希列伊科分手后,阿赫玛托娃与自己的女友苏杰伊金娜住在了喷泉街18号。在那时,她与作曲家兼演奏家阿瑟·卢里叶彼此接近。此人被她列入未婚夫候选人之列。于是就产生了类似三角恋爱的情形:阿赫玛托娃——卢里叶——苏杰伊金娜。不久,很奇怪的是苏杰伊金娜就与卢里叶移居国外了,从感情上说,卢里叶对阿赫玛托娃似乎更亲密。却为什么阿赫玛托娃与卢里叶没有共结连理?1962年(已经四十多年后),卢里叶写下了对遥远往事的回忆。他说他曾尝试着把阿赫玛托娃从那里拉出,但她很执拗,不愿前往他让她去的巴黎。而苏杰伊金娜倒是一口应允,不久就跟他走了。三人在喷泉街居住的种种情形《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里用密码的形式写到了这一点。在晚年,卢里叶通过与友人的通信想了解阿赫玛托娃的消息。他说她现在已七十三岁了,可他眼里所记住的永远是她二十三岁时的模样。阿赫玛托娃与卢里叶的这段姻缘不成,当然有原因。不愿离开俄罗斯,这是阿赫玛托娃一贯的思路。无论这块土地以怎样的血腥浸渍,她都不愿离开。这里有她诗之灵感之源泉,有她忠实

的读者。她无论被逼到什么境地,都必须同这块土地连在一起,她到了国外有什么呢?她明了她不可能仅为一个男人活着,仅为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活着,无论这男人怎样爱她并答应带给她这种生活。在她那里,诗是比一切更重地存在于她的生命中。

当感情都纷纷远遁的时候,阿赫玛托娃一个人常常陷入对旧事的翻捡和思索中。比如,古米廖夫事件之后,阿赫玛托娃有恐惧,也有负疚。她后来再一次阅读古米廖夫当年写给她的诗。她知道,对他来说,她不是尘世的女人,而是冬天的暖人的阳光,是故乡粗犷的歌声。这是少年时期相遇知己对她的读懂。再一次去阅读这句话,她有比以往更深的感动与感激。那已在冥界的古米廖夫,当年对她爱得是那样深。可惜当年她或是太年轻,或是她对他的感情不怎么看重,总之他却是无法调整好彼此的关系。这里面大概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婚姻这种形式本来就不适宜这样两个都太著名、太渴望自由的人。比如有一次,古米廖夫出发去非洲旅行时说,这次旅行对他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解脱都十分必要,而且这种“逃跑”也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爱她。此外,他肯定了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他与阿赫玛托娃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当时她并不这么认为,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现在,她不得不承认:限制爱人的自由等于束缚他的翅膀。

哎,往事会渐渐久远。

阿赫玛托娃又能怎么样呢?她在急风骤雨的革命中失去了大部分亲人、朋友,她在诗中塑造的自然是一个双手掩面的女人,不仅为爱情的失去而祈祷,而且为她故去的亲人、朋友而祈祷。无论日子如何在惊恐不安中度过,她执拗地描写爱

如野草般在黑土地上的不死与翻飞。诗之品格便是这样的一种品格。阿赫玛托娃以自己始终活跃的内心，古典优雅的词语方式不断充实着读者储存着的记忆，以帮助他们抵御所谓新时代的庸俗侵袭。领会个人生命戏剧中的深奥哲理有助于人们在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已越来越急、越来越近，那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哪里？不正是在那依旧存有的细腻感伤、优美的抑郁中吗？一颗粗糙麻木的灵魂很快会被历史的溃退击成碎砾，到最后，什么都不曾留下。规律的无情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人有雅致婉约的感情在，就什么都有，而丧失了这些，就什么都无。

阿赫玛托娃其实就是以这种方式承担着历史的重负。

还不仅仅应该看到阿赫玛托娃在诗中描写的爱情种种斑驳陆离的感情轨迹。在古米廖夫死后，她的诗中不断出现的还有对罪的承担的内容。这是由负疚而带出的赎罪。她的意识不在具体的罪行上，而在于检省个人，其感觉已超越普通事件和个人遭际而进入到宗教的悲悯情怀。《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诗集的特殊意义和主题就在这里——在死者面前的负罪意识至死无法摆脱。应该说，以个体承担的方式去承担一个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将是努力促使这民族改变这一命运的第一步尝试。

不是她对那已死者必须要担有什么必然的责任。年轻的科尼亚泽夫因无望的单相思而自杀，她有什么责任？涅多布罗沃在盛年死于肺结核，她有什么责任？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枪决，她又有什么责任？一层又一层的灾难压在了她的双肩，她其实在目睹她的亲人朋友死亡的时候，是比死者所要忍受痛苦的时间更长。但她却是要承担罪的熬煎。这负罪感缘

于她活着,并且在更早的时候因巫术般的直觉本能而感觉到将会发生某种可怕的事。她为她消极的预言感到恐惧不安,为此她必须迫使自己为这种能力,为发生的这些事承担一定的责任。她要赎罪,是因为只有首先承认她个人的某些行为中也包含罪恶,更深深地参与到整个人类彼此施恶的罪体验,才能使人类的这种悲剧减少一些。这里面已包含了很深刻的宗教感以及哲学内涵。但她那时还没有如此明确的意识,并且后来她的这种最为可贵的品格则成为某些人对她误解和攻讦口实。她只有苦笑了之。

四、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伤口和痛苦的云朵

1919年,十月革命后,她在农业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诗集《车前草》出版。1922年,又出版诗集《耶稣纪元》。也就是这以后不久,她的新作被禁止出版和发表长达几十年。对她的批判也逐渐展开。

革命了,而革命后的苏联已不再需要阿赫玛托娃,而需要马雅可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对这两个诗人倒有比较确切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革命前一切珍贵财富的节俭的继承人,她具有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赋予人们的心灵的雅致与魅力。而马雅可夫斯基字里行间流露出当今革命时代的气息,有信仰、呐喊、失败与狂热。她是离群索居的沉默的女人,永远封闭、寂静无声,而他,却是粗俗的集合性诗人,整个地融入人群,他本人就是人群。

如果仅仅在艺术上评价这两种诗人的不同风格倒也罢了,而革命后的一切则是要把一切都搅到政治方面去,它要铲

除前者只保留后者。形式主义者艾亨鲍姆后来所说的那句著名的也是被频繁曲解滥用的结论,使阿赫玛托娃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因双重性(更准确地说——矛盾性)而令人难以信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已开始定型——不知她是情欲强烈的荡妇,还是一贫如洗的能求得上帝宽恕的女修道士。”后来这段话也被执掌苏维埃意识形态权力的日丹诺夫重复,这就使阿赫玛托娃的处境变得不再可能有所好转。

那时的情形是:革命后的社会没有阿赫玛托娃的一席之地。有的人认为一旦赶走了她,就像清除掉苏联诗坛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样,然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就会走向新的广阔天地。

阿赫玛托娃的处境一天天恶化。古米廖夫、勃洛克、涅多布罗沃已不在人世,安列普身在西欧,而卢里叶、苏杰伊金娜及其他许多友人侨居国外。阿赫玛托娃时时受到攻击批判,并且从1925年起,俄共的机关刊物以非正式的决定禁止发表她的所有作品。这时候她还经常生病。倘若说她的病没要了她的命,完全得助于她身体内部的另一种抗体。阿赫玛托娃这时陷于孤独、悲苦的艰难境地。但从20年代中期,她开始克服极多痛楚,致力于研究起旧彼得堡的建筑和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她不能使自己勤于思考的大脑停滞下来,那样她会窒息而死。

革命了,她又能怎么样呢?她不准备像接受邀请一样很快接受社会秩序的变化,来改变她惯常采用的格律和联想链。她忠实自己的词汇自己的声音。她要用个人心灵做的多棱镜来折射而不是反射生活。

阿赫玛托娃又凭窗眺望了,犹如她少女时代的出神。辽

阔的俄罗斯土地,不仅有槭树、椴树,更有白桦。它修长拔萃,清逸俊峭,这是阿赫玛托娃喜欢的树木。在写于晚年的文字中她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描述它:“这是一种魔力。这是一种威严的、悲剧的东西,像‘拍加马的祭坛’一样,这是一种美丽的、不可再现的东西。似乎,那儿应该有乌鸦。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些白桦更好的东西了,这些白桦高大、健壮、古老、像得鲁伊特,甚至还要古老。”白桦林成为她心灵的圣树。

1925年春,她病了,并且病得很重,她与曼德尔施塔姆年轻的妻子娜杰日达躺在皇村的结核病疗养院。高烧不退。公园就在附近,她们竟没有气力去。正在这时,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尼古拉·普宁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这种境遇下,有一个关怀自己的男人,那感情的生发就比平常更被看重了。娜杰日达认为普宁人虽然聪明,但举止粗野,在社交界不讨人喜欢。不过当时他明显地表现得殷勤周到,使病中的阿赫玛托娃感到慰藉。“在向女人献殷勤时,所有的男人都那么好”。阿赫玛托娃这样评价说。没过多久,她就把自己在“大理石穴”的那套住房留给了希列伊科,自己搬入了普宁在喷泉屋的住所。1928年阿赫玛托娃与希列伊科正式离婚。而普宁却没有与第一位妻子离婚。虽然阿赫玛托娃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比谁都长,但他们始终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对她来讲,眼下办理手续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当时苏联的婚姻法规极不严格。

嗣后,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生活在一起。

她依旧在艰难的生活中,其日常生活的极端贫苦和缺少穿已显而易见。这时她不能发表任何东西,又没有固定的收入。这种生活窘迫以至连莫斯科的熟人们也不能视而不见

了。但即使如此，画家奥斯梅尔金发现无论怎样，总无法更改阿赫玛托娃的雅致。无论什么天气，她总是头戴一顶旧帽子，身穿一件单薄的大衣。女友舍戈列娃去世后，阿赫玛托娃才穿上死者遗赠给她的一件旧皮袄。她人很瘦，总是留着人们所熟悉的刘海儿。她善于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的衣着怎么看也不寒伧。当社会上还未看惯妇女穿裤子时，她在家时常穿着一件浅红色睡袍。与阿赫玛托娃相识于三十年代的尼古拉·哈尔吉耶夫回忆起他初次到阿赫玛托娃在喷泉屋的住所作客时的情景：她住在三楼，她的房间里放着一张长沙发，上面铺着一条华美的沙发巾，这是一件古老的农奴作品。他为女诗人过人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特有的幽默感所倾倒。然而，他又感到她的有些地方很像她的诗歌，他并不喜欢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他还沉迷于未来主义。阿赫玛托娃告诉他，她很高兴结识一位与众不同的、未对她的诗歌着迷的人。后来，哈尔吉耶夫又在曼德尔施塔姆那里遇到过阿赫玛托娃，并且发现两位诗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内在联系——一种磁力。

阿赫玛托娃在很艰难的处境中，极其渴望一种平静的生活，渴望一个家，想要寻求一个稳妥安妥的后方支撑。她甚至不再以为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琐屑平庸一定会与诗发生龃龉。但命运却又决定了她与普宁不能白头偕老。外围的压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总会遇到种种的难题和无以叙说的荒唐。压力加剧，她在1934年已亲眼目睹了挚友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随后大规模的逮捕、流放和镇压逐次开始。在恐怖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她与普宁的关系非但没有给她以支持，反而变成“两人相伴却孤独”的情形。家没有给人以鼓舞的生活，

当然难以称之为是幸福的婚姻。普宁千方百计向阿赫玛托娃暗示自己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为的是告诉她,相形之下,与她在一起多么地乏味。这种情况下,早在1930年,阿赫玛托娃就打算离开普宁了,她的一位朋友曾打算为她找一间住房,但普宁吓住了此人。而现在,普宁的炫耀似是想让她留下来与他在一起。后来阿赫玛托娃将自己与普宁当时的生活比作秋景,那种景色总引起她对皇村的家的回忆,在那儿她曾感觉到古米廖夫被捕和遭处决的悲剧降临。她认为总有种种的考验的多级本性构成她的生活。她研究普希金,是因为他与现在的她在许多方面都有神秘契合处。在她所撰写的论文《石客》一文中她特别强调了普希金式的幸福恐惧症。这可能正是她本人的感受。她写道:“普希金是那么害怕幸福,就像别人害怕痛苦一样。他有多么愿意承受痛苦,在幸福面前,当然也就是在失去幸福的必然性面前就有多么恐惧。”与普希金一样,阿赫玛托娃不得不重新认识到重要的一点:苦尽未必甘来。

1938年底,阿赫玛托娃与普宁彻底分手。

1953年初,普宁死于阿别兹劳改营。阿赫玛托娃对这个怀有相当复杂感情的人写下这样的诗句:

无论是悲是喜,对我的声音
一颗心再也不会应答。
一切都已结束……我的歌声传入
空荡的夜晚,那儿不再有你。

1953年3月5日,就在普宁去世几周后,斯大林去世了。这都是后话了,而眼下依旧是1938年初春3月,儿子列

夫再次被捕,这已经是个饶有思想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这一次,不再是短暂的拘捕,而是要他度过长达十八年的监禁与流放。

没有机会发表诗歌,并且生活极其贫困,她基本上以黑面包和不放糖的咖啡对付着过。她很瘦,并且体弱多病,但在无论在何种状况下,无论在什么天气里,哪怕天寒地冻,她仍要经常站在监狱旁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中,徒劳地希望见上儿子一面,或者哪怕是托人转交些东西也好。有时她病得不能去排队时,朋友们就代她排队。

这时刻,她已经陆续在构思和写作她的组诗《安魂曲》了。诗集写作于1935年至1940年,1957年才得以在苏联国内问世。她在当时只能写在纸片上给朋友看,待她确信读诗的人已经记忆住了这些诗句时,就把纸片烧掉。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某个友人私下会晤,请他或她轻声朗诵某一首诗,这就是她的储存手段。这种防范并不多余,有人因为比一张手写的几行字的纸片更小的东西失踪,并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人世。阿赫玛托娃担心儿子的生命胜过自己,他在强劳营,为了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片,他会比她付出更大的代价。纸上的字随时会变成儿子的死亡判决书。

1957年她在出版此诗的代序里讲到写作《安魂曲》的由来。那是在叶若夫(1936—1938年间曾任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残害过不计其数的无辜人士,以阴险和凶残著称)主义控制的恐怖岁月里,她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度过十七个月,一次有人认出了她。那时一个嘴唇发紫的女人站在她身后,她没有听说过阿赫玛托娃的名字,但此时这个妇女从已经习惯的那种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凑近她的耳朵问道:

“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么？”

她说：“能。”

于是，一丝淡淡的笑意从那张苍白的脸上掠过。

这是一个母亲背负苦难十字架的塑型。它以纪实般的准确性刻画出苦难历程的所有阶段。这是一个只有尸首才能微笑的时代，在黑色囚车的碾压下，无辜的俄罗斯在痉挛中挣扎。

《安魂曲》为一个苦难的时代实录。诗人如果缄默不语，则是犯了反人类罪。

1941年，与她彼此神会的俄罗斯另一个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自杀。她的死使阿赫玛托娃极为震惊。她手里握有茨维塔耶娃1916年写给她的献辞。

五、青年时代我偏爱建筑和水 而现在则更喜欢音乐和土地

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从国内的恐怖到国外的御防，人们似乎觉得自己身上的绳索有些松弛下来，人们开始群情激昂起来。这一年9月，在城市遭到敌人炮火狂轰滥炸时，阿赫玛托娃通过电台向列宁格勒的妇女们讲话。在空袭的时候，人们还经常看到阿赫玛托娃头戴防毒面具，背挎一只小包在喷泉屋的大门旁值勤。后来，她与许多人一道疏散到塔什干。

在塔什干，她忍受着与男友弗拉基米尔·加尔申的分离。1938年离开普宁后，加尔申这个职业医生便闯入她的生活并扮演起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曾有一个

部分是献给他的。但是后来阿赫玛托娃把有关的献辞取消了。

受了长期被迫四处为家、受着寄人篱下折磨的阿赫玛托娃在加尔申的追求下同意嫁给他。但是,战争、围困、撤离打破了他们的计划。在塔什干,她急切地盼望加尔申的来信。阿赫玛托娃当时病得很重,加尔申的杳无音讯使她闷闷不乐,大家为她的生命安危担心。后来信件来了,有一封信是向她求婚,但条件是婚后她必须随他的姓氏。

1944年6月阿赫玛托娃从疏散地回到列宁格勒,一回来她就得知,加尔申对她只字未提,便与一位护士结了婚。这对她来讲是个极大的打击。这一年她已经55岁了,她愿意在晚年有一个归宿,有一个彼此体贴疼爱的人在一起,而如今这愿望落空了。后来楚科夫斯卡娅说,显然,这个她自己也曾尊敬和爱戴过的加尔申由于围困造成的饥饿和负担丧失了理智。一年后,阿赫玛托娃在一首诗中写到加尔申,写到这个人如今对她已算不了什么。他曾经是她的牵挂,苦难岁月的安慰。但现在他已如幽灵般徘徊在郊外、僻巷,只是在生活角落,一个被疯狂夺去理智的、张牙舞爪、脾气败坏的幽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从二战中走出,并经历了许多的感情挫折之后,阿赫玛托娃开始对个人生活进行重新评估。她想用一种更加健康结实的形象出现,再说,她也真的是历经沧桑,开始往老境上走了。她整个的一个人换了一副模样:她那人们所熟悉的齐眉刘海儿剪去了,伤寒症痊愈后她的体型开始有些发胖,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的美,只是加入了些雍容华贵的东西。一切的苦难仍无法摧折她。她开始走出幽闭,社交圈在扩大,举止也有些变

了。她整个看上去精神抖擞又十分平静。停战后,她原想在战后与加尔申一道共同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破灭,她又成了一个单身女人,而且可能今后她会一直单身下去,她今后也是可以不借助于任何别人的感情来收拾和料理自己的生活了。她好像走在一根架于峡谷之上的钢丝,需要自己时时地保持住身体的平静。而且她已知晓了“起点和终点以及身后事”,这又能拿她怎么样呢?然而诗歌,对她这一生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为它而活。

战争甫歇,原以为一切会好起来,然而她的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倒恶化。1946年9月,她被日丹诺夫点名批判,并被开除了苏联作家协会,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左琴科。她一本正在付印中的诗集也被毁。人们为躲避嫌疑,不再同她来往,她日益陷于孤立境地。

也许造成这场祸端的是她与以赛亚·柏林在1945年秋的一次会面。但这是一次对阿赫玛托娃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她从不后悔,即使日后为此付出那样沉重的代价。

这个柏林便是著名英国哲学家柏林。他所写的著作是那种常识清晰、理性睿智而又文笔超逸的妙文,《两种自由概念》、《俄国思想家》出自他的手笔,名篇名句,可谓遐迩闻名。

此时的柏林,在1945年秋正临时接任英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的职务。在此次列宁格勒之行期间他顺便到涅瓦大街的一家“作家书铺”转转。在此,他向身边的人打听许多从战争爆发后便杳无音信的作家的下落。正好左琴科在隔壁,于是他打听阿赫玛托娃的情况,左琴科帮助他们见了面。

这是一次纯属私人性质的拜访。是在晚上,柏林到阿赫玛托娃家。当柏林到时,那里已是宾客云集。但时间已晚,客

人们很快就告辞离去。阿赫玛托娃感到很不好意思的,除了水煮土豆外她再也拿不出什么食品来招待客人。

他们谈了许多,谈了一些两人共同的熟人,谈到阿赫玛托娃仍忠于的古米廖夫、卢里叶、希列伊科、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并谈到安列普和茨维塔耶娃。但她无法去谈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被捕和惨死对她来讲是一处无法愈合的创伤,当她试图谈起这个时,便泣不成声。

阿赫玛托娃的房间几乎空荡荡的,房中有一口刚够装下手稿的抽屉橱,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莫迪利亚尼所作的素描画。阿赫玛托娃为柏林念了自己的诗歌,其中有《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据柏林所言,对他来讲这部作品仿佛是一首响遍全欧洲的安魂曲。

不知不觉,天已放亮。谈话仍进行着。待柏林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是中午十一点。

有人在监视。并且之后,阿赫玛托娃的住处被装上了窃听器。

虽然与代表“另一世界”的交往没有好结果,但一切对她来讲是如此宝贵和重要,她再一次因支持她的人们而感到自身生命力的旺盛。她为柏林写下这样的诗句:

而带着你的一点怜悯之心
走着,犹如体内带着一片阳光。

虽然她曾十分坚信后来的一切不愉快经历与这次会面有着直接关系,但她仍认为这次会面是个奇迹。在她以后写的诗中是这样谈论柏林的:

他不会成为我亲爱的丈夫，
但二十世纪的骚动不安
则应归功于我和他。

1956年夏，苏联国内的政治高压似有所降低，儿子列夫获释。此时，正在莫斯科的以赛亚·柏林给她打来电话，请求与她见面。阿赫玛托娃很想见到柏林，但她仍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因为她害怕这会导致她儿子的再次被捕。这次通话以及不能见面的无奈令阿赫玛托娃回想起1946年两人结识时的情景。倏忽间，已经十年过去了。可眼下他们惟一的交往方式则是“不见”。在献给以赛亚·柏林的一首诗中，那里有暗地里的哭泣：

我走着，仿佛在大海的深处……
野玫瑰如此芳香，
以至竟能变成话语。

也就是从这一年之后，阿赫玛托娃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她的诗歌成就被重新给予肯定。

晚年的阿赫玛托娃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身着深色连衣裙，肩披一条浅蓝色披巾，威严而庄重，但眉宇间仍有那动人的淡淡的忧伤。她已是满头银发，却是目光深沉。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脸上有着神奇的光芒。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她依旧美丽而庄严地活着。
但她的确也累了，她有些想休息了：

但我要告知你们，
这是我最后一次活在世上。

1966年3月5日，在与死神经过一番短暂的搏斗之后，阿赫玛托娃离开了人间。无数的送葬人把她的遗体安葬在一片松树林中。

布罗茨基在年轻时代曾求教于阿赫玛托娃写诗，她对于他在国内的艰辛处境给以帮助和鼓励，当时她已在晚年。让我们仍然以这位深知阿赫玛托娃诗歌之精神意义的杰出创造者的话为全文的结束语，因为他的话概括得比我们怎样的评价都更准确：

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惟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名——这足见她之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这使她能为全民族说话并教会它一时还不懂得的东西。她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纽带的诗人：这个纽带被珍惜、被抽紧、被切断。她将这个演变过程，先用人的心灵的多棱镜，接着用历史这个多棱镜，如实地展示出来。这是光学对于人类的全部用途。

这两个图像的光由诗歌聚集在一个焦点上。诗歌全然是时间寓居之地。于此我们可以了解，她所以能有如此非凡的宽容的大度——因为宽容不是教

义造就的美德 ,它是在世俗的或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时间的财富。所以 ,她的诗歌无论发表与否均能留存下来 ,因为那是诗 ,浸透了上述两种意义上的时间。它们将永存 ,因为语言比国家古老 ,因为诗歌比历史更加长寿。事实上 ,诗歌不需要历史 ,它需要的只有诗人 ,而阿赫玛托娃正是诗人。

赴历史之约

——汉娜·阿伦特(德)

汉娜·阿伦特 1924 年在她十八岁的时候慕名到德国的马堡大学哲学系。此时海德格尔正执教于此。汉娜投师于海氏门下。

汉娜怎么看都不大像一个热爱哲学的女子。她的眼睛明澈却又深邃,在有几分阴郁湿濡的冬天,在沉闷板滞的德国土壤,她那明灿的眼睛闪烁着穿透物质性的光芒。她肌肤凝脂,体态健朗生动,如塬上奔跑的一只小鹿。

海德格尔见到她,当然心头一个惊颤,是为上帝的一个杰作而惊颤。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将有故事发生。海德格尔不是一个缠绵柔情的人,如谢林——在谢林,是以浪漫和激情构成耶拿小组奇异的诗性魂灵。他也不像他的老师胡塞尔那样平和,不像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那样儒雅,当然也不像他的学生伽达默尔那样温良。总的说来,他们都有一种宽宥和悲悯的情怀。

而他却不。他内里有一种强悍的蛮力,眼睛中有穿透一切的狩猎感。这使他看起来有时像普鲁士旧时军官那般强硬,同时又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农民那样倔强执着。此时,三十五岁的海德格尔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其妻帕特持家有道。他在稳定的家庭生活中心无旁骛,正在事业的上升时期。

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为他的问题所吸引,课后展开热烈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哲学界是多么鼓舞人心。它处在新旧潮流交替变革的时代。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正日渐被抛弃。胡塞尔的现象学给沉闷保守的学院哲学带来生机。舍勒、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作为新一代哲学家受到青年学生的素爱。海德格尔身上有一道电流,使你亢奋,人们为他的思想和表达所攫住,他唤醒了人的已在情懒中沉睡的灵魂。他的某些话也许是暂时听不懂的,于是格外渴望在下一次的聆听中有所启迪。他没想到汉娜正是在此时芳心萌情。

汉娜·阿伦特迷上了哲学却也同时迷上了讲授哲学的老师。这个女子不仅美丽,而且个性独异。她的祖辈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阿伦特从小就是一个厌倦课堂教学,不服严厉管教与校方发生冲突的曾被学校除名的姑娘。进到大学,她对学院哲学,对抽象思维和建立封闭体系的做法不感兴趣。而此时,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新哲学倾向则使她于阴霾中看到朝霞一般欣喜。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不是干涩空洞的概念的教条,那“黑森林”、“返乡之途”、“林中路”、“诗意栖息”是诗的,又是哲学的。年轻的姑娘倾听到一颗伟大心灵的律动,又谛听到一个诗人的弹奏,她是深深的着迷而无可自拔了。在课堂上,她是一个沉静学生,她在感情激荡中,又同时在

思想的开启中。如果她仅仅是个游神的情感至上论者,她的爱情也就仅只是小女儿状的一些呓语了。是思想的力量帮助她找到情感的那根红丝线。关于这些,阿伦特始终记着当时海德格尔在课堂上的迷人风采。乃至于在海氏晚年祝寿时,她在《海德格尔八十岁》的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思想又活过来了。过去认为已经死去的那些传统文化的瑰宝又在说话了,显示出与一般所说的那种熟悉却又陈腐、浅薄的说法完全不同的面目,终于有了这样一位教师,人们也许可以从他这里学会去思想。

海德格尔端肃谨严,但他看到阿伦特时那心头一颤,已埋下了日后所有恩恩怨怨的伏笔。他当然不会觉察不到阿伦特情感的传递。他没有想到自己所要守定的中年生活此时会起涟漪,一个女子清丽的身影是那般的挥之不去。海德格尔在生活中是现实的,正由于此,他会在哲学中吁请诗意,那其实是一种平衡与补偿。他进入现象描述,却不是因了经验的斑斓,而是深感存在的“懒洋洋状态”、“无聊”以及由此生出的“闲谈”、“走神”、“沉沦”以及“烦和畏”。这是人粗壮而真实的呼吸,现在进入他的哲学术语。他不曾想一个年轻姑娘携着她青草和丁香一般的气息走进他的日常。况且,晨读暮诵,师生之间萌发的爱情始于一种语言的相遇,这就有了更为本质性内容。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爱呢?她的眼睛具有穿透物质的光芒,他的眼睛则具有穿透一切暗夜的力量。在偶尔的一个对

视中，一切都不言而喻了。海德格尔肯定陷了进去。阿伦特身上那自发原则性放逐奔涌的个性与海德格尔奇特的审美绝对化是相吻合的。他们彼此都在希望一个充沛的人，一个强烈的对普通事物有撞击力的人。年轻美丽的阿伦特，此时还不是日后成为本世纪杰出政治理论家和社会评论家的阿伦特，还不是享有大的知名度和盛誉的阿伦特，她还只是一个浅尝爱情的初恋的姑娘。这姑娘把诗的东西放在心头，把情人看成太阳，她正在为第一次涌动的情感所虏，无可自持，她还没有想到日后她要承担起多么重大的历史性嘱托。而且，那时的阿伦特正沉迷在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之中，感伤以及非理性的审美自由与冲动，身体上下常有隐秘神奇的灼热。浪漫主义一定是年轻姑娘想象中的锦簇的花园，又加上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与德国浪漫派之间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联系，比如强烈的个人倾向与某种神秘主义的勾连，反理性以及对秩序生活的怀疑，这一切使阿伦特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她准备什么都不管也不要了，她要和她的老师私奔，去过那种她认为是绝对诗意的生活。

海德格尔开初答应是因为那双无邪的眼睛。这个人的确类似乡间的老农，终日里只是孜孜于哲学的园地劳作不辍。肩负历史责任的男人已经很少再为细微具体的事情感兴趣，他们活得并不风花雪月。比如他们已对林隙处吹来的一阵阵凉风感觉不到惬意和爽适，只是觉得任何时候都是沉重。这沉重使他们无暇也可以说是无法承受日常的美与温情。

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的身边出现，这在他哲学史上是一重大的事件。他从此愈加相信，哲学所关心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和真实的个人相关的。这其中隐喻了一个女人带给他的全部

启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性质。从此,哲学进入了某种秘密生涯,那不可言说中言说的隐晦性将有另一个人洞见。他在强调个人生存的真实,也就是为自己依旧骚乱不已的个人找到一种理论上的担待,这种担待使自己从原罪以及逾越的折磨中自我救赎。有了如此情感经历的人,是很难再成为道德优越论者了。海德格尔较少道德说教和持有道德优越感,他只是强调存在与语言的关系,也就是感受到生命蓬勃旺盛的日子,语言的诗性状态是如何绽放的。那是在淤塞憋闷的日子里所不曾体会的,一个获得了自由生命状态的人,才能触及到语言的真谛。海德格尔从此不会希望在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历史精神之中打转,他要的是对个人生存真实有所独白和坦诚的哲学。是一个女人告诉他哲学的本质就在如鲜花一般的盛开者那里。

一个女子把她那份纯真的爱情献给了她所景仰的博学的人。海德格尔这一次是真正投身。他那峻冷酷峭的外表实则裹着一颗如此多情温柔的心。是一个女人告诉了他哲学的本质和意义,他日后发表的那部著作《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称之为是阿伦特给了他创作这部巨制的灵感。这里处处隐涵着他与阿伦特这次历史性之爱真挚而又复杂的矛盾心理。他把他的激情全部写在了这本书里。

为什么会对时间的有限性有如此的惊骇?

只有处在热爱中的人才会对时间有如此惊心动魄的理解。现在,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站在了他的面前,白天黑夜总是晃动着她的身影,他没有办法无动于衷。他得承受自己的原罪,作为肉身之人的种种缺欠、匮乏、不全,这是一种真实,

真实的承认自己有限,自觉放弃道貌岸然的优越地位,而成为一个心怀了一惊一乍、小心翼翼地聆听和倾吐的人。感性之水在向一个原本坚执顽固的哲学家的头顶洒去,他沐浴如此的滋润,他成为了一个生命主义者。但凡是被创造的,皆是有时间的,这便是向死而在。这在规定着死亡的确知和悬临。在常人的状态,则是闪避着确知、沉沦于悬临。也就是忽略着与本己的确切关联。然而一个领会之人,则因爱而与极端的一极,即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彰然触目的时间及其有限性。他为求“本真的向死亡存在之存在论的可能性”而必须作一筹划。这种筹划就是在“揭露自身的能在中领会自身”。

这个领会自身我们当然是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海德格尔面对那场美好感情的相遇终于领会到与自身有所关联的存在本真。他是多么矛盾啊,他想说一种无可逾越以及克制,他说“作为生存之是极端的可能性而悬临在它面前的是‘放弃自己本身。’但是他做不到:但这种先行却不像非本真的向死亡存在在那样闪避这种无可逾越的境界,而是为这种无可逾越的境界而给自身以自由。”也即从“偶然地拥挤着的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中解放出来”。

为什么不能逾越?不能放自身以自由、以解放?海德格尔几乎要大声咆哮了。他知道时间的意思是“死亡总是自己的死亡”。只有一次的生命啊,人,你能辜负吗?他几乎要“决断”了,他要一种历史的“见证”,他要将丧失于常人之中的自我找回。

但是,在他就要痛下决心时,他犹豫了,他犹豫于自己没有资格这样的彻底。因为有一种“良知的声音”响了起来。良知的直接面对就是罪责。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也终于落入俗

常良知的圈套了吗？不是的，对自身的呼唤丝毫不是常人领会其所是的东西，不是从那里吸取认识。常人在逾越时会崩塌，而非同寻常者则“跨越过去”。但是，“有罪责”这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因为时间的有限，人被规定为有缺欠的，这也就可能导致罪责的发生。海德格尔不会将他同阿伦特的这场感情看成是流俗的范围中所理解的罪责，但他内心的矛盾疑虑在《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中则比比皆是。他止不住对“罪责”进行充分的揭示。他知道美好的感情是无罪的，它是一种本真的存在。但是，他却不能完全地坚定自己。男人在关键时刻退缩了，他们没有女人那般的少顾虑。他对“罪责”不知不觉中所做的剥离和剖析，难道为的是去清理那场历史的情债？

充满矛盾的感情其实都写进这部书中。一般人只是把《存在与时间》读作了一部存在主义的杰作，但如果了解他这一段的感情投影，除了读到他这部著作对20世纪若干重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影响，对本世纪文学批评社会学、神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的强烈影响，也可以读到一个男人感情在推拉厮磨中的独白。某时他犹如丹麦王子在那个阒无人声的漆黑的旷野发问：

“但何种经验可为在此的这一源始罪责存在作证呢？”

“只有在罪责意识觉醒时，罪责才‘在此’吗？抑或说，源始的罪责存在恰恰在罪责的‘沉睡’之中才宣告出来吗？”

发问多了不免陷入烦。呼声是烦的呼声。罪责存在组建着我们称之为烦的存在。他有了自己内在的秘密，这可以克服他的烦，他的畏，他的沉沦吗？不会局限于普遍的公共道德的指责中，因为他不是常人。但是却在犹疑，是向前还是被唤

回?“向前就是生存着承受它所是的被抛的存在者,唤回就是唤到一种可能性中去,即到被抛状态,以便把被抛状态领会为它不得不接纳到生存中来的不的根据。”这向前与唤回使他进也难退也难,重重复重重。一本煌煌哲学巨著,是经验的描述,是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实践,某些晦涩难懂之处,莫不是写作者对一种强烈情感所做的隐喻化处理,使它回避过于情境性的缕缕缭绕的记忆,让某些术语和范畴去暂时隐匿那场旷世之爱。

罪责担当和良知阐释在这部书中占有重要内容。对后者,他将其区分为“生存论的良知阐释”和“流俗的良知解释”。他问:“我的善良的”,谁能说这话呢?”

谁能说这话呢?没有人能说,但问题却在接近。而邀他赴那场情感之约的信函也收到了。他该怎么处理呢?让我们把目光从他写作那部哲学巨著的高远中退回来,看看在地上行走的海德格尔是怎么一回事。

事到临头他的确犹豫。这已经不是单纯作为一个男人的犹豫,而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日复一日的劳作,为着事业的承传,耗尽自己日精月华,这日子是一点儿也不诗意的。去谈存在的诗意状态,恰恰是对不可能的弥补。承认世俗沉沦真相,却又渴望技出平庸;否则,生活则是真正的沉沦。如今有一个明艳女子的相邀,他本该去赴这场情感之约。

但是,他却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在他已成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他需要安定的心态平静的环境,这是一点儿也不具有传奇的基地,这样才能保证他的每一天得以在灵魂深处展开他的诗与思。海德格尔的妻子并不理解他的哲学,但她却担当

了他生活中的琐屑和毫无诗意。两个孩子和家庭由她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不用为这些日常费心。虽然日子过起来有些沉闷,但已经习惯了。婚姻应该是一座古堡,藏匿起人全部的喜怒哀乐,还有疲惫困顿。这里是退场、养憩、休歇的场所,不需要风光无限。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个终日以耽于冥想为能事的人,应该在爱情的神话之外。那过于相爱,总是有一个穿透人灵魂者与你喁喁私语,过分的缱绻悱恻,则不再经历孤独,这无形中会破了那沉郁寒凉中才可建立的语境。要的是绝对的孤独,一个人走到底,真正的语言才可能开始。爱情固然美丽,但它如虹如霓太过绚烂了。如果每天都处在激动亢奋的状态,人还怎么做事呢?一个人的孤独和孤独感被爱情剥夺掉了,那么他将无法穿透世界。美丽的阿伦特还没有长大,她现在只是有了自己的初次经验,但她还会有再次的经验。这里并不是她的最后泊地与归宿。她太年轻,要经历的东西还有很多。年轻女子某种一时兴起,只是年轻时节可爱的率性之作。再说,一个哲学家的男人每天都得做事,做事的生活是晦黯刻板的,他很难许诺给一个年轻姑娘以甜蜜和幸福。他的妻子不求太多而只求平静,这与他的思路不谋而合。已入中年的男人,最害怕精力分散,其中自然包括爱情的分散。某种普通刻板的生活,才保证思考的激越,而激越的生活反倒只会使心灵和思考浅谈起来。

一个男人要赴的是历史之约。

赴历史之约也就是走一条领悟和揭示之路,把自己更深地埋在幽黯中,然后扒开一线缝隙,透出一些光亮时,才会有欣喜之感。德国进入20世纪的哲学家是比不得19世纪谢林他们了。谢林在“耶拿小组”期间,把爱情当成惟一和绝对。

那也只有古典浪漫主义的哲学氛围中才熏陶出那样一个率性真诚的情圣。德国的男人是很少为爱情义无反顾、以死相求的。海德格尔已在这个年代成为例外，他跳出冷漠和凝重，表现出热情感人的性情，这在他可是真不容易。但是，他已意识到他所肩荷的更重的使命。一个赴历史之约的男人是终于决定要放弃那场爱情之约了。

阿伦特在等待那个她所热爱和熟悉的身影出现。但终于没有等来。她终于明白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

这时的阿伦特，还只是处在个人的审美自由的激荡之中。大凡有原创精神和自发意识的女人，都得走这个阶段，她们身上浓烈的血始终在沸腾中，她们不是把原罪推给男人，而是承认自己也有原罪。1925年，她写出了自传体著作《拉尔·凡哈根》，作为一段重要时期的总结。1926年，阿伦特怀着深深的伤感离开此地，海德格尔把她介绍给海德堡大学的好友雅斯贝尔斯，在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海德堡是一个古老、美丽的地方。它依山傍水，景致旖旎。

在这样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又是师承平和睿智的雅斯贝尔斯，这一切对阿伦特来说是一场心灵疼痛的医治和对自己全部的重新修复和清理。然而她仍然太年轻，激情犹在。用于学养，这一时期她选择了德国浪漫派为其研究对象。1928年，她完成的博士论文是《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她移居柏林，与报刊作家斯特恩结婚，并一直从事她先前的德国浪漫派的研究。依旧年轻而温柔的天性中，刚刚开始拱动的灵感和幻想的季节，还没有想到日后将

有一场血腥与罪恶在世界范围展开。于是,还沉醉于熏微的感伤和薄暮中的唏嘘,心地纯洁而天真的人,总是更相信人类心灵的力量。克尔凯郭尔、蒂克、诺瓦利斯、谢林、施莱格尔,到处是漂泊的自我,无家可归以及随心所欲,受自由的非历史的自我指引,推重感官,超自然、神秘主义的蓝花、天真的云彩和黄莺的啼鸣,是浪漫派的象征。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迷人,他们不会想到在后来的日子将出现法西斯,在德国会出现旷日持久的战争。诺瓦利斯曾这样兴高采烈地预示着新时代:

“在德国可以十分确实地指出一个新世界的征兆。……到处可以发现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不可思议的深刻性,耀眼的修养,渊博的学识以及丰富有力的想象,有时大胆地结合在一起。似乎到处都活跃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预感到创作上的随心所欲,无边无际,无穷的多样性,神圣的独创性以及人的精神无所不能。……尽管这一切不过是不相连贯的生硬的征兆,但是具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出一个普遍的个性,一个新的历史,一个新的人类,一个年轻的惊愕的教会和一个爱神在甜蜜地拥抱,一个新的救世主将同时孕育着千百万教徒心中。谁不是带着甜蜜的羞耻心怀孕的呢?新生婴儿将是他父亲的复本,是一个长着黑暗深邃眼睛的新黄金时代,一个预言的发生奇迹的、医治创伤的抚慰人心的、燃起永恒生命的时代……”

这就是浪漫派。它奇诡的语言,却有的只是空泛的热情

和虚泛的祈祷 轻快的抒情和精神乌托邦性质。在它所做的预言中,其实已隐喻了极大的危险性。比如对“人的精神无所不能”的迷信。某种疑虑曾电一般闪过心头,日后,她在其力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书中对“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质,偏执和拒绝实质经验与事实的否认,把它所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个封闭的“虚构世界”,使人的精力无休无止膨胀,认为自己是人类伟大目标的执行者等等都给予犀利剖析,这不能不同她对浪漫派的日后清理与清算有关。

德国有一种浪漫传统,无论哲学、音乐、诗以及社会政治领域,都弥漫着这种倾向。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景仰,实质是在诗化哲学意味上的偏好。还不是太清醒的阶段,谁不推崇心灵自由?但那激情如果病态和没有划界,一旦逾越到社会生活,则会造成蒙蔽和欺骗。这里有德国的骄傲,也是德国的反动。越往下深究,每每有不安划过心头。但仅仅是书斋生活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将谜团解透。不多久,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开始了。血在擦洗阿伦特的眼睛。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阿伦特已无法在安宁的书斋讨宁静,她主动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及民主党人的逃亡提供帮助。她曾被盖世太保抓获。获释后她马上逃离德国,经布拉格流亡到巴黎,后又流亡到美国。先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周报工作,后来负责一个犹太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

逃亡以及写作,在行动中阿伦特逐渐使自己的思考深化。一个曾听命于情感驱遣的女人现在已经听命于历史委派。她与海德格尔自1933年见最后一面,时隔十三年他们才又相

见。转眼到了二战停止以后的1946年。漫长的分离时间,恩怨似已两讫。分别的岁月,他们却在走着不同的路。

在阿伦特,她一直信奉哲学是实践的。在海德堡期间,她曾研读了康德和谢林的自由观的著作,接受了雅斯贝尔斯关于有理性的自由的思想。并且她开始逐渐摆脱浪漫派沉浸于个人内心世界的阴影,尤其是面对新的历史处境,她开始将其注意力转向政治和社会问题。阿伦特在对浪漫进行反思。德国的浪漫派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支曲调;不是别的形式,而是绵绵无尽的眷恋。如果要给这眷恋起名字,那么会选用“一串秘密的单字”、“一朵崖畔的蓝花”和“林间孤处的魅力”等词。这些名称都是情调的表露,每种情调又都是同特定的心理状态相适应,情调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灵魂。这灵魂又具有浓重的虚无倾向,它习惯于在隐喻性花萼丛中躲避,面孔消瘦而苍白。但在看到那么多的罪恶与血腥,就无法始终在这种眩晕的迷醉中藏在它温柔的天鹅绒里了。

还应该说,到美国之后,在与德国所做的文化差异性比较,也为阿伦特整个思想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契机。在哲学背景上,它讲经验而慎言道德,它将人的本性设定为幽黯而非那样明亮。相对来讲,英美分析哲学不像大陆哲学来得那般美妙,它在常识性的铁板上,而后者则是在隐喻性的土壤里。当然前者也有它自身的缺欠和尚待修正处,但它在实践中确有其合理性因素。但在大陆思想中,韦伯所做的工作比较好些,可惜他死得过早,许多问题还未完全展开就结束了。阿伦特后来受韦伯思想影响开始注意理想的类型或模式,这也是对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学习做一区分。

尤其是二战的经历,促使她的思想成熟。并且始终怀有

异地他乡的边缘感(阿伦特是犹太人,德国也不是她严格意义上的故乡),在记者和学者之间的穿梭,使她形成这样的主张:实践先于思想,政治先于伦理。由此,阿伦特早已与她早年景仰的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个人的某种虚无主义倾向拉开了距离。并且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他由于热衷怀疑和空想,对人类采取了完全不负责的态度,他代表了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与保守主义。

标明她这一阶段思想的纵深发展集中体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此书1949年写成,1951年出版。这是二战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是西方现代经典名著。它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部分构成。我们现在把主要目光集中在“极权主义”部分,这也是阿伦特倾其心力的重要方面。她比较当代极权主义政制与过去专制政体的本质差异,其解释观点在两方面展开:关于意识形态与关于绝对历史目的。当然前者最终仍然是服从于后者的。就意识形态来说,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它表示了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致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证自明的“种族斗争”或其他某种斗争为前提,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全盘的解释。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一个终极目的,如“纯粹人种”的实现等。这套意识形态作用于极权主义的性格,一方面表现了“人无所不能”、“凡事皆可为”的虚无狂妄;另一方面则自认为自己是执行历史或自然动态法则的工具。这不是自发的,而是自律的,由此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阿伦特认为:“希特勒置意识形态于政党之上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一向宣称它的永远无误。”而这需要宣传;“群众大会是最有力的宣传形式,每个人

都感到自己在大众的团结中更自信、更有力。”宣传是关于群众的宣传：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而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与恐怖相辅相承。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来代替宣传。”宣传灌输的洗脑，恐怖残酷的暴政，使极权主义在灵魂与肉体两方面掌握了人的一切，个人已不再成立，自由已是痴人说梦。群众已彻底成为极权主义者的傀儡。接下来，为了一个目的、一种预言、一种历史规律，就开始清除对手的工作了。而这里的有力论证是：清除对手符合历史大过程的规律，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的所作所受都是必然发生的。对牺牲者的迫害一旦执行了，“预言”就变成了一种回顾与辩解，即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预言的。历史规律就是要让被历史淘汰者消亡，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谁给极权主义者以这种必然无疑的权力？阿伦特显然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她在字里行间和相当重要的注释里，已与传统和历史的渊源有所联系。她已意识到自柏拉图以降，某种政治学说所造成的理论遮蔽和常识混淆。

关于柏拉图，谈论较集中的有英国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里，他对柏拉图关于形式或理念的学说，关于社会政治纲领以及所攻击的背景进行分析阐释。在波普尔看来，一向无人置疑的柏拉图名言“智慧者应当执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即已隐涵了对今后根本政治问题的陷阱。柏拉图以“谁应该执行统治”和“谁的意志应是至高无上的”这一道德问题发问时，回答肯定说应由“最好的”、“最有智慧”的来统治。这其实已无法再向深处推理，无法将政治问题拿到政治哲学讨论，而只是道德领域的事务。统治者的个人品格

成为最重要的事实,由此道德顶替了宪政,品格代替了制度建构的种种问题。所有的赌注都押到统治者个人道德品格的优劣上,权力集中在单个人手中,由于人们相信了他是最有智慧的,那么他就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大陆著作家如布丹、卢梭、黑格尔的各种主权学说都包涵了这种因素。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的利益终归是伦理的和精神的事情,取决于人和人的责任而不取决于非人治的建构组织。在波普尔看来,恰恰这种看法是肤浅之见。他认为“一切长期的政治都是建构性的。这是避免个人极权的一个办法”。在领袖的选择与制度建构中,纯粹与绝对都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建构应该像堡垒一样,又要设计得好又要人员配备得当。

关于制度建构,阿伦特以苏联二战前后的情形进行剖析。她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的统治是极权主义的另一表现形式。斯大林已死。赫鲁晓夫上台,情况发生了重要改观。赫氏《秘密演讲》过后,苏联国内对知识分子的流放、杀戮等迫害活动有所缓解,科学以及艺术得到迅速恢复与丰富。但是,当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继任者无形中会重蹈前任的覆辙。也正是赫鲁晓夫,他曾利用过朱可夫元帅的声望和军事力量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正如同三十年前斯大林利用秘密警察为自己服务一样。但后来赫鲁晓夫仍是一脚把朱可夫踢开。一种没有制约、平衡、监督机制的制度,很难完全、最终相信统治者的个人品格。

在阐述极权主义的起源、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道德与制度的关系时,汉娜·阿伦特对历史决定论也有精彩表达。极权主义者运用一整套意识形态塑造或改造生活、世界或现实,讲求首尾一致性的逻辑推论,以拒绝实质经验的否认,结果把

世界砌造成一个封闭的虚构世界,它自己有一套说头,自认为这是为了实现某种历史意义与目标。他们正是这一伟大人类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深知这个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必是动态的,在此法则支配之下,极权主义名正言顺地摧毁了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限,偏执于绝对历史目的的达成。为此,极权主义不断地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为了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把人的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以此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势力。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显示了阿伦特精细入微的阐释、睿智的表达,以及高度的历史想象和整体的叙述。它的发表,必然会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她热爱男人同时热爱历史,相失于感情之约却是共赴历史之约。

一个原本沉于感情的女人现在已从个人化转向历史性担当,她现在所做的事情已不单纯陷于女性的情感范畴,而是开拓着更深广的领域。她依旧美丽而生动,灵感丰富,但她希望人们首先把她当作一名知识分子,而不是一名妇女来看待。也就是她期冀自己成为知识圈一名公平竞争的对手,而不仅仅是出于对女性的礼貌和尊重。她终生活活动在以男性为主的文化圈子里,却没有自卑和退让。在她看来,进入问题,是进入人类的问题,这里面没有性别之分。当然两性之间会因性

别差异带出理解的不同,但这只能是细节方面。这个不倦的战士、睿智的思想家和风姿绰约的女人,实在是为德国女界赢得了骄傲与光荣。

对于名声,阿伦特当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她依旧是想与一个她爱的男人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刀枪剑戟丛中闯荡,却又无法阻止情感浮上心头。战后阿伦特多次访问德国,几乎每次都在弗莱堡停留,她喜欢与海德格尔见面和交谈,两人无可自禁地保持着一种知心朋友的交往。他对他的行为终于开始原谅,对他的批评逐渐减弱。她把他的错误与柏拉图的错误相提并论。海德格尔身上有太多德国农民式的价值观念,他深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总难以摆脱农业文化的影响。这是切近土地的、隐喻性的,因此也是抒情的浪漫与诗意的。他在现代社会中像个陌生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单纯可笑的文化保守主义。他所寻找的诗意栖息与意义本源在哪里?后来一个美国学者赖特在分析海德格尔的一些做法时,给人提供了令人十分震惊的资料。比如赖特谈到海德格尔在罗马作《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讲演时,曾佩戴纳粹标记,并且他对荷氏《日耳曼》、《莱茵河》两首诗原本所具有的阴性的和平的意象作了阳性的具有暴力倾向的理解,这是一种本质的抹煞,对和平主义的拒绝与攻击。

如果是这样,那个在落英缤纷的乡间小道漫步,在黑森林间蹉跎沉思,躲开喧嚣凡尘的思者哪里去了?你所见到的只是一个身上矛盾重重,但并不忏悔的老者对世事无常的无声抗议……哪个海德格尔更具真实呢?

女人总是感情。阿伦特依旧无法完完全全在中立的立场对待海德格尔。他对他的批判态度逐渐减弱,认为他的政治

行动虽是一次巨大的失误,但这只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都普遍热衷于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著作。但雅斯贝尔斯始终未能谅解他。阿伦特一直力图劝说海德格尔对自己在纳粹时期的错误作一自我批判,但对方毫无反应。阿伦特也曾致力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之间和解,但几乎没有成效。

转眼到了1960年,阿伦特参与了在耶路撒冷对漏网多年而被抓回的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艾克曼的审判。

此次审判,牵动了世界的目光。阿伦特此次是专程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作现场追踪报道的。随后她的文章以《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为题结集出版。文章既出,旋而引出轩然大波。人们原指望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对于那个亲手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嗜血魔王艾克曼的报道应该义愤填膺、壮怀激烈。然而她却以哲学家的睿智、政治思想家的冷静和出色的分析技巧,抨击了围绕这次审判所暴露的问题。即一般报告仅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等等解气解恨的民族复仇心理。人们看到的阿伦特太冷静,以至于认为她是冷血动物。

阿伦特所做的结论是：

审判的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别的。

艾克曼犯的是反人类罪,而不仅仅是以反犹太人罪来受审。

阿伦特进一步阐释道：

为什么像艾克曼这样一个原本普通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平庸的人,却很容易地成了一个将犹太人口作为多余从而必须消灭的这一制度的一个忠实执行的工具?这依旧是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具体材料与延伸。她曾在此书中有充

分的揭示：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而把说谎与杀人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而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动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也没有一个政体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之下。

请注意当时阿伦特的用词：“一切的暴行，都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之下”。现在，艾克曼审判中的报道，其实依旧是她这一思路在具体个案分析中的运用。正是意识形态的创造，才通过语言的欺骗，将一切罪恶与血腥打扮得冠冕堂皇。比如希特勒可以将“杀戮”一词用“给予仁慈的死亡”来代替，将“灭绝”杀掉”这样刺人眼目的词，代之以“最终解决”、“特殊处理”。于是，血腥的墓场被栽种上玫瑰花，灭绝人性的杀戮被戴上光亮的彩链。在那些仅有观念的追求而没有法治的约束者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艾克曼正是这样一种制度下的小卒和手段。

并且，该给艾克曼判定什么罪？犹太人的民族情感是存在的，面对这个双手沾满自己同胞鲜血的刽子手，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然而，这一切意气其实正沿袭着这个刽子手所赖以依恃的集团的思路。艾克曼犯的是反人类罪而不仅仅是犯了反犹太人罪，如果不是这样定性，一片喧嚣尘上的捶胸顿足、愤懑呼喊有什么用？继续的追问是，如果承认局部标准而无视普遍标准，任何罪行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开脱的借口。

阿伦特此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人们其实是太过善良也太过幼稚了，对血腥的记忆也太

过健忘了。阿伦特其实是在帮助人们清算暴虐者的罪行，但人们却在丧失理智时恩将仇报。但是阿伦特不会畏缩，这个美丽优雅的女人现在要操一份心，为人类理性的恢复耗尽心血。阿伦特穷追不舍，同时追问犹太社会领导人在纳粹罪行中的作用问题。这个领导层，曾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与纳粹合作，这种合作被他们当作犹太政策的拱心石。正是犹太人的合作才使得纳粹完成了逮捕、贴标记、分类、安排去死亡营的时间表和剥夺犹太社会财产的任务。

阿伦特毫不留情直捣心窝，触及到罪的本质。她的所有观点都与正统意见相左。艾克曼一案之后，犹太人社团，包括她的一些熟人朋友与她发生笔墨冲突，他们甚至不再同她交往，她真正成为一个人无家可归的人，一个生存在边缘状态的人。但她一直坚信，任何个人、团体、民族、政党的利益都是次要的，首要的应是公平、正义、真理这些人类的普遍价值。

阿伦特是孤独的。因为某种原因，她同丈夫斯特恩离了婚。她没有子女，没有寻常的天伦之乐，她把她的全部精力用在了写作以及工作上。

暗夜又降临了，她曾在少女时代萌动的春心又荡漾起来了吗？她的知名度在上升，她的成果在扩大，这一切她最希望和那个早年的恋人分享。

然而海德格尔那农民式的价值传统使他无法真正正视一个女人的所有工作实绩。1961年，阿伦特给海德格尔寄去了自己的著作《活动的生命》，以显示自己的能力，但她已感觉到海德格尔对她的工作与成就是漠不关心，对她日益上升的声望和在公众中的影响感到惊讶，不喜欢社会对她的承认

和重视。阿伦特心已经凉了。

阿伦特是那样渴望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和思维活动创造的同路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忠实的追随和崇拜者。而海德格尔恪守传统伦理和价值观,他当然看重阿伦特身上那优美动人的气质,那种又漂亮又书卷的风度,她的明灿将他的阴霾撕散,他希望于她的是一个天真可爱、思想简单的浪漫女性,但他不希望一个女人的深刻和成功。

阿伦特已不再是为一个男人而活,她为历史而活。这个开始赴历史之约的女人知道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是可以依傍、可祈盼的了,她已独立在世界的风口,瑟瑟楚楚之时,自己掌灯,温暖孤影。有一段时间,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处在冷淡期。

在冷雨敲窗的日子,一个人,现在真真切切体验着时间。

那年轻时节面对向死而在的时间,身上的血在哗哗流淌,为了仅有一次的生命,匍伏于黑土向神发出祈祷。祈祷那有限时间中的有罪之人的逃离审判从而沐浴神恩。

然而战争将普通刻度上的时间模糊,不再可能是安稳地走到生命的终了,而是戛然中断,马上、瞬间。死的意志可以强迫生的意志消亡。在这样的时间逻辑里,所要做的则是反时间。

她知道,凄风苦雨必须要独自承受了。她把自己更深地埋在工作之中。她的著作一部部问世:

《隐秘的传统》;

《极权主义的起源》;

《艾克曼在耶路撒冷》;

《论革命》;

《人间条件》；
《活动的生命》；
《精神的生活》
……约二十几部。

二战过后，面对所有的指责和非难，海德格尔的态度始终是缄口沉默。他不辩是，也不辩非。世人真真无法理解，他出任第三帝国任命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他的本意是什么？或是为了在他拥有可能的职权范围里尽量保护那些知识分子，或者是真诚地认为法西斯可以使德国从沉沦状态走向新生？谁都无从知道。他1959年退休后，离开城市，到了他所心仪的黑森林，大部分时间住在托特瑙堡深山里的一幢小屋里。这间简陋的小屋坐落在山顶，那里山峭谷深，空气清寒，四周宁静，罕见人迹。人到此，隔世之感油然而生。小屋里只有不多的几本书，其中有几本荷尔德林的诗集。他将自己的余年扑到了一堆纸上，似乎同世界的联系也只在这堆纸上了，他除了需要在宁静中以笔来填满这些纸以外别无它求。伴随着林涛与风声，早年那姑娘的身影还会在梦中浮现吗？

记忆总是关于恩恩怨怨的往事。1967年，经过一个朋友斡旋，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重又见面，重归于好。此时，阿伦特已经是六十一岁，海德格尔是七十八岁。1924年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其间经过了漫长的四十三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一双深情的目光的注视。如今，欲望化的叙事已中止，只有别样情感，醇酒一般。1969年，阿伦特为纪念海德格尔八十寿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1971年，她的丈夫去世后，他寄来了一首情感真切的诗。

有时想想看,真的对女人那么放心那么信赖的男人其实是不那么心疼女人的,而那些总有些男权意识的人,怕是更怜香惜玉一些。女人,其实别太累了,别太好强了。

阿伦特在她叱咤风云的时候,她一度对他神秘和虚无的倾向持保留和批评;当她倦了那历史的托付,开始回到内心,也就是当她写作《精神的生活》时,她才对他为什么关心语言与思维的思想感兴趣。她始终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家。她一见到他充满诗性的文字,眼睛就熠熠闪光。他们写了长达五十年的信,两人生前订有君子协议,在公众面前保守他们关系的秘密,但把这些信留给德国马巴赫市文学档案馆。

阿伦特实在是太累了,但她始终惦记着海德格尔。1975年阿伦特曾犯过一次心脏病,健康状况欠佳,但她仍不顾朋友劝说从美国飞抵欧洲探望病中的海德格尔,为他担忧挂虑。谁知一年后,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在纽约自己的寓所和来访客人谈话时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也就是仅仅过了半年,仿佛冥冥之中听从了阿伦特最后的召唤,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在梅斯基希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关于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纠缠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他终于躺了下来。这如同阿伦特在他八十寿辰的文章中,曾引述过关于他的可靠的轶闻中所说的:他在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中,并不对亚氏用通常的生平介绍,而是用这样一个简洁的句子开头:“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去世。”人们也可用他这种句式结束:

“海德格尔出生、工作、去世。”

关于这样两个人,人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阿伦特，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对她的了解和研究将越来越深广。她在公共空间对许多重大问题所做的探讨已引起人们更为普遍的热情。

海德格尔，他几乎垄断了这个世纪大的哲学话题。他揭示出的向死而在的虚无基础在私人空间让人们颌首低吟，长思长问。你不管喜不喜欢他，却无法绕过他。

所有的恩恩怨怨都已远逝了。这样两个人，将到一个有着蔚蓝色天空的纯净之地守约。

道德的暧昧性

——西蒙娜·波芙娃(法)

西蒙娜·波芙娃(1908~1986)与萨特不仅是以自己的存在主义理论和创作成果留存于世,其中更有他们那种惊世骇俗的情感处理方式:放弃婚姻,不经结合的结合,却永不离弃,而又允许双方偶尔的风流韵事。他们订立的“君子协议”,的确是为了克服现代人面临的尴尬的无法克服的伦理学困境。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因为这个世界虽然仍有战争、流血和不义种种关于政治理念的事务要求人们为之花费精力,但是,在警报解除,人们从避难所、从壕堑、从硝烟中走出以后,走进缱绻而迷蒙的长夜,那关于身体和情感的棘手之事很快就到来。波芙娃和萨特究竟解决得怎么样呢?

萨特对波芙娃这样说:

“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

她深有同感,当即表示同意。为什么不呢?这个男人的所想正是她所想。虽然这个时候她还在豆蔻年华,还不知等待她前方的命运纠葛到底有什么,但她知道那种永恒的许诺是不必做的,它会成为辉煌的囚禁。况且,她的内心冲撞之剧烈,一点也不比男人差。

他们知道人总为那伦理学处境劳心烦神。肉身总是蠢蠢欲动,听凭它放任自流,人将在泥淖里打滚,满身的污秽,而用神性自律的原则束缚固然好,却又因冻僵感而使从事创造生涯的人达不到由于窥测神秘而可能达到的深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认为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腾出手去干更重要的事业了。

起码后来萨特是觉得伦理学问题不再成为折磨他、令他伤脑筋的问题。他的语言为存在展开,这存在是个关于恶心、变形、荒诞、地狱的反讽剧目,是对外部世界的冷眼打量,却不会在作品中将自己交付出去。萨特不为己虑而只为类忧。对于自己,有终生相伴的女友,又有许多别的女性成为他生活中的盐。他的生活是自己预先计划筹谋好的,他不为之喜也不为之忧。但是现在重新去看萨特的作品,却总觉得没有以往所认为的那般重要和辉煌了。比如煌煌的巨著《存在与虚无》读来总显佶屈拗口,那满纸的概念和术语,语感的失却连贯和断裂,意象过频的翻宕,飘忽无定,让人读来满头雾水。倒是他并不尚用心写出的《词语》一书,反倒有一种亲切素朴的动人。

至于萨特剧本所描写的扭曲、恐惧的情绪紊乱与绝望，固然也是带出了那时的人生存处境的实情，但在目前人愈加想趋于平和安泰时，梦魇般的记忆是人想遗忘的。因为那不美的场境人总想方设法躲开。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完成的只是阶段性写作。

对波芙娃来说，同意订约，她对后来萨特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也能做到理解和宽宥，但她在私心里总有些许的醋意与妒嫉。也许女人向来就比男人受更多情感之事的干扰和折磨。她想要摆脱伦理学困境却始终不能完全彻底，总有许多的不快、委屈、感伤以及愤懑，这必然成为她的言说资源。比如在她的《女客》、《人总是要死的》、《一代风流》、《第二性》以及长篇自传体著作中均有披露。她也曾写过《道德的暧昧性》，文章直接对自己的情感历程由感性进入理性把握。萨特没有她的困惑，他写关于历史言说的文字，而波芙娃则无法摆脱欲望化叙事的笼套。而现在来看，一个女人陷入困境中的挣扎，伸出无助的手向上，渴望攀援出深渊，一种凄绝的姿态帮助了她。波芙娃径由自己的不堪，那难以承受的失眠、痛哭以及彻底绝望的写作，更具有个人的确切与真实。那体温性的文字唤醒了人们的细节记忆；也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那看似虚弱的仙心情愫，那些痛穴与伤痕则狠狠触及别人的感应与肌肤，这也许便在不经意中达到永恒。

可能这正是两性之间在语言上的差异。比如男人更想给历史留下什么，女人则只想给自己留下什么。男人下笔时总是彪炳史书，有一种代天地立言的使命感；女人下笔时只觉那铅灰色重云堵在她的胸口，她要驱散这些。那欲哭无泪之时渴望让语言帮她捱过难捱的长夜。

说了那么多抽象的话,对于丰富而具“华丽意象”的波芙娃而言,随叙事的风声循那原初的壤地,似乎是更有意味的一件事。

一、“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1929年的法国巴黎有一种出奇的宁静和美。一战已经结束,二战尚未到来。在和平的间歇期,人更愿意瞩目那心旷神怡的东西。而大学校园的俊彦才子,则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在夏季,索本大学校园开满了百合、金莲花和红山茶的花,在这里读书的波芙娃的心情由前些日子的黯然逐渐转向明朗。这个勤奋多思的姑娘的内心总是更渴望那把她更高提升的人与事,这种精神冲动使她在暗中寻找令自己信赖的人,以期构筑起自己命运的连续性。

有个三人小组格外引起她的注意,它由萨特、尼桑和埃尔博组成。这三个人据说不和任何人来往,只上一些选修课,我行我素。波芙娃注意到三个人中萨特的风度不错,但又据说他是他们三人中最可怕的一个。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他们有了往来,他们似乎没有拒绝这个既勤奋又聪明、并且对理论有极大兴趣的女同学。

开初,波芙娃只与已婚的埃尔博接近。埃尔博的微笑令她心仪,而且还有他那特殊的体魄,以及比面孔更具丰富内容的东西。她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尽管埋头读书,连自己的穿着打扮也顾不上,表面看有些刻板,但她依旧是一个妙龄女子。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开始厌倦纯洁和神圣,她很高兴埃尔博将她当女人看待,当人间的创造物看待。此时萨

特还不在她心中。

这是三个在语言上具有侵略性的人。波芙娃说他们思想明快清晰,但判断上则是残酷武断。刚开始的时候她感到害怕,但一年之后,她认为这新结识的朋友如果为她打开的世界显得残酷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想掩饰它的真实。

她没有注意萨特对她的印象正悄悄变化。有一天,萨特把他们通过哲学教师资格笔试的成绩告诉她。这次笔试,萨特是第一名,波芙娃是第二名,埃尔博则是名落孙山。萨特还对她说了句决定他们终生关系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她听了有震撼,也有喜悦。有一支箭已射中心口。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萨特主动邀请她同他一起准备接下来的口试。这半个月,他们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只有晚上睡觉时才分手。这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尝试。

对波芙娃来说,也正是通过这段时间认识了萨特,认识到这个人除了睡觉之外他才会停止思考。他对思想总有极度的敏锐和警觉,他轻视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逃跑主义,面对一个陌生的客体,他从不会利用一个神话、一个词句、一个印象和一个成见去解释它,而是抓住它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意义才会放心。他从不关心应该如何去思考,怎样思考才有意思、才是明智,他只想到思考。他们无话不谈。

波芙娃突然感到,过去那些没有他陪伴的日子简直是浪费时间。这个骄傲的独立的女性第一次承认:“这是我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在智慧上低人一等。”她在想她终生所要寻找的

是什么样的男人呢？肯定是自己甘拜下风的男人。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求他比我更强呢？我并不打算在他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我珍视自己的独立性，我将从事另一种职业——写作，我要有我个人的生活。但同时她又认为：“男人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分子，在出生时便享有大量特权。如果一个男人无法全面胜过我，我会认为自己则相对地比他强得多。为了表现出他和我同等，他必须比我更优越。”

波芙娃已将自己的终生和这个人联系起来。他呢？当然也是如此。但是，是萨特首先认为他们的关系可以更新型一些。萨特对波芙娃讲，他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作家都应该像辛格作品中的人物花花公子那样生活，而不应在一地永远扎根或者与某一个人厮守一辈子。萨特从骨子里不赞成一夫一妻制。他喜欢成为女人的伴侣，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样滑稽可笑。在他认识波芙娃时，他就不准备拒绝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他用他喜欢的术语向她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乐事。”波芙娃说她与萨特观点一致。他们坚信两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精神的默契和思想的共同启迪这一理性基础上的关系是不可能由别的人所代替的，只有他们这样的两个人能这样，与别的人则不能。他们的关系会保持到彼此生命的枯竭。但这种永恒的关系不能替代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时所得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快乐。我们怎能有意地放弃那异彩纷呈的感情呢？我们同常人一样有常人所具有的惊讶、懊悔、欢乐以及对往事的追忆。每当她和萨特散步时，都在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决定不结婚而永远在一起。没有什么力量能将他们

分开。但他们却不准备缔结普通秩序的婚姻, 不准备依世俗标准来为彼此的关系找到一个名份。他们彻底藐视一切的规范, 希望以全新的方式交往和结合。他们当然也会渴望“死生契阔, 与子相悦,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但他们却已经考虑了永恒与瞬间的关系。他们要永恒也要瞬间, 他们彼此信赖却又放对方以自由。这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是夫妻? 是情人? 是伴侣? 是朋友? 是, 又不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新的男女结合的模式, 注定令世人瞠目。

而在结识萨特之前, 波芙娃则准备这样过完她的一生: “我所渴望的只是爱情, 写些好书, 有几个孩子和一些我能向他们赠书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能通过个人的示范, 在哲学和诗歌方面引导我的孩子。”那时候在她看来, 孩子的父亲当然是她迷恋的表兄雅克。

在十七岁那年她发疯一般地爱上了表兄雅克。其实多年前她早慧的心就已注意到那男孩十三岁时就已具备了年轻男人的仪表和独立的性格。耽于沉思和幻想的波芙娃对雅克表兄施以了许多的美好想象力。她在自传中说她在少女时代从打算放弃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美好之处。她拒绝进修道院, 并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梦想爱情。她毫不厌恶地憧憬婚姻。

她对雅克的迷恋就是迷恋。其实他并没有达到她所梦想的那种男人境界: “我盼望有一天, 一个男人以他的智慧、文化涵养和权威来征服我。”她说她必须找能谈得来的人做丈夫。画家、音乐家也不行, 因为隔行如隔山, 他们无法交流, 也就有不被理解之处。她希望丈夫和妻子之间一切都是共同的, 每个人必须在对方面前履行如忠于上帝般的见证的职责。波芙

娃毫不怀疑自己因不断进取的雄心,可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她对男人要求甚高:外表完美,内心完善,两人之间不要有太大距离。她设想的情景是:仿佛登山,那比自己更灵活,更强壮的伴侣帮助她步步攀高,她认为自己属于那种比较贪心而不怎么慷慨,渴望接受而不是施予的那种。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规定了自己今后法定的男人既不比自己弱小,也不过分强大,只是要求他有相当的卓越担保自己的生存。她说她很害怕拖着一个落后者,那样由于心力不支自己会憔悴。如果那样,她宁愿选择独身,这比结婚更可取。

雅克并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标准,但她在青春萌动的年月却为他心悸、惊颤和感伤。她属于早熟的女孩,在感情婚姻问题上成熟得早,在她没有遇到萨特之前,她必须要有一个寄于梦幻的对象。

雅克是波芙娃姑母热尔梅娜的儿子。在她十五岁那年在姑母家作客时开始对他萌动初情。那个学习优良、善于沉思的少女在黄昏的微风中倚在榛木的围栅上,树叶絮语着,小草拂动着,她的心有许多的莫名惆怅。然后到了夜晚,她为暮色苍茫中的隐秘温柔所打动,自己对自己说:

“以后,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这好好活下去包括她对爱情的梦想和对自己生活的严格律己。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惜时如金,常常谴责自己虚掷时光。她睡得很少,不刻意打扮,不对镜自赏,只在刷牙时,揽镜自照。她要求自己不接触无益的读物,不做没意义的闲谈和一般的娱乐活动。如果不是母亲反对,她甚至连星期六早上

的网球娱乐也懒得参加。吃饭时她带着一本书,学习希腊动词的变形,或寻找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她简直把自己的命运认作是“清贫”,并把它强调到更高水平,把它当成天赋。她自己剥夺掉感官快感,并强调选择禁欲。“我沉默的眼睛凝视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而大步前进,用这个取代懒洋洋地拖沓度日的单调乏味。我拼命工作使自己变得疲倦,在疲倦中我领略到一种充实的感觉。”想想前程,她看到那些普通的女孩子,为了适应婚姻生活而变得愚钝。她知道自己与她们不同,这不同的前景将加大她们之间的距离。她常常沉默,不与人语,这是因为“我整天训练自己去思考、了解、批评,我质询自己,仔细寻求真理,这种语境使我无法适应肤浅的交谈。”

即使有这么高远目标的波芙娃,她的剥夺快感、选择禁欲仅仅是在她对自己苛刻勤奋追求智慧生活时的日常安排,但她内心热情的血仍在哗哗流淌。她是那样着迷表兄,她想让他注意自己,可一见到他,她又觉得自己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太不合体太不时髦了。她总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在雅克心中是否有位置。有一天雅克到她家吃饭,聚会快要结束时,他把她拽到一旁说了一些话。她为雅克对她终于发生兴趣而兴奋。他们开车到布洛涅树林去兜风,她向女伴扎扎极为快乐而又语不成句地叙述这次闲逛。她阅读从雅克那儿得到的藏书,他喜爱的书变成了她汲取忠告和获取帮助的《圣经》,那些主题使她生活中的全部境遇变得神圣化。

但表兄雅克却是一个英俊、快乐、不那么用功,也不会有太高远目标的人。但在当时,迷恋就是迷恋,来不及想那么多。波芙娃还妒嫉环绕在雅克身边的女孩子,但她认为自己始终比她们强,因为自己有灵魂和思想。但雅克懂得欣赏她

的灵魂和思想吗？

他有着—头漂亮而带光泽的褐发。波芙娃常在黄昏时分敲响他家的门铃，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花玻璃大窗前谈论读书体会。波芙娃总在他离去以后思忖自己的平静会否被当成冷漠？这想法使她苦恼。她太在乎他眼中闪烁的温柔目光和神秘微笑，他向她转述歌德的一个句子：“我爱你，那与你有关吗？”她不知自己是否与他有关，也不知与雅克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她想写信给他，又害怕这样做不适宜，她害怕他忘掉她，或有什么事引起他的不快。她总是小心翼翼，自少女时代起就不是颐指气使那类。她是很注意别人感受性的人，并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善解人意是后来被萨特从理性上给以赏识了。在那时，一个少女伤感缱绻的全部她都体会了。她迷恋雅克，她说他长得极帅，有一种孩童般和肉感的优美。

她也知道他不会激起自己的不安和欲望。但她需要安静地去梦。她希望伴在雅克的身边读书，想象“我俩”的情形。她把自己全部的心分给了这梦。她那时执拗地认为：“在雅克身边，幸福将永远不是一种睡眠。我们的日子富有激情地重复着，一日复一日，我们遵循自身的追求，被自身的不安结合在一起。我们有时肩并肩地迷了路，但永远不失去对方。”

她总是期待着能见到雅克，她被折磨着，只有把内心交给日记。

当然，随着她长大，她感觉到了自己与雅克之间的距离。十五岁时围绕他编造的伟大的爱情崇拜的幻梦有些破了。他又没有通过考试。他沮丧着，也厌烦自己浪费了一切。他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他可能像波芙娃那样有目标有信心地珍惜每一天每一刻吗？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实现眼下的一个目

标,要么是智商有问题,要么是素质有问题。对这一切是不能简单的加以原谅的,有一些东西正在她心中坍塌。她心中有矛盾。她一方面无法忍受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另一方面发现如果自己嫁给他——仅仅这个念头就开始引起自己的恐怖和厌恶感。她陷于迷失之中。

在雅克家中,除了他们手拉着手的时候显得动人美好,其它时间则使波芙娃感觉是在浪费光阴。雅克与他的朋友之间的谈话不外是酒馆、侍者、金钱的烦恼、暧昧的私通,但这种闲谈与波芙娃的关心所在相距甚远。她的心性是对世界彻底性的发现而非逗留于事物的通俗性质中。她知道他的生活并非全属于她,他曾说过他未来的生活,而她是被排斥在外的。她痛苦矛盾地写下这样的话:

“我需要他——但不是看到他。”

但她现在还是无法摆脱那在等待、悔恨、怜悯中才会体验出的温柔的极大冲动。

她已经逐渐感觉到她的梦之破灭终是无可避免,她已开始承认他们之间的差别之大,“我断然认为他不稳定,没有恒心,沉溺于卑微的友谊和烦恼中,他不关心折磨我的问题,也缺乏理性的信仰。”而波芙娃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彻底地表现出自身的情感、思想、计划。我不马马虎虎地行事”。她努力想把雅克作为一个心造的偶像,想认为他比自己更有艺术气质、更敏感、更有天赋、更具有秉性,也试图将他的优雅放在自己的才能之上。但是,雅克总是拿“有什么用呢”“何苦呢”这种怀疑和虚无的态度逃避自己的努力,这一切使波芙娃

终于认识到雅克的这些说项与形而上学无关。她已在痛苦的辗转反侧中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不能与雅克联系在一起,尽管她是那样迷醉他的英俊和优雅。享受美丽的人生便能使他满足,他很轻易地就接受奢侈舒适的生活,他喜欢幸福,可他靠什么得到这一切呢?尤其今后,没有家庭与父母的庇护,他将靠什么去得到这一切?再说,波芙娃自己又是一个全身心投入高远目标并准备为之克服重重困难而不惜的人,她不是为享受奢侈而活在世上,她无法满足他所满足的东西。

在波芙娃的自传体著作《闺中淑女》一书中,她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她对表兄雅克复杂波折的爱情心路历程。有一段,她说她甚至想放弃自己的追求了,不要写作,也不要成为一个作家了,只与他过一种简单幸福的生活,有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家。她想告诉自己,雅克就是幸福和生活。雅克英俊、富于魅力,他那变幻无常而又真实的亲切,不知扰乱过多少少女的芳心,波芙娃不想让他成为她们其中的某个人的丈夫。她发誓要与之疏远,可她又曾因他的一个声调、一个注目而荡起那眩晕般的感激。

最终还是雅克离开了她。他更早地明白她不适合作妻子。

这是在她遇到萨特之前的感情经历。如今,萨特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时,她终于明白,她一生中永不离弃永不厌倦的正在在思想上同步和谐的男人到来了。她所有的梦幻、憧憬将有的放矢,她投放在这个人身上怎样高的期待都不会落空。她甚至应该感谢她与雅克无疾而终的爱情了。

这里再顺便交待一下雅克后来的处境:

他的虚无论的确在后来的生活中没有帮他的忙,而只是加速了他的消沉颓丧。一个男人是不能仅仅靠英俊优雅生活的,那隐忍及责任的担当才能使他面对今后生活中的磨砥。当年轻时代的浪漫意识过去之后,后来的雅克结婚生子。他不知是命运不济还是经营欠当,开办的工厂破产,他无力东山再起。到最后他十分潦倒,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积蓄下钱以备不测。他已有五六个孩子,却依旧是游手好闲,肆意挥霍,好色贪杯。波芙娃有一次在圣日耳曼大道碰上他时,他们已有二十年不曾见面。但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球布满血丝,脸孔浮肿,饮酒过度几乎使他失明。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当年令波芙娃如此心醉神迷的英俊和优雅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指向和价值,他说垮就垮了。雅克才四十五岁的年纪,但看上去却像六十岁的人。他是彻底毁了,身体连同意志,他很难靠什么力量拯救了。他最后在四十六岁那年死于营养不良。

在年轻时代立下的目标之高低将决定今后终生的生命道路。波芙娃与雅克未能成婚,本也是意料之中。她已说过她需要他,却不想看到他,也就是说她对雅克当年的楚楚动人的外表是迷恋,但对他的精神旨趣却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她是早就想逃离他了,但却是他先她而提出,他终于没有成为她的拖累和后来可以想见的苦恼之源,这是他能够给她的最后的爱。

二、道德的暧昧性

现在,萨特以不容置疑的力量进入到波芙娃的生活。在

他们订下君子协议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曾经想到过修正,因为一个实际问题,萨特差不多已打算同波芙娃结婚了。但后来是波芙娃阻止了他。凡事要想成功,耐心积累和排除一切干扰是起码的前提。波芙娃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在萨特身边,朝夕相伴的交流和阅读,使她坚信自己今后是可以成功的。那么,如果有婚姻生活以及子女,则会阻碍这种可能。结婚意味着女人要承担更多。波芙娃一想到结婚将意味着成倍增加一个人的家庭责任,并且,实际上是增加一个人的日常琐屑就感到恐惧。当然,这里面只有一种考虑可以使他们向所谓合法化屈服,那就是想要孩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种欲望。孩子不可能成为加强他们二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他们也不指望另一个人反映和延长自己的存在。波芙娃一次再次地说:“为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自由。”她开始认真地反感起家庭生活来。

萨特当然不会勉强她,他也已经依世俗的意义让她成为自己合法的妻子,是她不要。后来他们再次修正了起初的协议。他们不再考虑在两者之间依靠一个临时性的“担保”。他们将建立一种更紧密、更难舍的关系,这种关系允许两人短暂分离,但不允许长时间天各一方。没有山盟海誓,但他们同意在未来推迟任何分离的可能。

认识初期的波芙娃和萨特当然爱得是如胶似漆。

但他们从开始认识到生命结束,都是各自拥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分开租,在相距不远的地方,每天或萨特来她这儿写作和讨论,或是她去萨特那儿看书和思考。他们也在一起,生命最旺盛的岁月几乎是夜夜疯狂地做爱。但他们从来就有两个不同的空间可供自己支配。

他们相爱之深著非他人可比。但是,即使在相爱的初年,那偶尔的风流韵事在萨特的生活中也没有间断。可能不结婚的提议,正可以避免某种令两人尴尬和不快的事情。其实我们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背叛和他所具有的愧疚难当,只是指他在伦理学范畴中无所适从。干脆不要这无所适从,不是彼此更从容和自在?男人先提出,是因为男人知道自己的秉质,他无法坚持始终于对一个女人的爱,爱得专一就少了激情,少了激情就会在倦怠和烦躁中将这爱全否定了。不专一,反倒保持了创造的活力,那不枯竭不陈旧的心灵会对既有的爱日久弥新。男人不是道德论者,道德论者往往是迫于其它传统和权威的威慑,或者要树一个道德的楷模而无奈之中也就习惯了冷寂寒风中的孤单伫立。但在内心深处,男人只要是优秀的分子,怎能斩断那情缘之孽根?萨特比别的男人更坦率,波芙娃能理解这一切。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关于永恒的,就是他们俩无人可以比拟的思想灵魂的和谐一致以及肉身圆满的吸引。直到晚年,别人采访他们俩,萨特谈到初识的波芙娃留给他的记忆是那么美好,他称她人很漂亮,但不怎么讲究穿戴。而瞬间的,基于他们认识的深刻和观念的超前,这将与道德的暧昧性关连。人有时候总有那么些莫名的时刻,面对一种心旌摇曳未确定的但又朦朦胧胧的觉得吸引的感情总难以控制,想要说的是拒绝,但又总有一种力量在向那种诱惑牵引。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意味了。波芙娃和萨特知道,他们创造的存在主义哲学之精髓首先在于承认人生活的真实,人不是那般大全、完善和无限;面对有限、匮乏和缺失,应该允许人自身寻求不受束缚的快乐,当然他们还应该给自己热爱的人以这种自由。(当然还应该引入

“节制的力量”。这并不表明他们双方不再相爱,而是爱得更广阔更有力度。永恒不是一种囚禁,而是以自由以喜悦。人的自我束缚及神性自律肯定会在某天清晨到来,用不着别人对他指手划脚。比如,人在昏天黑地的暧昧生活中既久,他就会讨厌厌倦自己,他就想听到禁欲主义清爽低吟的悄唱,而不再想要那略显混乱的床褥之上揉搓一团的杂冗。

萨特一生都喜欢女人。波芙娃刚开始必须学会适应萨特的这种生活与爱好。还没有别的男人能进入她的生活,一是她还距成功有相当遥远的路需要趑行不息,再就是真的还没有什么人能像萨特这样吸引她。她不是想守贞操,但她差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确是过着比较单纯明净的生活。可萨特是够热闹了。在他们认识不算太长的年月,萨特爱慕上了已经四十岁的勒梅尔太太。当然,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柏拉图式的感情。年轻的萨特对这个年长于自己的小巧丰满、典雅入时的女人着迷。他更着迷的是她那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心烦意乱的机灵头脑和虚心好学、受人信赖的品行,以及始终保持着十八岁姑娘那天真烂漫的好奇心。波芙娃也进入了这种生活。他们彼此都以那种广博的胸襟处理着这种本该是令人尴尬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与关系区分都被他们巧妙掌握着,如若不是具有智慧和高贵兼存的品性,事情是无法朝着这等和谐美妙的关系发展的。波芙娃此时已非常坚定地知道:要紧的不是去寻找别人的不周和瑕疵,而是确信自己的目标并向前走去。

还有另一个姑娘和萨特的关系也很密切,她叫卡米耶。她简直拥有某本小说女主人公所拥有的一切魅力。她极力使自己又美丽又聪明,并且竟然非常意外地二者兼得。并且还

有她那不羁的个性以及奇思异想。她的成熟始自感情的成熟。在她为情人设置的屋子里等待情人的到来时,她头发披散,一丝不挂地站在火炉前,读米什莱的作品,过一会儿又读尼采的书。她的文化教养,她的自豪的承受力以及那精妙技艺,使那些城镇职员和律师在她的枕边艳羡满足得哭泣。萨特为了去图卢兹看她,常常要花半年的时间积攒路费。后来,她与戏剧家迪兰发展了关系。这是萨特十九岁,卡米耶二十二岁那年发生的事。

后来萨特向波芙娃说起她,是当他尽力想促使波芙娃摆脱懒散的时候。他总是以她为例,讲她如何彻夜不眠地写作,如何勤奋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会具有意义。波芙娃拿自己同她比较,却不知该承认谁该否定谁。后来她见了她,她觉得卡米耶有一种魔力,似乎要把她吞并在她的世界里,并且毫不在意地把她扔到破烂角落。但后来,她们之间的交往正常了。

对于波芙娃,她的一生都是在对自我认识和反省中度过。她与其说是理解萨特,不如说是理解自己。她没有回避那暧昧的道德所包涵的抗拒、屈服、冲突以及妥协的复杂意味,她得知瞬间之时的肉欲特征是如何呈现它鲜活而撩拨的琥珀色光泽。它不是对永恒的背叛,而是对永恒的丰富和补充。谁能拆散她与萨特呢?她深知这种历史契约已如楔子一般楔在了他们的生命史上。是萨特,唤醒了她全部的精神、灵魂连同肉体。她在谛听自己灵魂的秘密的同时,也在谛听肉身的秘密。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人会有单纯的生理欲望。无奈无可奈的季节,风十分凉爽地吹着,身体内部却是燥热难耐。渴望一个异性。那饱满膨胀的双乳渴望人的抚摸,神秘的昏醉之时想要做爱,与灵魂无关,只是那快感和酣畅淋漓的

生理欲望。这是秘不宣人不易启齿的私话,却常常那样真实地走到脑海。她在自传体著作中讲到她与萨特很好的性爱,当然也谈到自己的自觉意识和肉体激情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不喜欢以预先规定的方式做爱。我不承认一个人可以违背自己的意愿来顺从欲望,也不承认人有蓄意创造快乐的可能性。做爱的快乐应该像大海的波涛和桃树开花一样不可预示和不可抗拒。”我的身体有它自己的狂想,而我无力控制它们。狂想的威力使我的防范无济于事。我发现,一个人生理上的欲望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苦。一件有毒的衬衣从头到脚编织在我的全身。”在黄昏时分,她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容光焕发的自己,她摆脱不了的思想再次亢奋起来,她说在骨子里头有一种潜在的疾病已经侵蚀了她的骨髓。

一切是缘于太年轻了。年轻时节是无法有道德优越感的,因为肉身总是造次;只有生命进入老境的冬眠,皑皑白雪封住了泥泞的道路,一个人因保守和沮丧会煞有介事地扛起道德主义的大旗。

而年轻的人们,眸子里越是纯真,行为上越是放肆。人,总是易于去寻找那不受任何束缚的快乐。波芙娃认识自己,先不是从精神上,而是从肉体上,她要看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承认:“我生理上的欲望远比我所想要获得的要大得多。在我所选择的男人对我的狂热的爱抚和性行为中,我能够分辨出我内心的活动以及作为个体的我的自由,但孤独、不可抗拒的兴奋心情却大声呼唤着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

“无论他是谁”这大胆坦白的秘密已披露出人所坚持的道德主义立场的脆弱性。波芙娃没有隐瞒自己的纯生理需求,

这是在生命身体最为元气贲张时代的疾声,带着不那么圣洁不那么高尚的目的。渴望任何一个异性走向前来,不是与他对禅谈玄,而是登峰造极于生命的造次、纯粹的欢悦,将禁欲主义的律令完全搁置,只是翻卷、腾挪于天上和地下。经验的越经验,黑壮的身体潜于泥土,于酣醉的沉沦中体验敞开之时无比美妙的快感。身体内部有天使的最终守护,却也有魔鬼的登场,蛇于夜未央时穿行于莽棒与草丛中,搅扰得人心难宁。可是,如果那魔鬼离去,却觉得身上的天使也不翼而飞。它们总是同在。越经验,也就可能越超验,这并不阻遏反而促使自己去想建功立业的大事业。

也只有波芙娃这样的女人才会发出如此真实无忌的声音,令一向以矜贵羞楚为能事的修女骇然。但这正是波芙娃之所以是波芙娃的原因。她不要作淑良守拙的普通妻子,她将几千年被女人忽略和埋葬的性饥渴性要求讲了出来,女人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等待灌注的被动的器皿,它是上帝的造型,美好的礼物和妙不可言的尤物。在那个平躺于床的下午,在身体一阵又一阵的燥热中,就这么疾声呼唤。不想让自己正在茁壮旺盛之时萎蔫枯涸。所谓的优美与高贵,便是渴望在撞击中推开神秘,嗅到飘荡于原野的空气中那肉欲的芳香。会有那于道德主义立场顽固坚持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幡然白发,嘟囔着干唇嘀咕着保守的原则。这是因生命老去的无奈。

她自己已经想清了人之为人的冲突与奥秘,对于萨特,她当然是能够领会和理解。在勒梅尔太太、卡米耶之后,萨特在认识波芙娃之后第一个发生兴趣的女人叫玛丽·吉拉尔。她与波芙娃也认识,波芙娃没有嫉妒之念,她认为“嫉妒远非我

所能有的感情”。她也不会使与萨特共同生活的信念发生动摇。但是，真的诚如她所说她已很好解决了嫉妒的问题了吗？其实，总是有反复。在《女客》这部小说中，则记述了关于“三重奏”的关系，那是发生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件事。一个叫奥尔加的女孩进入到波芙娃和萨特的生活中。她是波芙娃的学生，比她年轻九岁，人美丽而又聪慧，深得他们俩的器重。但在交往一年之后，萨特已经给奥尔加迷住了，他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于她，给她讲故事、唱歌。波芙娃从旁观察已发觉卢昂开始出现朦胧、闪烁的亮色，奥尔加的朝气正把萨特和她所处的周围外省式的乌烟瘴气冲洗殆尽。他们决定把两人交谈改为三人会议。

这迷人的“三重奏”可能成功吗？

但是，那原先设想的大厦开始出现裂缝。波芙娃必须承认，经由萨特之手建筑的这座大厦是由他对奥尔加迷恋的力量而成，她自己虽然试图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她却从未感到过自在。他们三人一起时，奥尔加的风姿绰约和为了尽量吸引萨特不免露出的搔首弄姿，使她感到有“双重的失败”。她无论什么时候一想到“三重奏”将要长期延续下去，就觉得被吓坏了。她知道没有理由抱怨，与奥尔加争夺萨特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理性思考却未能减轻她的不快，她既为萨特制造的这样一种处境生气，也为奥尔加利用了这个处境而气恼。隐晦的怨恨、羞辱感咬噬着波芙娃的心。她在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甚至好像还在促进“三重奏”的健康发展，但想到将来，她不寒而栗。

但是，波芙娃依旧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到萨特真正回到她身边的一天，她始终确信这女孩固然有鲜活生动的青春，但这

不可能比自己的经验更珍贵,那注定是短暂的事物。她不是要和她较量,她只是想,有一种狂热劲儿会伴随着时间流逝,这不是她要冷眼旁观事态将朝向不合意不理想的目标走,她也不是有意地要人为中止萨特与心仪女人的感情,她只是相信,只有自己能与萨特建立那种永不言弃永不厌倦的永恒关系,这是由她综合的素质、智慧和理性的穿透力作底蕴,而萨特也正需要由这样的女人首肯。而别的女人并没有像她那样在结识萨特之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奥尔加的风情当然使萨特感到了振奋,这是他从端宁娴淑的大家气象的波芙娃身上所没有看到的一种新鲜。但是时间久了,那道秋波一闪,虽然使萨特看到她身上外在魅力之动人,但他仍然认为她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他在时间长了以后,已多少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折磨自己的欲望和喜悦的空虚感。

这种关系并没有使波芙娃感到幸灾乐祸。她固然想到前景的恐惧,内心交织的还有失落和羞辱感,但她确实太爱他,衷心希望萨特快乐、健康和幸福,她总习惯以他的标准衡量事物的标准。这不是说她失去自我,不再坚持独立性,而是源于爱,这爱既确定又盲目,既清晰又暧昧。但后来,他们三人经历了“三重奏”的挫败和校正,其友谊一直维持了终生。

还有一次萨特的感情外遇也让波芙娃感到“嫉妒”的不可避免,但理性终有力量将它转化为有益的力量。

二战以后,法国知识界有许多的事要做,萨特与波芙娃、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等一些朋友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萨特这期间还应邀到美国讲学。

就在美国之行中,萨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美国少妇M,她当时正处在与丈夫的半分离状态。萨特从美国回来之后就向

波芙娃讲到 M,他没有隐瞒他的感情,他告诉她,与 M 已建立了鱼水之情,难分难舍。两人希望以后每年都在一起过上两三个月。他兴高采烈地回忆着在纽约与她相处几个星期的情景。后来波芙娃也有机会到美国讲学,她见到了她。她的确如萨特所描述的那样长得娇艳媚人。她对波芙娃的到来虽然表面热情,但实际内心存有戒备。虽然波芙娃并不恐惧萨特要真正离开她,可她未免在心里有些不自在。她原以为吸引他的只是暂时的这种情感的浪漫色彩,但后来她不得不这样想:十五年之长,这么漫长的时间,是否他们之间只剩下习惯使然,而很少再有波谲奇崛的感情冲动了呢?而这种关系又有它什么样的独占权?自己当然已有答案,但萨特的答案就一定与自己一致吗?据他说,他和 M 的反应、情绪、不安、欲望完全协调一致。他们一同出门,她要停步时正是他要停步时,她要再度上路时正是他要再度上路时。这也许说明,他们之间在深层——在生命泉源,在生命节奏赖以生成的源头更为和谐。而波芙娃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未与萨特达到这种地步。波芙娃想,这种和谐是否比她与萨特之间的理解更重要?一次外出时她问萨特:“坦白地说,我和 M,对于你孰轻孰重?”萨特回答:“M 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他做出的解释是:拒绝改变与她的关系;同时,他深情地爱着 M。他又说:“我尊重我们之间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他一心相信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使波芙娃感到未来岌岌可危。如果没了那种相见时的强烈吸引和生命间的重要性,守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

是出于微妙的报复心理,还是觉得自己必须要将空白一段的感情找到另一种补偿?美国之行即将结束时,波芙娃自

己陷入了一场热烈的爱情中，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三、忠诚与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胜了悲怆、流血，生命、友情以及爱仍然柔韧地存在和喜悦。一段时间，波芙娃陆续发表了她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女客》、《一代风流》、《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等等，并确定了她在文坛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者的重要地位。

1947年，她到美国讲学。全部行程以交流、演讲和旅行度过。在行程即将结束时，她发现自己已迷上了差不多同龄的高大、英俊的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雷。他是那种始终关心下层平民并且深入进去搞实地采访的作家，他的书记述着他在美国的贫民窟和暗不透风的潮湿濡溽之地所观察和亲身经历的一切。他住在芝加哥一条遍地废报纸的小巷，那间陋室没有浴室、没有冰箱，门前就是一个放满臭烘烘杂物的垃圾箱。阿尔格雷是具有左翼色彩的自由分子，波芙娃与他在政治见解方面都具有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气质，这使她与阿尔格雷的交往更觉出生命的流动感和生气。这不是仅仅呆在房间里冥思时，而是他牵着她的手在幽僻的小巷穿梭时，她感到的是另一种写作的使命感和战斗的激情。波芙娃太喜欢这流动感，这战斗与激情。他带她去见一些另类：吸毒者、妓女、赌徒、小偷和刑满释放犯，他与他们交往，并准备写一部关于这些人的小说。

阿尔格雷对波芙娃意味着全新和刺激，他们双双坠入情网无可自拔。在别人眼里，阿尔格雷冒失、粗鲁，但在波芙娃

看来,这正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他拥有世间最稀有的品赋,比方:他真心实意地关心人。对这种品赋,她认为只有以美德相称——如果美德这个词不被滥用的话。依波芙娃看,阿尔格雷还是一个富于活力与浪漫的人,他能燃起女人的爱,他对一个女人肩起未来责任的那种大男人的执拗、坚定和永不离弃,而且他还要形式的认可。他要求她同他结婚,他要一场有始有终有名份的爱情与婚姻,他不是仅仅想到一起就到一起的那种萍水相逢,他要共结连理、白头偕老。他要那种惯常的生活秩序和日常场景,他不要那种超世俗的东西,而只要世俗的,既苦恼又温暖的勾连相守。

一种感情的迷恋沉醉并没有减轻她与萨特之间的种种麻烦。

她在牵心挂肚中从美国回到巴黎,而萨特则与 M 的关系之间出现麻烦。M 曾经在与萨特重逢之前写信给他,很有信心地说:“我这次已下定决心千方百计使你要我留下。”但他却没有要她留下,她为此而恼怒。

萨特与波芙娃和 M 之间类似周旋式的那种戏剧性关系:波芙娃为了避免同 M 摩擦,与萨特搬到巴黎郊区的小旅馆,那里几乎如同乡间一般的令人心旷神怡。但在固定的几个晚上,他进城与 M 会面。波芙娃此时已经想开了,她无法独占萨特,正如同她已有了阿尔格雷,萨特也不可能独自占有她一样。再说,他们之间不是彼此占有的关系,而是另一种更高境界的关系。波芙娃甚至说这样的局面如果 M 满意的话,倒是挺合自己的意。

但是 M 忍受不了。她无法忍受与萨特再次的分离,而萨特却希望她离开。他曾经有言在先,与 M 他不可能结成百年

之好。他拒绝改变与波芙娃已形成的这种关系,但他当时是说过对 M 深情地爱着。可如果是深爱着,他为什么能够忍受与她一别数日呢? M 内心的苦恼不能像波芙娃那样得到解脱,萨特不能给她以承诺,他是不可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但他们依旧还来往着。他陪她去勒阿佛尔,但两人分手时,她又抱怨萨特带给她的痛苦,她是那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人。她写信说,以后要么永远不来,要么来了永远不走。

波芙娃这时依旧在思念那个高大的美国男人。她知道自己也是无法改变与萨特所形成的这种关系,可她又放不下阿尔格雷。她真的是为他动心和痛。是再赴芝加哥还是把这事忘掉?她几乎到了心理失衡的地步。钱不成问题,感情也不成问题,那么她痛苦焦虑的问题在哪儿?

阿尔格雷向她求婚,以他的方式要承认她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她不能不感动,除了她是铁石心肠。这男人要求与她白头偕老,她也感动,因为她明白这全部占有也是爱的极致,正如同她与萨特那种既忠诚又给对方以充分的自由一样。但是,她却与他最终无法谈拢,无法答应他的求婚。但她也在考虑是否仅仅满足于享受这种伙伴般的关系?自己满足这种感情定位,而阿尔格雷则不,他也是那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凛然分明的人。

那一段,她得靠镇静剂使自己安睡。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波芙娃在自传中写道:

“我还在奢望把光和影分开。突然之间,我发现

自己正在化作一块石头 ,钢刀正不停地劈在这块石头上 ,啊 ,这就是地狱。”

而且她看着萨特与 M 恨爱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依旧不免会惊恐地问自己 :我俩是否已成陌路 ?

波芙娃开始不断地做恶梦 ,总觉得后脑勺有一只黄眼睛 ,一根长长的缝衣针正刺进这只眼睛里。她描述那种焦虑、惊恐和矛盾的心境 :

群鸟在向我进攻——得把它们赶跑 ;这场搏斗太累人了 ,我要夜以继日地奋斗 ,把它们——死亡 ,我们的死亡、孤独、空虚——赶走 ;夜间 ,它们向我席卷而来 ;一大早 ,它们则抓紧时间逃跑。假如我内心稍有一丝松懈 ,它们就悄然而至。在斯德哥尔摩的那家咖啡店里 ,两种颜色尖声尖气地互相诅咒 ,其中一种颜色是橘红 ,另一种颜色是绿 ,它们的聚首令人痛苦。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 ,它拉着 ,拉着 ,越拉 ,我的头发越长。原来是死 ,它想攫我而去 !

在那一年的春天 ,波芙娃决定再次前往芝加哥。她问阿尔格雷同意不同意 ,他同意了。在等飞机的时候 ,她读他的小说 ,他所描述的他的童年。他在这里已经等了她四天。她这一次来可真是不易。来之前 ,M 曾答应与萨特共同生活四个月 ,但在波芙娃出发前几天 ,她又不来了。波芙娃六神无主。她觉得应该有女人陪萨特。她这时是把萨特当成了孩子 ,她对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负有责任。

她终于同阿尔格雷在一起了。他带她去看另一种生活，那是在芝加哥的贫民窟，与吸毒者、小偷交谈。她认识了阿尔格雷的生活是由这种对底层人的卑微负面的生活构成，构成他写作中揭示的力量。

他带她到海边、到丛林、到印第安部落，到异国，到一切她感兴趣而他也感兴趣的地方。

她要提前回去陪伴萨特，她却鼓不起勇气向他说这件事。她看着他兴致勃勃的面孔，感受着他牵着她的手前行时的依赖感。她要和他终生厮守，就得融入他的生活，他的背景对于他太重要也太强大了。可她能吗？

总要决断，她知道那永远分手的一天迟早会到来。他已觉察到她的态度，她要离开他是绝对的宿命。他显得烦躁不安。波芙娃像个女孩子一样哭了一夜。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她知道他是那样善良那样爱她，一切罪咎在她。

她不能答应他的求婚，不仅仅由于萨特，也不仅仅由于她原先一生不打算结婚的决定，而是由于这两个相爱者处境的尴尬，况且他们谁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一个在美国的芝加哥，一个在法国的巴黎。波芙娃不可能在美国呆下去，那样她认为会生活在一个把自己的“写作原因和可能破坏殆尽的世界中”。面对阿尔格雷，波芙娃建议他到巴黎，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干，他写作的根基也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他必须扎根于他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他离开自己的探察、寻访的底层穷人，他愤懑、批判的力量会削弱。他能到巴黎干什么呢？只是享用那里的暖风，只要一个女人陪伴就足够了么？他是一个写作者，她也是一个写作者，双方的生活

都定了型,两种生活不能嫁接,这注定了他们必然分离的宿命,因为他们不同的两种生活形态不能合一。但他们这一次的感情不是消遣,也不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他们每一方都为对方不愿来同自己共同生活而痛惜。

他们终于得分手了,波芙娃感到剜心般的痛。

离开后阿尔格雷给她写信。

他说他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告诉过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这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写这个城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这份工作。重起炉灶已毫无意义。”

他知道波芙娃也不会离开那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满足。”

阿尔格雷在一次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上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他写信告诉了波芙娃这件事：

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她,那肯定也有别的女人取而代之。这不是说,我已不爱你了,但你离我好远啊,到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相隔好久啊……你不会远离你的祖国来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为我总要回到这儿,回到我的打字机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总感到需要别的什么人来亲近,因为你离得好远啊……

他继续写道：

去年,我还担心因为对你不忠诚而毁坏了一切。

如今,我懂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把一切温暖拒之门外。

无以复信,无以言对。但她知道,如果与这个男人的关系中止,她会一辈子苦恼、懊悔。这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对波芙娃震动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头。

她在自己的镜子中看到了四十岁,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衰老。萨特当然也知道这件事。

这之后她一直在思考忠诚与自由的关系。她认为在她与萨特之间尚有不少余地去尝试风流韵事,露水姻缘,体验“偶然的爱情”是他们的心愿,他们彼此忠诚,有思想的共同与和谐的性生活,但又不时的有第三者插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要求的彼此忠诚只是彼此的限定,那他们一生中所看到的世界神秘性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宁肯隐瞒,不知为不知就以为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旦看到自己热爱的人与第三者有亲密关系时,不免觉得受到伤害。波芙娃本人其实也不是那么顺利无碍地度过这阶段,但她能矫正,目送对方远行,自己也准备打点行装出发。萨特不像传统中别的男人,要女人允许男人的寻花问柳,但男人则很难容忍女人红杏出墙。在他们生命最旺盛的阶段,他们聚在一起交谈、旅游以及过着和谐的性生活,但他们分别又兴致勃勃地恋爱,与别的女人或男人——虽然波芙娃的男朋友没有萨特的女朋友多。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取代这种关系,就连

闯入的第三者也要适应他们的协议,如果第三者得寸进尺,他们之间就会陷入危机。以上所说的波芙娃与阿尔格雷的关系就是一例,波芙娃在记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时,却又承认这一切有让第三者深受其害的不足和混乱之处。她对阿尔格雷怀有愧疚和无奈的复杂情绪。

但后来什么都流逝而过了。大海又复归寂静、平和,海鸟飞翔着,划出美丽的弧形。但是,强烈的感情风暴在人尚年轻葱茏的身体内部远未结束。

四、肉身的领悟

在与阿尔格雷分手之后,揽镜自照的波芙娃已看到衰老,这只毒蜘蛛正在爬上自己的面颊。智慧女人更注重时间感,对时间有限的领悟会更透彻。她同时更关心肉身,计数那垂坠和坍塌是怎样一寸寸到来的;在人背后,她深感焦虑与恐惧。因为她绝对不比任何女人在这一方面乐观和容易欺骗。女人很难摆脱年龄日长所带来的困扰,尤其在四十岁这个最过敏感的转换点。波芙娃已发现自己开始遁入麻木的日常,对世界万物一天天失去兴趣。不仅生理机能在滑坡,还有创造性生成活动在缓慢。她常有的是淤塞滞重感。写作固然需要终日面壁的孤独,这是在为等待神谕的莅临,可是,却常觉那创造性涌动时分,血往上涌,浇灌在土地长出语言籽苗的时刻越来越少了。这是纯粹的身体匮乏,与精神无涉,却仅与肉体相关。波芙娃差不多快要拿自己没办法了。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这匮乏、麻木都是为了迎接更强大有力的肉身掀动?其实,在身体以为是沉寂的内部,欲望则舔着蛇一般的舌头一

个劲儿蹿动,无可启齿的难耐。固然有萨特,但他们之间的身体太过熟稔,那疯狂的激情为平和相守所替。她渴望另一个男人走到身边,也许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才得以重新撬开她身上已成铠甲的旧壳。她已经过了四十岁,她知道得很清楚,再优秀的女人,所能挣扎的火红葱茏的岁月均已所剩无多,她大概必须在五十岁以前将应该经历的经历完毕,之后,她会成为一个经验的旁观者和旧事的记忆者。她不可能在五十岁以后重新跳进经验的漩涡,她怕她到那时游弋不动。她必须未雨绸缪。

在波芙娃四十二岁那年,她与一个小她十七岁的犹太年轻人朗兹曼相爱了。

“我带你去看电影。”

“什么片子?”

“随便哪部片子都行!”

朗兹曼执意要牵着她的手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她突然感到自己像一个迷路的小女孩那样。放下电话,她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后来她写道:

“五天以后,我离开了巴黎。当我启动车子时,朗兹曼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告别。某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毫不怀疑,某种事情也正在开始发生。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肉体。我沉浸在一片分离的柔情之中,竟在郊外迷了路。”

“我回巴黎两周以后,他也回到了巴黎。我们的肉体又一次愉快地重逢了。”

与阿尔格雷如果说是更侧重情的,与朗兹曼也可以说更偏重欲的。波芙娃没有为这次的情感开始给以隐瞒实情,她一次再次说到:“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又一次愉快地重逢了。”

肉体的穿透才是真正的穿透,这绝对比精神的穿透更带给人不灭的记忆。更何况这是一个多么年轻、光华四溢的肉体。这个男人才二十五岁,有他这个年龄所独有的身手矫健、神情活跃,以及如喷薄的朝阳那般生命的感染力,富于希望和前途。她其实已在内心千百次地呼唤了,她不讳隐,她在分析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是谁首先朝向谁走来的呢?

他,朗兹曼,有光滑而黝黑的皮肤,携带着上帝后裔的纯粹气息,朝向她走来。他牵着她的手,她犹如一个迷路的小女孩。她甚至有些委屈得想哭。很久找不到这种细小如沙的甘甜了,而这个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则使她找到了这种感觉。她把手放在他的手掌,感到厚大而温暖。她有些模糊的情感在清晰,更奇异的是那有些模糊的身体的线条也在清晰。她窈窕淑女一般依偎在那个年轻男人的身边,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别扭和荒唐。

她不是要抓住他为生命辉煌落日前做最后的弹跳和挣扎。是他首先向她发出求爱的信息。大凡对小于自己的男人,女人即使在心里存有了爱慕,也不会主动走向前去的。年龄在她这儿是个禁忌和讳口。她对那青葱如杨、香如干草一般的年轻异性固然充满了种种的欲望,但她不会首先说破,否则,她以为自己会担了诱拐的名声。况且,在没有摸清事实真相的时候,年长的女人绝不会用类似少女怀春那般的感情去

试探一个男人的爱情,更何况去乞求。对方的任何细微表现,她佯作心不在焉,其实是十分的神经敏感。她害怕尴尬,害怕不软不硬的反弹所具有的反讽与自嘲,那样,她简直是自尊。她以往所有的经验凭恃教给她的是矜持,即使在无望的岁月止不住下沉,但她绝不能成为一个被怜悯和被施予者。尤其那更为心高气傲的女人。波芙娃的焦渴是在距人以背后。她在人前被荣誉的光环笼罩,她被称之为“女权主义的教母”,她的《第二性》被誉为“女性的《圣经》”,她类似语言女神那般的身份为人仰慕,她在外人眼里是那般光芒万丈,被簇拥着,四周全是红艳的玫瑰花。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对于女人来说,那些外在事物都会过去。舞台纵是搭起来,但幕布终会关闭,到曲终人散之时,那留给自己的终是绝对的空。她要的只能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历史证明。那年轻男人的生机勃勃使她在血的智慧中,在被滋润的春夜,内心重新生长出绿芽,那是创造力最可靠的前提。但她不会自己首先去要求这些。自尊、矜贵以及种种的讳忌,女人必须克制自己种种的大胆奇想,在这一点上,创造性女人也同常规性女人一样。年龄,是女人最大的讳忌。

是朗兹曼主动向波芙娃走来。年轻男人发出的凛冽攻势逼使女人就范。这就范的姿态是佯装还是真的躲闪不及都且不论,但这姿态是格外好看。女人恢复了女孩子的感觉,被宠爱着,她把年长的顾虑,类似诱拐的女巫的可怕形象都存而不论了。

朗兹曼存有对波芙娃的崇拜。这是一个迷恋精神生活的人对一个同道者的理解。她的成功是靠巨大的艰苦的劳动,无人知晓背后的栉风沐雨。了解价值为何物的年轻男人在这

个年长于己的女人那里看到了比青春和美貌更有含金量的东西。崇拜一个值得崇拜的女人,男人匍伏于地的感觉并不标明自己的渺小,亲吻着脚下的土地内心生出种种的骄傲感。

况且还不仅仅是单纯的崇拜。年轻男人的心,更想在一个正值盛年的女人那里找到人生历练开始时的重要一步。那富于才华和风情的初入中年的女人,妖娆的腰肢款款摆拂,她不是稚嫩和羞涩的,而是能够在前方引路的,男人在伊始经验中可以找到一种更为可靠的东西。他迫切需要经验,而年长于他的女人可以带给他很好的经验。他需要经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性的。

而她是在重新陪伴他的新经验吗?她在重复去做一切吗?不是。他年轻明澈的眼睛使她自己感到也年轻明澈起来。年轻的男人带着阳光、干草种种无邪纯正的气息,这让芙娃入迷也让她感动。波芙娃已经在同龄和年长于自己的男人那里找不到这种感觉:健康、向上、清爽,天籁一般;而男人一旦走过年轻,就显得混浊不爽和滞重。而女人,已敏感于年龄增长使自己跳进怪圈,她感到惊喜不够了,但是在身体内部却有更为强烈的要求在向她发出种种讯号。四十二岁的女人,精神和肉体都成熟得如秋天岗崖之上的红果,烂漫而多情,却又知道盛年之日所剩无多,五十岁以后,差不多是场光地净,只能依靠书本的阅读和往事的记忆与描述,写作不再是经验中放逐野猎的欲望化叙事,而只以平实素朴的历史性话题展开。

朗兹曼牵着她的手,她只是跟着走。如果只是迷醉一时,那也就一时吧,一日总是胜过百年。他们都明白,两人相差十

七岁,不过,这个距离并没有使他们着慌。这个注定要经历颠沛流离艰辛生活的年轻犹太人并没有使波芙娃觉得他小,她常常忘掉他比自己年轻。他成熟、见解深著,他让波芙娃觉得稳笃,可以交付——当然这里有所保留。她说:“如果要真正奉献自己的心,我需要某种距离,因为我不想去重复我与萨特间具有的那种理解。阿尔格雷属于另一个大陆,朗兹曼属于另一代。同时,这种差异也使我们的关系维持了平衡。”波芙娃知道自己年长于他是没有任何最终的完满结局,比如世俗意义上的男婚女嫁,她只是感到他年轻的生命所带来的喜悦、惊愕、开怀大笑以及忧虑——这种世界的新鲜又回到自己身旁。他年轻,所以她知道自己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注定只占据他生命的一个短暂部分。这也正好为她提供了一个借口:可以不必在目前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而是有所保留。

在遇到朗兹曼之前,她已经开始对随之即将到来的衰老有深深的焦虑,并几乎要被它打败。但他帮助她恢复了身体的信心和生机。成熟的女人正好开始懂得什么叫肉体的绝对沉迷和极乐。在极乐的年轻的利箭穿透之中,她的身体恢复清新明媚的感觉,并步入天堂。她已不再是青涩羞怯的小女孩,她已全部准备好了,一潮又一潮的涌动,与那激情不已膂力强健的年轻男人不谋而合,旗鼓相当。

这是真正的放松、惬意,与上帝对话。肉体之间的唤醒才是真正的启迪。纯然的精神启迪已经完成以后,更渴望和要求的是肉身的启迪。在精神上,她已自足,她可以不要男人就能完成这种启迪了,她在距人背后已透彻想好。但那肉身启迪,她与这个年轻人各取所需的走到一起。这绝不是功利算计,而是生命间冥冥的呼唤和响应,彼此互为和谐、流畅的生

命感应。

多么好啊,那强烈的却又是极其温柔的急剧冲撞和蹂躏里,但见鲜花盛开,香气袭人。女人在这时才叫如花似玉。波芙娃作为存在主义理论的中坚,太知道人仅有一次生命的可叹与无奈。她现在还不算老,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她还能年轻吗?上帝不会饶过任何人,只是会多多少少推迟对女人的衰老事实发布讯息。但“人总是要死的”,波芙娃写作的小说题目就是这样赫然醒目。在必死的生命面前,存在主义理论为一切的逾越和造次提供了可以推诿或解答的有力证据,也为人逃离原罪提供了口实。

况且,在波芙娃,当她仅仅是一个人而不隶属于他者的时候,她不必经受秩序生活中的一般规定,她甚至连良心折磨、灵魂的拷打、原罪的忏悔这一点都不用去做。

这就要感谢萨特了。

萨特和她的君子协议在这时显得分外珍贵。他们彼此热爱却又不会彼此囚禁。固然萨特为自己拥有不同阶段的不同女人事先打了招呼。君子协议就是君子所为,把丑话说到前头,不至于今后以虚伪的欺骗的方式造成双方的不快。给自己自由也给对方以自由这显然是西方男人在尊重妇女的立场上可能做的。东方男人更容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萨特寻找的这个终生伴侣必须是懂他的,如果不要精神高度,他取智慧平平的美貌者就足够了。这个女人可能会对他一切精神感受情感趋向一无所知,他在外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要自己在观念上担待得起,一切都可以瞒天过海。因为那不懂他的女人可能是很愚忠地待他,而自己可以自得其乐。萨特如果确定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以无辜者在懵懂中的

快乐为自己自由放逐的条件,那么他就只是一个寻花问柳的偷情者。偷情者的感觉虽然是够刺激,但那显然不是萨特的行为方式。他不想让一个不懂他的女人浑然无识的麻木陪伴,他必须选择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战友。他寻找到了波芙娃也是他的幸运。

波芙娃在眼瞅着萨特女友如云时也会生出醋意,但她所做的是以克服人类的这种嫉妒情感为思考的起点。如今她觅到了新欢与新知,正体验着萨特曾经的情感与肉体的双重欢悦。并且因君子协议在前,她没甚良心折磨,而只去享受生命的盛宴就是。她真真切切感到人的爱不会越来越少,只会越来越多,而且拥有爱的富足感将使他或她不再是狭窄偏执的非此即彼的绝对论,而是爱这个又爱那个,那是包纳万川百海的博大感情。她此刻爱朗兹曼,并不证明她不爱萨特了。她在与别的男人相交相融的亲密关系里,只会感到与萨特在生疏和分别过后那种更强烈的感情。人如果只把目光牢牢盯在一个人身上,自己会麻木,对方也会麻木,从而找不到激情与动力。而一个新入者的到来,则得以重新激发,由此举一反三,欲以把人类最美好的男人和女人都拥在怀里。

波芙娃说她在遇到朗兹曼之后,那曾遭到的恋爱创伤在修复,身体在第一次衰弱的警告已经远退,战争也在消逝,她喜悦、欢乐,她说她是跳回到幸福的天地中了。在短短几年间,朗兹曼陪伴着她旅游,间或也有萨特的陪伴。1953年夏季,四十五岁的波芙娃与朗兹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旅行;1954年初春,与朗兹曼赴阿尔及尔;2月与萨特赴比利时;1955年夏,与朗兹曼赴西班牙旅行;后与萨特到中国参观访问;1956年春,与朗兹曼驾车赴伦敦;1957年夏与朗兹曼去瑞

士度长假,后又与萨特到罗马……

1958年到来的时候,她五十岁。她与朗兹曼已相爱八年,他已经成熟为三十三岁的男人,朗兹曼将要带着他从她这里汲取到的丰厚经验,从这个生命驿站过后要重新上路,开始他另外的历程了。朗兹曼在慢慢与她疏远,她这一次才感觉真的是老之将至。

她没有想到要朗兹曼的终生终世。他还那么年轻,生命的节拍注定不能同她一致。她在生命有效期曾经有过他的有关历史的证明就足够了。她早已预卜了曲终人散的一天。她曾经轰轰烈烈过后,不再会是在滴漏声声清数佛珠无眠天亮的忧怨女人,她活过、创造过,因此一切都满足了。

由波芙娃和朗兹曼的关系想到:大凡有创造力的女人,在她中年之后,总是多多少少会与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人发生关系。比如萨福对一个年轻的海员无比沉迷,据传是为了等他归来而不惜纵身碧波;再比如斯达尔夫人曾与一个比自己小上许多的男人秘密结婚。这在她们很年轻时是连想也不会想的。那时她们更易于在精神上依傍强大有力者,寻找靠山和依恃。但是当她们步入中年,一切初衷全变了。尤其是当她们做出实绩,那种磨砥和苦熬令她们耗神伤气,也令她们觉得那休憩在一般异性那里是找不到的。她们渴望更年轻的生命,从他们那里才能找到青翠欲滴的复活一般的感觉。况且她们已拥有权威,不再需要依恃于什么,而是可以像男人那样开始主动正视自己的需要和渴望。观念已得到解放,不存在任何障碍,只是消受便是。她们已拥有特权,生命开始自己为自己作主,那已建立起名望与光荣的女人,已不再是被动的审

美角色和被动的性爱伙伴,而是她们主动要求嗅那清爽如怡的气息,爱抚那健朗光滑的皮肤,消受那不知疲倦的做爱,迷失于眩晕般的快感中。此时她们不是女巫也不是女神,而只是还原成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女人。

她与朗兹曼还是慢慢疏远了,但这个年轻男人陪伴她八年已足够她品味了。她与他不再是性爱伙伴,没有这层两性关系,但他们依旧是朋友。解除了两性纠缠,为更加平和正常的关系代替。她早已预料到这一天,没有意外和惊恐,正如同她预料到自己有一天衰老会如期而至一样。但她在《第二性》中写道:大凡是能提前思考衰老来临的女人,到头来反而能更明达从容地迎接和过好这一生命的转折。

今后,她将会隔岸观火一般明察秋毫于世事嬗变,因为她什么都经过了。

什么都经过了,许多神秘的通道被打开了,她从此下笔更为纵横恣肆,对问题的揭示也更为真实确切不会隔膜不清。她最好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在她四十岁以后完成的。比如在《他人的血》这部作品中,波芙娃揭示人身体内部那莫名的隐晦的东西,其中包括“无爱的激情”。比如描写爱伦娜开始同保尔发生性关系的那段,说的便是周身燥热间,渴望就是渴望,与精神无涉。她并不爱他,但她接受了他:

只有那只在抚摸爱伦娜后颈的有血肉的手,正在触动她脸颊、额角和嘴唇;直到后来她感到被某种苍白的、令人作呕的雾气裹起来了;她闭上了眼睛,她毫不抵抗地听任自己受到一种魔力的支配,这个魔力正在慢慢地使她变形为植物。现在她变成了一

棵树，一棵巨大的银色的白杨，长了绒毛的叶子正在夏日的微风下摇动。一张温暖的嘴贴在她嘴上；在她的罩衫下，一只手抚摸她的肩膀、乳房；她周围温暖的雾气扩大了；她感到她的骨头和肌肉融化了，她的肉体变成了一块潮湿的、吸水的苔藓，充满了未知的生命……

还有，让我们再抄录如下，这是在《一代风流》里：

他的性欲改变了我。长期以来我没有趣味没有形式，现在重新获得了乳房、肚子、肉体，我像面包一样营养，像土地一样芬芳。简直是奇迹般的，我不再想着计算我的时间或我的快乐；我只知道在我们睡着以前我已经能听到黎明的啁啾了。

由此可以领略波芙娃奔逸豪迈的才情，还有她挖掘和暴露真理时的冷酷与清醒。她——波芙娃最终对创造力的归结仍是自由：“对他人自由的尊重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则，它是我们努力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她在《庇吕斯和西奈阿斯》一文中如是说。

她的确因自由获得了成功，她的小说《一代风流》1954年获“法国龚古尔奖”。波芙娃始终萦怀的“道德的暧昧性”仍贯穿于小说全部。这其中有对关于否定圣洁问题的讨论：一个人如何才能既保持道德、纯洁又仍然希望改变事物？或者，假如一个人不能保持道德纯洁，他的妥协又如何影响他试图改变的事物本身？小说中的描述，没有独特的体验是写不出来

的。比如她写安娜与遥远中的男人可以建立一种性爱联系，而在近旁则不想加入某种无法面对的纠缠和煎熬灵魂的分裂。波芙娃分析了那种性爱的危险性，但它又带有浪漫色彩。因为在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语言中，安娜整个只是肉体的情欲，是依赖和被虏，她什么都不再想，她只想品尝这一刻肉身的全部觉醒、惊颤和那些无爱的激情。纯粹的展开方式，形式感的全部呈现。而把智力留在了巴黎，那个熟稔的生活背影和居所，是工作和劳动之地。

没有感受与经验的真实，就不会有领悟的如此透彻和摹状的力透纸背。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写作中的日子似乎过得格外快。老境将至和已至，波芙娃和萨特依旧在一起恩爱如初地生活。随着冷秋降临，那些除他们之外的情感萦绕是愈发地少了。只有他们相守着，希望天长地久。

五、告别的仪式

再恩爱的人也得最终分开，但那告别的仪式是为了重新在另一世界的聚首。

1980年的4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又是一个惹人愁怨的日子。又是从春到夏的一年中最明亮灿烂的季节，从1929年算起，波芙娃和萨特已经整整相伴五十一年。

这期间，萨特因肺气肿住进医院，在挣扎了一些时日以后与世长辞。那个夜晚，波芙娃与几个朋友一起陪着萨特在病房。凌晨五时，天即将亮了，波芙娃知道，与她厮守终生不结

不谩的萨特最后真的是要与她天各一方了。她要求朋友们出去,她想单独再和萨特一起,她想躺到他的被单下面去。护士阻止她这么做,因为他生有坏疽和褥疮。于是她躺在被单上面,守着他……这是最为疼痛也是最为安详的时刻,他们创造了生死相依的奇迹。



波芙娃回忆既往的一切,她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一点是有无疑的成功,那就是我和萨特的关系。”

她将萨特送归墓地,她在《告别的仪式》的结尾写道:

“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也不能使我们重逢,现实是:我们这么许多年生活得那么和谐,这

已经是相当美好的事情了。”

在此之前她曾多次谈到她与萨特：“三十多年中，只有一个晚上我们是在不和之中入睡的……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从前的选择依然不同，我们的作品也很不相像，但是这些作品在同一土壤中生长。”

她又记起了他们初识的喜悦时光：“他类似我，在他身上我看到自己。和他在一起，我可以永远分享一切。他还给了我另外一件重要的东西：面对未来，我突然再也不是孑然一身了。”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别人不可能有的东西。”

后来这个女人便是在温暖的回忆包融中度过了若干年。这是她孑然一身的时光了。在某一年同样是4月的季节，她离开了这个她创造、生活和相爱的世界。她不相信人死之后可以重逢的超现实主义神话，她只要求在他们活着时的彼此拥有，这一点终于是可以无怨无悔了。

疾病与负轭作为信仰之隐喻

——西蒙娜·薇依(法)

来吧,我的血,来染红苍白的景况
 圣洁辽阔的春天曾使它高贵,
 来染红我曾珍爱的无知觉的黄菖蒲花。
 ——瓦莱里《年轻的命运女神》

现在已经鲜见西蒙娜·薇依(1909—1943)那样的人了。也许不久前故去的德兰修女是她之后的化身?她们是些隐忍克己、放弃一切优渥舒适的物质生活,时时关心别人的人。疾病以及负轭的沉重作为隐喻性前提构成了她们独特的信仰。然而,全都故去。还有后来者吗?听到这种发问,我们个个不寒而栗。我们哪里还有这样的信念与勇气?那可是殉道者的路,由血浇灌,道路两旁才盛开着黄菖蒲花和大蔷薇花。

薇依是只活到三十四岁便死于严重的营养

不良造成的衰竭。而这是因为她拒绝医生因她过度疲劳和身体衰弱而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她严格按照国内敌占区同胞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她以死践行的是她一贯的原则和道德立场：与苦难中的人始终站在一起。这同时构成她探寻真理的标准，她要求自己的是站在全部的严肃事物中，而不要一丝一毫的由日常性智慧而带来的圆融与自我解脱。她不解脱，她给自己造成困厄为的是在这种时候去发现真理。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种对真理的相对性理解了悟得分外透澈的长寿智者，却也有那只求真理的绝对性而命中注定是早夭的烈士。前者不怀疑健全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但后者所秉持的嗜好极端思想和信仰的动机，却为人们另外树立起了严肃的榜样。这个世界已有许多的相对论、虚无主义的东西，人们太能自圆其说，以为这是智慧带给他们在日常事务中解脱的方式和推诿的办法。但是，那绝对主义者，则以尖锐性刺透着庸俗论的帷幕，而让天空因此改变些燥热沉闷而透出清寒爽远的光与风。

美国顶尖批评家、小说家苏珊·桑塔格写过一篇论薇依的文字。这可是一个有着健全世界观、眼光犀利、文字精当的女人。她对薇依所论之准确也的确让人佩服不已。她说时代需要真理，也需要拓深对现实的感受，扩大想象力的疆域。健全是确定的，但也有可能变成妥协、退避、谎言。而那种不健康、受苦，也许更容易产生真理。像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人要学会区分英雄和圣徒之间的差别。她说她想到了

薇依,便想到她一生那狂热的苦行主义,她对快乐和幸福的鄙视,她那高贵而怪诞的政治姿态,她那精心实行的克己,她对痛苦的不懈追求,她说她不排除薇依那种不厌其烦的说教,她在物质上的一团糟,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病。最后她说,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道精神,或希望他的孩子或任何他挚爱的人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热爱严肃以及热爱生命,我们就会受其感动,受其润泽。当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重,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神秘——而神秘正是稳当地把握真理、把握客观真理所要否定的。由这个角度看,则所有的真理都是表现的,而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扭曲的真理,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疯狂、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不健康、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否定生命,正是贡献真理的、是生命理智的、是创造健康的、是增强生命的。

● 我的心已被带到了祭坛的圣物中

1909年2月3日,薇依出生于法国巴黎。她有一个哥哥,年长她三岁。薇依从小孱弱却又美丽。但她注定不是上帝带给人间的礼物,而只能是上帝的女儿。她来的路始自那里,返回的路也在那里延伸。她来到人世短暂的时间,不过是为了履行信仰的使命。

她的出生使父母十分欢喜。邻家称他们兄妹“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美女”。可这个美女渐渐长大,没有一般女孩子的特征,却与生俱来带有一种苦行主义气质。在她不满五岁时,就用冷水洗澡,尽管她冻得全身发抖。岁月悠悠,她出挑得更加出色,容貌清雅,线条细腻。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始终流露出

的幸福感的神情。特别是那双大而黑的杏眼，酷似拜占庭壁画人物的眼睛。她有一头鬈曲的黑发，梳成萨洛美式的发型。然而这些对她从来都不是重要的。

她只关心形而上的事物。在十四岁那年，她就认真想到过死亡问题，她性格中的主要特点已经形成，她是被灵魂的种种事务攫住的人，而对其它东西都视而不见了。她的幸福感不在此岸的安详和谐，而是彼岸的心有所倚。她有灵活的体态，动作却总是笨手笨脚，极不灵活，并且常常显得心不在焉。她为灵魂、精神、信仰这种种的事务而挂虑。

一个人这一生的许多命运写照和决意奔赴的方向，有天生气质决定的原因，也总与他所遇到的人和事相关。薇依一生接触到并信赖的人：阿兰、拉缪、贝兰神父、梯蓬等等，他们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宗教领域的人物，都在充实和发展她精神和道德的严肃性。

1925年10月，薇依进入亨利第四中学高级预备班学习。在这里的教师中，阿兰对她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并且嗣后她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因为这个教师的思想对她原本的精神气质在共鸣以后得到了强化，她身上的斯多葛主义初有萌芽并且愈见强大。

在高师预备班时期，阿兰一开始先要求薇依注意认真书写，因为认真书写意味着要控制激情的发泄。阿兰的哲学中便包涵了抑制激情的道德理性原则。他曾在《定义》中谈到灵魂和身体的问题，不是平行地谈，而是重在谈对身体的拒绝：“灵魂拒绝身体。比如，身体颤抖时拒绝逃逸，身体激奋时拒绝厮打，身体干渴时拒绝喝水，身体欲求时拒绝索取，身体恐惧时拒绝放弃。这些拒绝都是人的行为，整体的拒绝是神圣

的。’阿兰谈到社会时认为 ,如果社会果真是合理的 ,它就是乌托邦式的。在谈到人时 ,他说人要自我实现 ,就应该每时每刻自我舍弃。因为崇高存在于低微之中。薇依就是从这些崇高壮美的话语中汲取了许多的营养。

很小和更年轻的时候 ,人们总是易于被那些灵感性的壮丽的东西所击中。这是带有隐喻性和诗性的东西 ,正如同人刚开始总喜欢斑斓 ,只有到年岁既长 ,他见多识广 ,沧海桑田过后 ,他才可能会趋向于常识 ,往素朴简约处靠。但也不一定是由于年龄 ,而更多是人气质的差异。有的人更多的是求真 ,有的人则始终是向善。薇依是一个向善的人。她当然也求真 ,但她要求的不是客观真理 ,而是另一种更严肃的东西 ,是上帝的箴言。她所要求的真理有时很可能是置普通常识于不顾 ,认为它太平常因而是太平庸了。薇依就是这样严格挑选着自己的友人、导师和生活的座右铭 ,短暂一生不曾更改。

她依照自己的好恶标准选择课程。她有时缺课 ,年底考试 ,她的历史成绩受挫。满分二十 ,她仅得七分。这无疑受阿兰的影响 ,他反复向学生灌输蔑视心理学和历史的的思想。

在高师读书的她更加的面容清丽 ,保持着少女苗条的身材。但这时候她开始抽烟 ,眼睛也开始近视 ,总是戴着宽大的玳瑁架眼镜。她的穿着也开始逐渐男性化 ,她的上衣两边有大大的口袋 ,里面总是装满香烟。此时 ,她更进一步磨砥自己的苦行精神。为了克服她手脚活动不利落的毛病 ,她成为女子田径俱乐部首支女子橄榄球队的成员。她从运动场回来时 ,总是满身的泥水和伤痕。这些过度的运动似乎难以消除折磨着她内心的绝望。她的身体始终虚弱不堪 ,但她却不以为然。她总是超出自己的体力限度进行剧烈运动 ,终于导致

后来她一生所要承受的不幸与灾难。那是1930年寒冬,她结束橄榄球赛归来,头部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剧痛。这就是后来成为她身体内部无法克服的痼疾,折磨她至死。1942年她描写过,这是在她身上存在十二年之久的痛苦,这痛苦似乎位于神经系统中心周围,缠绕着灵魂和身体的结合点,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停止,从未有一秒钟的安静。多年来她就这样,带着这种精疲力尽的感觉生活,她要集中精力进行脑力劳动,几乎丧失希望,几乎就像等待第二天就赴刑场的死囚。

但她短短的一生,在不懈地进行的正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向思维的神秘领域开掘。如果她的头痛稍稍减轻一些,她也许可以写得更多更好。

正值如花似玉的年华,但她的感情领域却只为上帝而敞开,她在继续进行高邈凌虚的形而上思考,而从未允许有男人闯进来。在她十六岁那年在经历过数月青少年所特有的感情焦虑之后,“纯洁”这个概念以及所包涵的意义,已经占据了整个身心。她常常凝视着山间风光,这个概念在她脑中反复出现,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了。她总是致力于去深刻揭示灵魂的力量,身体却在拒绝,在灵魂的日益强大面前愈加渺小,肉体更不会有燥热和煽动。她的感情是一块空地。小伙子们说:“她简直不是个女孩。”因为她身上很少女性特点。她穿着简朴,从不化妆和修饰,也从不接触男子。但有时她也会流露出某种少女的神态。一个夏日,她去郊外采李子,她登上一堵墙,却下不来了。一个年轻男子向她伸出手。她或是想到这举动是羞耻的,或是想到要拒绝这种帮助,她颤抖起来。从这里可以推测,她内心确有激烈的情感冲动,只是从来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罢了。薇依所以为的纯洁,是以禁欲主义为生

命的宗旨，她不能允许有任何不纯洁的思想和行为发生，这其中也包括男欢女爱。她这个年龄，却不会像其它姑娘一样去想男女之事。她认为这种私情是不屑、不足道、不须挂虑的。她将自己献给了上帝，而不是尘世间的某个男子。她将为祖国、为穷苦人而操心，而不会为建立一个个人的小家庭而费神。男人对她敬而远之，她也乐得被人忘掉，她有很多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她花费精力和时间。她也有忧虑，但她这样解释：“若说我有什么忧虑，那它首先来自于命运在我的善感中打下的永远愁伤的烙印，各种最令人高兴、最纯洁的欢乐也只能添加在这种忧愁之上，这忧愁是以精神的高度集中为代价，以我的可鄙的、持续的罪过，以这时代的各种不幸和过去时代的一切不幸作为代价的。”

在根本上说，她对舒适、顺利的生活是心怀敌意的，她避免到自己家里去寻求某种精神上的保护，她相信这对于她从感到厌恶的资产阶级精神中摆脱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她厌恶优渥、雅致，更对幸福抱有强烈的警觉，她是要从幸福的此岸背转身来向受难的彼岸走去的人，她天生应该是个无产阶级的“红色圣女”。但她却不是，她只是在良知上秉持道德的理性原则，而与政党教义无关。她始终没有加入到任何组织里面去，她天生属于基督徒类型，但她始终没有加入教会，这是因为她始终渴望独自一人去发现真理：“我不愿被这样一个地方接纳，堕入口称‘我们’的圈内并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不愿置身随便什么样的人际环境中。”我觉得我必须或注定要独身一人，对任何人际环境来说，我都是局外人，游离在外。”

她在高校学习的岁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这时对她产生了吸引。但她后来则对种种的主义和思想产生着质疑。她

曾深入工人之中,为一所民众大学的铸铁工人从事义务教育。但她对工人的见识有着先验的依赖,她有求于这种见识,需要这种见识,以赋予她内心的愿望以一致性。

她的思想和行动使后来者生出无数的歧义:她那样同情平民,有着天然的无产阶级思想,但她却不信仰共产革命。因为她不相信万众齐呼、集体响应下的话语。她认为爱、信念和智力是三种纯粹属于个人沉思的东西。“谁都知道,只有在三两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贴心话。若是在五人或六人之间,集体的话语就开始占上风。因此,当有人把‘哪里有你们之中的两三人以我的名义聚会在一起,我必在其中’这样的话语用到教会上,那他就把意思完全理解反了。基督不曾说过二百人,或五十人,或十人。他说的是两或三人。”薇依虽然自称自己才智平平,智性庸庸,但她却给才智和天赋以不低定义,并看这个社会对它的尊重与否而确定这社会的性质。她认为才智的境遇是否和谐的试金石在于:“凡是才智处于自身的位置上毫无障碍地发挥作用,尽其全部功能的地方,就有和谐存在。”“才智本身的功能要求得到完全的自由,它包含着否定一切权利,不接受任何统治。凡是才智取得支配权的地方,便有极度的个人主义。凡是才智处于窘迫境地之处,便有一个或几个压迫的团体。”

薇依一点也不迂腐,她思考问题清晰明澈,判断事物入情合理,她只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殉一种道义时,才显出一种令人看来是乖戾的成分而已。

薇依天生的气质里是为他人的劳作,而不幸已融化于自己的血肉中,并想时时尝试劳动者的辛酸。在大学学习的几年,她已经开始同劳动阶层的生活有所接触。假期中,她住在

一位姑妈家中，每天刨土豆达十小时之久。她还帮一位同学的母亲收割庄稼。

在高师，有另一个将名字留在历史上的著名女人叫西蒙娜·波芙娃。她与薇依曾经有过一次接触，也有过一次争论。她见到薇依时，后者正在以果断的口吻讲述新近发生在世界上的事。薇依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革命。革命将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芙娃也以同样专断的口气反驳道，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在于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她以蔑视的神情打量了波芙娃一眼，然后说：“很清楚，您从没有挨过饿。”两人的争论真的很难分出孰是孰非。革命真的解决了人的挨饿问题了吗？但是又可诘问：仅仅为人的生存寻找意义能代替吃饭问题的解决吗？这都是争执不清又最终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原本只在于她们从各自不同的前提出发而已。但后来波芙娃在谈到她时说，薇依有一颗为全世界而跳动的心。她对这颗心充满了仰慕。

薇依的生活已为就近和遥远的正在遭受不幸的人而疼痛。有一天，她和大学同学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她扯了下一位同学的上衣说道：“在中国，儿童正在遭受苦难，你怎么笑得起来？”阿兰也曾经回忆道，春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她一脸沮丧忧郁的样子来了，说：“上海发生了罢工，罢工的工人遭到枪杀。”

在她那里，有一颗异乎平常的灵魂在为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悲剧而哭泣。当然，其他人也有笑的权利，这权利不能因为有人在哭泣而被剥夺。当她说别人你怎么笑得起来时，这道德立场的强制性当然不仅造成对别人的冒犯，也会对别人的权利有所干涉。然而，这不能苛求于她态度的近乎苛刻。她

更敏锐更疼痛地意识到非正义性的严峻事实,和各种苦难的剧烈程度,这一切也不因距离而削弱她对此的感知和关心。她关心的不是遥远的问题,是人类切肤的共有的问题,这是不分国别的。薇依曾经在1928年要求前往列支敦士登公国,要求参加那里的修建工作。而当时的要求是女人只有被叫作“嬷嬷”并且充当厨娘才能去,而她毫无做饭的本领。她恳求人家把她当挖土工来用,但最后遭到拒绝。

1931年10月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先是在勒浦伊中学教书。这时,她开始接触底层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并开始关心工人工会的各种活动。她指责生产中的奖金制度,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某阶段,老板为了激发劳动者的劲头,建立起人为的奖金制度,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社会合作是纯粹的谎言。她认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利益。这基本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观点,但薇依却不是简单照抄硬搬,而是实在地反对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之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她不是要成为一个指点江山的至高至大者,而是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悲悯与仁慈来看待生活中的一切。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更深地意识到不幸者的不幸以及恐惧。她对工人阶级所抱的同情是始于这种仁慈,但不是因为政治立场和党派信仰,她与后者向来格格不入。比如,她对当时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毫无同情之心,是因为它没有使劳动者获得解放,这种由暴力和政治组成的联合体使她感到厌恶。

她与无产者,与那些底层劳苦大众有天然的血脉相连。皮埃尔·阿尔诺说:“在她身上可感到一种同用双手谋生的人往来而产生的内心愉快。”她认识当时她那个环境里学习小组

的所有工人,其中包括爱斗殴的搬运工。矿工们谈到薇依时都充满深情。当然,他们并没有把她当成他们的同伴,但大家把她看成一个会带来好运的吉祥的人。

1932年她开始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合作,她在这上面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对劳动者处境的看法和同情。

又同过去一样,她又要身体力行于矿工们所从事的劳动了。经过多次请求,她从一个附近经营小矿的业主那里获准下矿井。她使用风镐,风镐震得她胸和头剧烈疼痛,但她觉得自己已同它牢牢挂靠在一起,还有,全世界的矿工都同她在一起。下过矿井的人都会有深入到无产者心脏的感觉。一切是那么艰辛,每个动作都是一种苦难。她体尝了一切,领会了工人的实际境遇,于是她在所写的文章中发出告诫:“对于矿工来说,剥夺公司的产业,自己变成矿山的主人,这是不够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只有通过技术革命来延伸才会变成现实。而技术革命将在矿井和工厂里重新恢复起劳动者对劳动条件的主宰。”

这是一番透彻的甚得要领的见解。矿工们仅仅在形式上获得解放和自由有什么用?他们恶劣的生产环境需要改善,而技术革命必须先行展开。这个人因发表这番见解而愈见出其青春年华的美丽动人。

她继续在勒浦伊女子中学当哲学教师。她的讲课只是为了培养学生而不只是传授知识。她的学生们始终感到惊讶,她没有采用其它任何手段而只是思考本身,却能吸引住她们的注意力。她的正直精神,她的纯洁、艰苦而清贫的光芒,那所有人格的力量,都在深深吸引着她们。

但教课之余,她总是关心勒浦伊市普通工人的生活。无

产者的贫穷总是吸引着她。整个冬季,她的卧室冰冻着,因为她身无分文,她把自己的大部分薪俸分给了失业者。她付给打扫房间的清洁女佣每小时五法郎,而那时的行情是二法郎。她同昂代里乌小姐合住的套间,房间总是开着大门,以便工人们能前来吃饭。有一天,这两位小姐不得不去巴尔丁夫人家里吃饭,因为她们自己的食品柜已经被工人们全部吃空了。

● 信仰与重负

薇依的假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她渴望在那里更清楚地了解德国共产党。

她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完全听凭她内心仁慈公正使命的指派。应该再一次指出,这一切与她的党派立场无关,而且她从来也没有过这种党派立场。她甚至看到一种新宗教的产生,对工人们所要争取的切身利益的初衷绝对相违背。她始终不满俄国的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宣传“通过会议的组织,惯用套话,习惯的举动,越来越像宗教宣传,好像革命会变成神话,而这种神话又似乎也像其它神话一样只是以承受无法容忍的境遇为结果。”

她不是在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以心的同情和灵魂的受苦感知,因感知她清醒,清醒地去追究,是谁在帮助工人脱离着无法容忍的境遇,而工人如何重又陷入这种境遇。她不会信奉一切神话,而只会反对它。

薇依又到了欧塞尔担任女中的哲学课。她的课是那种缓慢的扎实的哲理启蒙,要求师生双方都具有耐心。一开始成效并不显著,只有到第三个学期学生们才能感觉到在自身有

某种东西被开启,并告诉她们已经学到许多新东西。然而,要应付毕业会考,她对教科书的轻视在这一点上成为薄弱点。她有悖常规的教学被学校当局认为不合情理,但学生们是那样的喜欢她。但她担任的哲学课被取消,她又调走。

薇依依旧在她的理想和信仰中生活,她的性格促使她要过一种艰苦的生活,过一种节衣缩食、清贫俭朴的生活。一次,她的母亲到欧塞尔陪女儿,她将女儿的房间布置得舒舒服服,薇依在她的母亲返回巴黎后随即把地毯卷起,撤走了她不喜欢的所有家具。她对自己的衣着也是从不修饰,人们看到她总是经常反穿着一件羊毛套衫。她要实际接触并体察百姓的疾苦,她对他们怀着的完全不是伪装的同情心。在“革命”这个概念中,她加入了两个因素:为了理智地干革命,必须懂得问题的实质;为了理解劳工问题的实质,本人必须参加劳动。她知道,她同实际工作和劳动的偶尔接触从根本上来说缺乏严肃性,但这一点对她是绝对必要的。她的介入有好奇和怜悯的双重成分,知识分子与平民的交往肯定会产生令人困惑的后果,但她却必须这样做。

她仍然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做分析、写文章。她所表达的有激情也有理性。比如,她在一篇文章中讲道,在一切重要问题中,工人运动已整个地被幻想和谎言所支配。当我们不把列宁曾不断提醒的伟大原则付诸实践,即:真实情况,不管是怎样的真实情况,对工人运动来说总是有益的,而谬误、幻想和谎言总是有害的,如果这样我们就完了。

薇依在写那些措辞激烈而又清晰准确的政论性文章时,犹如过去的女革命家卢森堡(1871~1919,她曾参加1918年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年起义中被捕遭杀害。)但薇依志

不在政治运动上,她只是为穷苦的人们寻找出路,寻找克服经济危机和政治奴役的办法。她具有慷慨的灵感和学说的力量,并具有足够的革命的坚定性。她在境遇上与感情上倾向于革命,但正如她遭到别人攻讦的,她实际上已对工人运动实践的不幸经验感到失望。她更多的是具有在无政府主义激情之下重新翻新的自由主义,她的视野宽阔的论文使当时具有左倾思想的人们哗然。

● 只要有山、风、太阳、月亮 就不会是完全不幸的

她热情澎湃地投身于革命,并预料到自己有朝一日可能遭到逮捕、拷打等酷刑。为了防备这日后的危险,为了锻炼自己,她愿意承受痛苦。有一天她对她的同事巴特说:“你把别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好吗?”这种防备性的体验痛苦令同事反感,他回答说:“我该抽你耳光!”

她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有一种人格的美和感染力,有一天曾有一位朋友唱起这样的歌:

“ 我将永远地想起
西蒙娜
我亲爱的法国女人…… ”

但薇依讨厌这种亲昵,她突然起身,逐个地看了她朋友们一眼,扬长而去。当她看到有人恋上她时就会有这种古怪的恐惧。她只会自发地流露出最纯洁的人类之爱,而没有任何的男女之爱占据心头。直到她逝世,她没有同哪个男人谈过

恋爱。她为现在而存在，而伸向未来的日子的链条是为热爱他们的人而满足地活着，这足够了。她已经二十五岁了，谈婚论嫁却不是她的考虑，她的神经中好像没有这根弦。她抛弃着生活中所有令人沉溺的东西，孤独一人行走于途中，前方没有曙色，只有天空中的几颗星星，点缀着寂寥的开阔的天空。

她为自己制定更大的工作量。她要再一次深入工厂、矿山腹地去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1934年12月，薇依进入阿尔斯通公司当一名非技术工人。

她在设想自己未来的整个生活，决心坚定地、持续地把生活变成更重要的事物，并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劳动，循着既定的方向把它从一端引向另一端。

她也明白她这样选择所可能面临的双重危险。首先，一个人的活力、意志、工作能力在极其艰辛的生活必需压力之下会遭粉碎；再则，一旦健康不佳，身体的痛苦会使这种生活变得完全空虚，只有日复一日地完成沉重的工作来度日。

她得在阿尔斯通呆上四个月。她的身体事实证明并不适应有强度的工作。

这一天，星期二，她只劳动三小时，一小时钻孔，一小时同雅各在压机上，下午转动手柄做纸箱。但是，从一开始她就眼痛、头痛、疲劳、受戏弄、遭训斥。最初几个星期，她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记下自己的经历，这表明她好像做某种游戏一般的在从事这项工作。她并未忘记自己是一名获得大学、中学教师资格的老师“在工人阶层中闲逛”，她不可能像生来注定过那种日子那样投入到这种奇特的生活中去，就像它将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就像这种日子是由某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强制于她而不是出于她的自愿选择。

一天,她被派到炉边干活。这工作远远超过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她感到精疲力竭,头痛、烫人的高温使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有一时刻,她甚至无法放下炉子的挡板。要冶炼的零件很快要丢失,一名冷却工人奔来帮她忙。“在这种时刻,多么令人感激!”她在本子上写道。

渐渐地,她身体疲累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不再思索的念头总萦绕在她脑子里,这是惟一的仅有的免受极度痛苦的方法。因为不可能怀着恼怒干自己的活儿,而思索里只剩下了恼怒,这样会降低效益。只有在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她又重新成为她自己,她又重新恢复思考的功能。但整个日子的进程标明她同自己的过去仍保持着那种关系很快被劳累和单调的劳动所引起的乏味切断。同她出身的那个阶层的任何接触不久就使现时变得更加难熬。例如,在父母那里吃饭是一种格外的难受,那温馨的环境和可口的菜肴与她正经历的生活形成太大反差。有时,她感到肌肉用劲的某种快活,有时她在劳动中会哭起来。逐渐地,她看到所经历的现实与她从前所想象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到了第四周,因圣诞节假和新年假而停工。仅有的几天休息,她却着了凉,发起烧来,头痛得要命。节假日后,她又得重新干活。但她仍病着,尤其是累得支持不住。

不可能放弃思考,她不由得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工人灵魂的拯救首先依赖于他的体格?”她拿不准了。在如此酷劣的劳动条件下,她不明白那些身体并不强壮的人怎能避免落入某种形式的绝望中去,比如酗酒、流浪、昏头昏脑地犯罪和堕落。因为薇依已经发觉如此下去自己的绝望无可避免,并且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不可能的。她后来写道:“甚至对这种处

境的意识也已丧失。承受着,这就是一切。任何唤醒思考都是痛苦。”可是,工人友爱的感情,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的愤怒,这一切依然在,仍没有变质,心灵最后的这块阵地旷日持久地能抵御到何种程度呢?

尽管她头痛难忍,吃很少的饭,并且睡得很差,工厂的噪音在造成身体上痛苦的同时却又奇妙地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快活。这是为什么?这种痛苦和快活不久就成为她有关社会思想的两个极点。

她干起活来比一名正常的工人要艰辛得多。她的动作总是显得迟钝,头痛总使她每天的起床像进地狱那样。她活儿做得不好,有一天她筛选自己制造的零件时,发现许多是次品。她尽可能地把它们丢了,可是又担心起来,因为她在单据上写的是一万个,实际上它们已经差了很多,这是开了“虚票”。

薇依的思想却依旧是活跃,她无法摆脱天生的思考癖。她记下大量感受,也留下大量矛盾,她摆脱不了抽象的世界,而眼下现实的世界却硬要拉她摆脱那个世界。从前,她正是游刃有余地在这个抽象的世界活动,在学校拿工资也是为了进行思考。而在工厂做工,再也不是关心逻辑连贯的时候。这里给钱是为了人不去思考。有一天,她突然闲了下来。闲下来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好。她趁着阳光明媚,凉风习习,前往比多。这时有一种甘甜的感觉。她又可以用这段时间对工厂的劳动作一番思考了。她提出机器对于工人是一种秘密,生产制造也是秘密,工人不明白每个零件的用途,以后这个零件又是怎样同其它零件组合起来。还有,工人缺乏安全措施

……

当她在阿尔斯通公司的工作一俟结束,1935年4月,她又到了莫特冶金工厂。她的工房是一间很小很脏的地方,对她的要求是每小时制作八百个零件,可她拼了命只能做四百个。这一期间,她经历了由于过度疲劳而想自杀的诱惑,头痛引起的糟糕的衰竭,更加重了这种情况。后来,她又进了雷诺工厂。她体验着作一个普通工人所承受的奴役。她已经几乎忘记了自己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而受奴役使她完全丧失了应该拥有的一些权利的感觉。

她当工人的感受将成为她以后思考工人出路和辨析对工人进行拯救言论之真伪的前提。她从1934年底到1935年,一年的工厂经验几乎把她压垮。她说这段时间,每天起身怀着不安,带着恐惧去工厂,就像奴隶一样干活,时间是不可容忍的重负。有一天她惶惶自问:一旦生活偶然造成这样的生活要我承受,并且也没有每周的休假,我会变成怎样?这样足以将人变成驯服的牲口。但是她却发誓,在尚未学会在保持做人的尊严感情不受伤害来体验工人的生活条件之前,我就不脱离工人的处境。她恪守住了自己的这个诺言。但那长久的、潜在的受屈辱境地的体验,则使她对生活和事物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她过去心灵在某种时候还会体会到的轻松的感觉是再也感受不到了。

这一切必然在之后深化她的思想认识。她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不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屈辱上。希特勒明白这一点,他许诺工人的并不是减轻劳动强度和艰辛程度,而是自豪所产生的快活,因为这样它会带来力量。薇依接着还讲了自己另外的一些看法:不管压迫可能多么严酷,它并不会引起反抗,而是造成屈从。

她越了解工人的处境,所获得的是越多的令人沮丧的信念,因而在后来,她避免去鼓动反抗,这并非为现存制度考虑而是鉴于受压迫者的切身利益。因为她深知,当工人们仍处在过分严峻的必然性的锁链下时,若起来反抗,事后必然屈膝,而新的处境将会比以前更糟。她后来也在一系列的文章中研讨了劳动与革命的关系。她说,劳动本身所导致的体力的高度消耗,精神上的死气沉沉,只能使劳动者用放荡的生活得以解脱。希望发生革命是同一性质的逃避手段,是取得弥补的神话,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从工人集体力量中寻求现实的替代物,这是劳动者一起翻身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以此希望他们减轻生存条件的苦难。革命的理想作为对社会非正义的一种反抗,这是好的,作为反抗不幸——它是工人生存条件本身最本质的东西——则是可疑的。

同不幸的种种接触已毁了她的青年时期。她已心力交瘁。薇依说在工厂经历之前,她并没有真正体验过不幸。如果说自身曾有过不幸,这种不幸既然是自己的,她就觉得无足轻重;再说,这也只能算部分不幸,因为这是生物意义上的而不是社会角度上所说的不幸。但这次她身处工人群众之中时,他人的苦难已实实在在楔进她的肉体 and 灵魂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与之分开。这时,已忘却过去,并且无法再期望未来,而只能艰难地设想经历这些劳累而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后来她写道:在工厂所经历的一切在我身上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以至于今天,如果有人——不论是谁,也不论在什么场合,不以粗暴的态度同我说话,我就会情不自禁地以为又准是自己错了。工厂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奴役的永久性烙印,正像古罗马人在最卑贱的奴隶额头上用烧红的烙铁打上的烙印一

样。从那时起,我一直把自己视为奴隶。

薇依可以说是身心均已碎裂,在这种情况下,她独自一人到了葡萄牙的一个小渔村。那里贫困极了。那天正是主保瞻礼日,她独自一人到了海滨,夜空中一轮明月升起,那些渔夫的妻子儿女们手持烛火围绕着渔船列队举行宗教仪式,一边唱着古老的感恩歌,曲调悲凉得让人怆然泪下。她从未听过如此揪心的歌。这时她确信,基督教是奴隶们最好的宗教,奴隶不可能不信基督教,而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 心中圣恩的降临是静悄悄的、无人知晓的

薇依虽然认为自己的不幸纯属生理性的因而可以说是不足挂齿的,但头痛剧烈,让她忍受不了,这不幸的折磨又是那样实在。她去看过许多神经科医生,她确信自己脑子里有脓肿,并感到智力在缓慢衰退,但医生总是未能找到病因。后来她去作弥撒,当她来到一所教堂,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某种身不由己的东西迫使自己跪倒在地。钟声和神父的布道声连同她极剧的头疼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她的痛苦,但是,她竭力使自己更加聚精会神。她终于使自己从可悲的肉体中解脱出来,让肉体独自蹲在角落受苦,她终于在歌声和颂词的难以忘怀的美中找到纯粹的、完美的快乐。

而且就在这次弥撒活动中,她遇见一个信天主教的英国青年。在他身上她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圣事的超自然的品性。在接受洗礼之后,他身上似乎散发着真正天使般的光芒。

现在,薇依开始寻找通达上帝的路阶。她越来越发现不幸总是与爱连在一起,而爱构成了她信仰的基础,这又是由疾

病和重重的不幸隐喻般开始的。“通过苦难,存在着一种爱,它类似从亲爱的人的笑容中看到的那种爱。”

每当她头痛发作时,就集中全部注意力背诵《爱》这首诗:

“爱神欢迎我到来,但我的灵魂在退却,
感到他的尘埃和罪孽。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开始时就松缓,
细心的爱神
朝我走来,亲切地问我,
是否需要什么。”

把自己全部融于诗的温情中,不知不觉,背诵有了祷告的品性。在背诵过程中,基督本人降临并牢牢抓住了她。她个人的伦理与福音书相一致。这是1938年,从此,一位不愿祷告、不愿入教却又是真真切切的一名基督徒出现了。

她已经开始每天情不自禁地背诵经文,这背诵的功效简直是异乎寻常。有时,头几句经文就使她的思想脱离肉体飘逸而去,将它带到空间以外的某个地方,从那里望去,一片冥茫。空间敞开了。感官的普通的空间无限性由第二等,有时是第三等级的无限性所替代。与此同时,在这种无限的无限性之间是一片寂静,这种寂静并非无声,而是积极感觉的对象,它比声音的感觉更为积极。如果说有什么响声,它只有穿越了这种寂静之后才传到她那里。

有时,她背诵经文或者干别的什么,基督亲自显身,他的显身比他首次降临到她身上更为实在,更加扣人心弦,更清晰,更充满爱。

但是她却拒绝入教,她说:“上帝不要我入教。”她说不仅现在,就是将来上帝的意志也是要她不入教,除了在垂亡之时也许有这种可能。然而,她却时刻准备听从一切命令,会愉快地前往地狱深处,并且永久地留在那里。薇依毫不贬低别的人入教,因为在迄今为止有记载的历史中,在整个人世间,从不曾出现过像今天这样人们的灵魂遭遇到如此危险的时代。有必要重新树起青铜蛇,使那些朝它看一眼的人得到拯救。

但是她却不能入教,但她却要通过努力,成为基督精神的志同道合者。不是历经自贬、受辱和萎靡不振的途径向他走去,而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在纯净和永远的甜蜜中向他走去。但是她却不入教,她不愿加入到任何组织和宗派中,这是她的一贯立场:“有几只羊羔,始终呆在羊群之外是件好事。”

但基督之爱,则是她永远不会放弃的。

已进入20世纪40年代,整个欧洲仍处在悲惨境地,希特勒的魔爪越伸越长,灾祸已全面展开。薇依已逐渐放弃和平主义立场,全力投入反德国法西斯的运动中。

她仍是头痛,经过治疗,头痛程度略有缓解,但是直到她去世仍不时头痛。这种痛苦既是身体上的又是精神上的,对于她来说,这种痛苦具有后来赋予她“不幸”这一概念的全部深刻含意。

仍在头痛,但她又必须使用大脑。这是智性、意志与身体的全面较量。1940至1942年,这是薇依紧张思辨的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她的内心更紧地贴向了上帝。1941年,她同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尊敬的贝兰神父取得了联系。这位几乎双目失明的人,是一位她称之为“上帝之友”的人。他慈祥,具有天生巨大的魅力。他热忱照顾所有处在困境中的人,尤其

是那些盟军的失败使他们可能遭致政治迫害的人。薇依有许多的精神自传体著作就是在和他的通信中形成并保留下来的。

薇依同贝兰神父初次见面,就向神父提出她想去农村劳动,就像她曾在工厂干的那样,而这并不是一种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深刻的意愿。薇依仍然忘不了受苦人,她对苦难有一种狂迷般的热爱。当然,她不希望将苦难定型化,仅仅让她为体验而存在,她绝没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自私。但是这世界还没有消弭苦难的时候,她就时时准备去品尝它。她说:“如果说人的天职是通过苦难达到快活,那么他们比其他人更利于以最现实的方式实现这一点。”

神父找人帮忙联系,她前往圣·马塞尔的一家农场。她不希望特殊,而是希望时间的安排,思想的劳累、必须完成的任务等等,对于她就像对任何人那样。

她计划在农场干上一年,她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去经历那些毫无特权的人一辈子都要承受的负重。她要做的就是像某个受过苦的人,并正在遭受同一种苦难的人那样。她的朋友来信指责她不顾身体状况,把她精神的极佳工具置于危险之中的做法。在她看来,与其使自己的智性受磨难也不愿在追求真理中受阻达不到目的。“我也预料到自己的智力会由于疲劳而衰退,然而,我把体力劳动看成为纯净化——一种苦难和受屈辱性质的纯净。从中,在深处,会得到片刻的深深的快活……”她甚至对自己所谓的智性之特权也提出质疑:“我为何要对自己的这部分智力如此重视?无论谁,绝对地说无论谁,用鞭子和镣铐……或是用纸写上几句话,就可剥夺我这种智力。若这部分智力就是我的全部智力,那么就是某种

价值几乎等于零的东西,那么为何要对我手下留情?”

她来农村绝不是采集文学性灵感的,虽然她知道自己依赖于农业劳动会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回报,比如会得到那些大地横亘、旭日东升、炊烟袅袅等等这些自然景物的审美感知,但她要求自己不要像当时擅长描写乡村题材的法国作家纪奥诺那样只是去作文学随想。因为素朴无欺的大地只把自己交给那些与此相称的人,交给把自己的生命赋予它的人。

薇依刚到农场时,就与主人关于住宿问题发生了争执。她觉得住房过于舒适,执意要露天过夜。主人恼火了,经过长时间争执,她终于退让。次日,找到一个妥协方案:主人的父母家在罗纳河畔有一座几成废墟的破房子,就把她安置在那里。这对大家都有些麻烦,本来事情会简单得多。薇依每天下地干活,虽然仍是笨手笨脚,但干得十分认真。经过锻炼她终于克服了笨拙。她同主人家同桌进餐,但她拒绝接受城里人缺乏的食品,要她吃一只鸡蛋不是一件易事。有时,她仅仅吃一些沿路采摘的桑葚充饥。她极严格遵守粮食配给制,即使是对亲友的仁慈,她也不愿在黑市上买什么食品。村里的一个面包师曾给她一点不要票证的面包,这件事竟会激起她的愤怒。她当时并不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却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她将意识形态和秩序制度分开。

后来她又到了一家葡萄种植场,与一群收割葡萄的人一起干活。她顽强地坚持劳动,绝不愿意比她周围强壮的农民少干活。但她深深知道,若无推动力,过分的劳作就像死亡一样。“我曾自问,我是否已死?入了地狱自己尚不知晓,地狱里是否不终年收葡萄?”雇主看她的确干得出色,就告诉她说她可以嫁给庄稼人。一个种植者是不会轻易对一名来自城里

的姑娘说这番话的,这说明他瞧得起她。她意识到,那拥有自然和土地的人,自然和土地才会通过每日累断筋骨的辛苦融入他们的身体。日、月、季以及在我们身边不停转换的天穹是属于从日出到日落,艰辛地受苦受累,跨越着时空的人们。他们伴随着天上星星的运转,他们经历着每日却并不对每日存有幻想。

为什么在农村播种者和牧师是司空见惯的形象?这是因为,农夫的血和肉通过小麦和葡萄传出去。面包和酒,是农夫劳动的果实。小麦和葡萄最后成了基督的肉和血。那么农夫的整个一生便是一种祈祷。

头痛,工厂和农村与底层人一样的劳作,深入到苦难的腹地,这使薇依对“不幸”这一概念再一次有了具体入微的理解和阐释,这同时也成为她思想运动的一个很好的进入形式。

不幸,绝妙的词。它不等同于苦难,它占据整个灵魂并给灵魂深处打上受奴役的标志。当然,它包括肉体痛苦,但又不能同肉体痛苦混为一谈。除非这是长时间的、经常性的肉体痛苦。“只有当抓住生命并把它连根拔起的那种事情直接或间接地打击到它社会的、心理的、身体的各方面时,才谈得上真正的不幸。”不幸是无限的。”它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落。不幸犹如烧红的烙铁,给不幸者打上蔑视、厌恶和自我唾弃的烙印,迫使不幸者像一条被半碾死的虫在地下徒然挣扎。不幸的主要后果是使上帝在一段时间中不在场,比死更虚空。

怎样战胜不幸,使不幸一点一点向灵魂灌注的惰性毒剂失效?只有爱。不幸是天生的赎罪,它既是自然领域的圣事,又是超自然领域的拯救。而且,“爱他人是内心热爱上帝的首

要形式”，也是上帝降临于人的爱。上帝急于降临于不幸者，当某个灵魂表示出这意愿，上帝急忙前往并通过它聆听和观看不幸者。“凡是不幸者被爱之处，上帝皆在”。

薇依以仁慈这种世界观，在社会政治观点中播布着人文主义理想，并向宗教信义走去。她从未在形式上加入过教会，但她却真正是上帝的女儿，因为她对他人有着充盈的、不竭的爱。

● 这目光如此犀利和纯洁， 她似乎在凝视内心的深渊

薇依正值美丽的年华，即使到她逝世那一年，她也只有34岁，还不应该见到任何生命衰老的迹象。但是，她却是对任何人间事不管不顾。她总是身着棕色粗呢的服装，光脚穿着硬鞋。她对肉体的一切丝毫不在意，她更像一个斯多噶主义的信徒，一个中世纪的圣人。她觉得她的天职便是深入到不幸者那里，为他们服务，而别的，她都没什么操心的必要了。她继续写作，写作政论文章和论述信义与爱的文章，还有就是到修道院，或与贝兰神父等人讨论哲学见解和信仰问题。她是在急剧头痛中写作，那文字却有一种金属般敲击的美，并且洋溢着清晰明澈的光芒。她只是如此活着：“我是一片枯叶的色彩，就同一些虫子一样。”

1942年，她决定随父母去美国。促使她离去的原因，不是身为犹太人会遭受的危险所致，也不是战争的危险，而是因为她认为在这场撕裂着整个世界的战争中她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她想经美国、英国前往敌占区，到那里会有同她的自我牺

牲精神相称的任务给她，同那些不幸者在一起她会感到更融洽。她随许多难民在卡桑布兰卡的一个营地度过。她整个忙写着东西，整日独占着供几乎是上百人使用的几把椅子中的某一把。她的父母轮流接班为她占椅子，以防别人占去她这把椅子。这期间她写的文章总标题为“基督教前期的奥义传授”。

动身前往纽约。她甫一抵达便与法兰西部队取得联系。但就在她即将投入工作的时候，头痛却又一次猛烈发作。她躺在地下的睡袋里，不能吃饭，有时达数日之久，处于虚脱状态。当有人问起她的头痛病时，她说：“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上帝没有裁好的造物。”这成了她专有的常用套语。

她渴望加入到危险的行列，她想实施她的两个打算：到前线当女护士并组成火线女护士处，再就是担负敌占区和战斗区的联络工作。她非常想获得一项在敌占区不要求专门技术知识的任务，它最好是具有高度有效性，并且是艰难和危险性的任务。她对友人说：

“鉴于我的精神构成，艰难与危险是必然的事。很幸运，并非人人如此，不然，任何有组织的行动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无法改变这种精神构成，我从长期经验中得知这一点。尘世间的幸灾萦绕在我脑中，重压着我，以至使我失去自己的官能，而我只有自己经受巨大的危险和痛苦才能恢复它们，并从这种萦绕着我的念头中解脱出来……”

我恳求您，如果您能办到的话，给予我许多的苦难和必要的危险，使我不被忧伤彻底耗尽精力。我

无法在现在的处境中生活,这使我近于绝望。”

薇依又将启程,从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她仍是奔着那两个目标而来。但是内务部特派员无法同意她的这两项要求,而是根据她善于思辨的特点,让她对抵抗运动的文件进行研究整理,为战后做准备。

虽然并非她愿,可是工作里面所包含的问题很快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除了白天上班,晚上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写、不停的写中度过。已经是1943年1月,天气寒冷,可她的房间里还没有生炉子。薇依不让。她也不要任何食品。她不知道是怎么熬着过的。房东太太恳求她休息一会儿并吃点东西,她不接受,也不愿接受。她的祖国和人民在受饥饿折磨,她怎么能吃东西呢?但是她喝黑咖啡。

薇依在发奋地工作,床上、地板上、椅子上到处是纸,是她的手稿。她的思想已臻于成熟,只要写下便是上乘文字。这是在战争的考验下和她个人的祈祷中成熟的。她从来没有涉及过如此多的不同主题,并且是那么的有把握。这个阶段虽不很久,再过几个月她就逝世了,可她的作品在这时则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期间她仍是一直要求回法国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要求派她去执行独立行动。但这等于要她无益地默默无闻地送死。牺牲她无助于战略上的需要,却只会无为地造成英雄主义的可怕后果。朋友们要她认识到她现在做的平常工作并不是毫无意义,而是意义重大,但她总是对自己没有成果的行为难以接受。每次她感到遭致挫折又会使得头痛欲裂,迫使她一两天无法上班。一旦休复,她则加倍地努力干活。她思考

人在制度中的位置,政党的三个特点,何谓思想正义、思想独立和产业权问题。她会对世界背转身来,面朝上帝走去;但她又会回转身来,怀着热忱关注现世,并且具有参与意识和付诸行动。薇依出世和入世的表征都那么鲜明耀目,这是很难糅合的两极,但被她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她本质上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上帝的女儿,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和烈士。因此,她从不计较参与行动可能给自己带来牺牲这一后果,反而,她觉得必须拿出自己的生命做些什么她才会死而无憾。她根本没有想到颐养天年,想到像别的女子那样有对美服佳肴的种种要求。这种要求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过分奢侈,也不会觉得不合情理,女人如花似玉一般地点缀起这个世界的希望和明丽,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而薇依却无法做这种女人。她天生是为这个世界的受苦和牺牲而来,她对女性在世没有任何物质性要求,她甚至遗忘了自己是个女性这一生理事实。她很怕单独与男性接触,她害怕有男人爱她,每当遇到这种事情,她会发自内心的愠怒。当然,这种事情在她身上绝不可能轻易或频繁发生。她充满了爱,而那一生的爱如此博大,是献给受苦人的,是悲悯仁慈的博大,而拒绝哪怕是一点点的男欢女爱。她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来到这个世界的,她的出世和存在真的仿佛奇迹,千年未遇。卢森堡也是一个奇女子,是个革命家,但她一生的恋爱事实却是不争的。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并不能排斥她对异性热爱的情感,或者,这更可能使她有信心,有力量投入到她的事业中。而薇依则不,她只是上帝的女儿。

战争仍在继续。薇依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所

关注并了如指掌。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十划十字的女信徒,只在低声的喃喃祷告中诉说个人不幸和个人无以排遣忧烦的人。她的个人不幸已被压到最低限度,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用来考验自己的试金石。她个人又有什么忧烦呢?女人的忧烦莫过于在感情上与男人纠缠不清的历史命运,而薇依没有这些丝丝缕缕的念头。去不了前线,她在后方仍从事研究和撰述工作。她研究欧洲问题,也研究亚洲问题和殖民问题。她分析欧洲士气衰落的原因及拯救的方法,研究起义解放领土的问题。她在《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新宪法草案》、《新宪法基本思想》、《责任和制裁》以及其它文章中详述她的政治观点。薇依的政论文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迂腐,而是充满了清醒、机智和犀利,判断事物入木三分,其能力令人啧啧称道。她这个人让人看起来可能是迂腐的、不通庶务的,这是因为她为了体察很多,也为了她的价值观有意给自己过不去,但她写作起来,可是耳聪目明。

薇依的思想在绵延而深入地展开着,她甚至已具体到在设想一种合理的政体时,提出以法官权力为基础。她把法官看成是作为上帝赋予权力的受委托者,他们将以神圣特权为其履行的公职。她谈到惩罚的双重性,暴君施虐不是人的部分而是非人的部分。并且薇依已清醒到她只能是代不幸者思考不幸,因为不幸者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命运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思想讨厌去思考不幸,正像有生命的肉体不愿去想死一样”。她研究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他们都有一种善。只是在马克思看来,借助于下层社会相继取得政权的那种活动,处于社会最低下的阶层将会上升到社会上层的一天将会来临。那时,阶级的区分将消失,正义的光芒普照世界。然而薇

依认为,弱者可以有力量,尽管依然是弱者,这是基督教的悖论。以为超自然的力量是弱者,而超自然的弱者就是力量,这被认为是可以的,但这力量并不寓于大众中,而是在某种灵魂中,而大众的灵魂却因了不幸而麻木。薇依是眼睁睁看到这些的,矿山、农村的种种实际图景,使她不相信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绘制的蓝图。因此她认为马克思的看法是一种正确的直觉,但于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有距离。薇依不是一个革命家,因为她全部的思想基础建立在以爱为信仰而不是以摧毁为信仰之上。她无法属于革命阶级,但她对无产者有天然的亲和性,这以良知为本。当初她对革命、反抗、暴力,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怀有兴趣,是因为她认为这学说对受苦人有益。她始终按自己的思想方式去思想、去言说。

薇依自己又能为不幸和受苦者找到最终的拯救和出路吗?她曾寄希望于信念。当然这信念也含有神秘主义的直觉与体味,但是她已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思考范围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撕裂肉体,那是纯净的光链

薇依在这一段从事战事研究的工作中,写下了奠定她思想基础和语言成就的文字。但是,她却仍然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她仍然要求回到法国效力,希望被派往那里从事间谍或破坏活动。这当然只是一种幻想。同她所批评别人的一样是一种直觉的幻想。她甚至想好一旦被捕她将严守秘密,事先准备好假口供,在她的尊严垮下去之时,让人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是假供,她的目的是死而不是提供线索,因此在她受审讯时,

死亡将先于真实口供；……由于我体弱，这会相当快地降临于我。用不了多久虐待就足以使我的思想成为一片空白。”她意识到自己的体质天生虚弱，她说：“对于我来说，在彻底献身和背叛之间并无中间阶段。”

是的，她的生命已别无其它意义，除了期待真理并为之献身。

在薇依，她把当下的战争和她所从事的“圣事”联系了起来：“尘世之外，有一种现实，除了注意力和爱，人的一切官能都把握不住它。”这后一种信仰更深地支持着她，比前一种主义的信仰更坚定、明晰和有力量。她逗留在伦敦，心却向往着巴黎。她为不浪费时间而给自己规定着严格的实际生活守则：不出门，睡在地上或桌上，睡眠不超过四至五小时。

紧张的工作之余，她会吟诵英国诗人弗·汤普生《雏菊》中的一段诗：

无始亦无终
那是用吟呻买不到的；
因为我们生在他人痛苦中，
而死在自己痛苦中。

她想回法国去，而人们阻止了她，认为她这种想法其真实性是在于与法国受苦难的人们呆在一起，而这已不是为之服务。在她孤独的工作中，她觉得是在偷窃自由的法兰西的钱财，她拒领该领的薪金，她不愿吃完别人为她提供的食品，她也不吃饭后的苹果，因为“法国儿童吃不上苹果”。

在她心灵深处，她注重道德义务的绝对性，而不管这些义

务是什么样的。她说：‘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欺骗行为是永不可能的……鉴于当今世界人类总的持久的处境，也许吃饱始终是一种欺骗行为。’剥夺自身最必需的东西对于她已成为一种严格的社会义务，在这方面正如同在其它一切方面显示出她的仁慈和胸怀，她必须同那些受苦的人们一起受苦。

1943年5月的春天，伦敦的城里，战争无法阻止大自然盎然的生机，果树迷濛，到处开着白盈盈和粉嘟嘟的花，时有霏霏细雨，玫瑰花也提前开放了。战争的一切残酷被暂时遗弃在姹紫嫣红的季节里。可这时的薇依，则无法领略这一切，她只能是无奈地躺在病床上，去仰望那深邃的、异国蔚蓝色的天空了。

她患了结核，病情很严重，但仍有治愈的希望，这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和长期营养不良引起的。必须配合医生接受连续的治疗。但她却拒绝作气胸，她不愿医生照管，对医生出于治疗需要再三劝说她勃然大怒。她不同意医院要她接受额外的伙食补助，作为结核病人她是有权利获得这补助的。

主治医生为她作体检时发现她不完全是结核病的病症。她四肢发僵，而且不愿使用四肢，劝她吃东西，她说她试试，但她却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水和茶。她为不进食找的理由是：当她想到法国人在法国挨饿时，她就不能吃东西。在医院，不是病状以及治疗的争执，而尽是关于饮食的争执。薇依不接受任何固体食物，她也不喝牛奶。于是就给她半流质。她吃下的那丁点儿东西不足以使她维护尚存的一线生机。即使在昏迷的半意识情状下，她仍是在低声说，她要分担法国人的苦难，她不能吃东西。她越来越虚弱，8月的一天，她对女友苏珊娜说：‘你同我一样，是上帝没有裁剪好的一块料。不

久,我就不再被裁剪了,我将得到修补和完善。”

她已知自己离上帝的日期越来越近。

相信自己临近生命终结,她早已平静下来。她把一份手稿交给苏珊娜,其中一些话,可看出是她的精神遗嘱:

“我信仰上帝,三位一体,化为肉身:赎罪、圣体圣事以及福音书的教诲。”

“站在基督一边,同他同样受难,我觉得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特权,它远胜过站在他右边分享他的荣耀。”

“……我一直认为死亡的时刻是生命的归宿和目的。我过去认为对那些生活如意的人来说,在这一时刻,纯净的、赤裸的、确实的、永恒的真理在瞬间进入灵魂。可以说,我从未渴望过其它的福祉。”

她终于享受到了这一福祉,1943年8月24日,她慢慢离开人间,平静、安祥。

死亡诊断书这样写道:

“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起心脏肌肉的心肌衰竭导致心力衰竭。病故者拒绝进食,迫使自己身亡。……”

她被埋在阿斯福尔新公墓。十五年间,她的墓无碑无铭文,只是墓地跟前的小径一端,盛开着大蔷薇花。虽隐姓埋名符合亡者的意愿,却使众多的崇拜者感情上难以接受。1958

年 薇依家人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块白色花岗石墓碑 ,上面书写 :

西蒙娜·薇依(1909—1943)

一切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二战结束了 ,全世界的人们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主义、流派和哲学思想所吸引所激动。而薇依曾经的存在和她的思想已无声无息了很多年 ,并且不再被人记起。然而却是在喧嚣骚热的今天 ,薇依的思想却犹如一股凉爽的风 ,吹拂在人们的心头。人们开始记起她念叨她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记起她 ,就是开始重新记起那严肃和重要的事物 ,这是不被相对论和虚无主义所击溃的事物。人们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将它弃如敝屣 ,但现在人们却像瑰宝一样将其捡回。但现在 ,我们仅仅是记起了她 ,可是我们中间还有人能成为她吗?恐怕是很难了 ,很少再会有像薇依这样的人重现。也许不久前故去的德兰修女算一个。但她与薇依仍是有很大的区别。她只是一个默默无声去做的人 :照顾垂死的病人 ,为他们洗脚 ,洗身 ,当他们在世上其他人践踏如地底泥的时候 ,还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之人的尊严。德兰修女这样做 :不知多少回在肮脏、污秽的街道拥抱那些患皮肤病、传染病 ,甚至满身脓疮的垂死病人 ,把他们带回自己的住处 ,照顾他们 ,安葬他们。德兰修女去做的 ,薇依也绝对会去做。在做的同时 ,薇依还是一个能够书写成文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她不仅用行动而且用理论给人们以昭示。

我们成不了德兰修女,因为我们害怕那些病人传染了我们,他们一身的脓疮污秽会弄脏我们清洁舒适的客厅。我们当然也成不了薇依,因为我们仅仅关心一己私利,而无法像她那样以博大悲悯情怀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而且人们只想活得更好,薇依的许多行为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

但是,我们现在已开始承认薇依给予的另一种昭示。我们承认她不仅仅是由于她的智性,她作为书写者存在的意义,而是作为一种良知的力量,用爱的方式与人相处。如果你爱,无论你是何等卑微,手中的财富几乎为零,但由于有爱在你那里,你那里就有汲取不尽的宝库。人类需要相互的同情、悲悯与热爱。反之,如果你丧失爱的情感,即使富可敌国则依旧不如乞丐。薇依的一生堪为榜样,当然不是由于她的某种不近情理的执拗与怪戾,比如,倘若她不拒绝进食有营养的食物,不拒绝更好的治疗,她可能会活更长的时间,会写更多的文章,会做更多的好事。但是,她却不会理性地去这么做,这是她必然的宿命的凄惋,不得不为之,是身不由己。她的理解力偏要执拗地囿于这一点:如果祖国人民在淫威之下在挨饿,她的胃口就吃不下东西,如果他们在地狱中煎熬,她就会感到烈火烧身时的灼痛,如果他们将面临死亡,她就会感到无尽的悲怆和彻底的绝望。

她就是这样想的,没有作假,没有矫饰。而且,一个人怎么可能拿自己宝贵的生命作假和矫饰呢?这是她自己的信念,与别人无关,她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做主。人们可以健全、理性,为自己更好地活着,这无可非议,而薇依却是不健全、偏执地死掉。死掉的确是就死掉了,一个人的死完全无碍于日

月星辰的运转。但是,活着的我们,真的能够对薇依所曾做过的一切熟视无睹、寡漠淡然?她在那里,多少年虽然碑铭皆无,但她立在人们良心的深处,反照着我们的渺小,我们太过自私和狭窄的灵魂。我们不能不想到人类历史上有这个孱弱单薄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良心的重闸。毕竟她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很多人前去接应。人们不要害怕,要你前去,不是要你像薇依那样苦痛累累,以致殉道而死,其实只是要你、要我们学一些她那样的精神,让我们在适当时候,在不损害自己个人什么利益的条件下,去想一下别人,做些利人之事,这终归不是太困难的。况且,即使从个人角度出发,仅仅关心自己并不能得到完整的幸福,而对别人哪怕有稍稍的一点儿关心,则可能会使我们感觉到充实和快乐。

我们却是什么都做不到,我们还能做到什么呢?你看,在豪华都市的街头,在天桥护栏的旁侧,依旧有伏地乞讨的老人。我们是往他们的碗钵里放枚钱币还是心安理得地扬长而去?是的,有报纸披露,是些乞丐在扰乱和影响着这个城市的市容。这个城市原本可以更秩序更洁净一些,而沿街乞讨者则给这个城市添了麻烦。他们能够靠乞讨为生,就会在这个城市继续呆下去,如果行乞不着,他们就只能无奈地返回自己的家乡。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愿意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日益变好,秩序治安都得到改善,市容市貌更加清爽宜人。但是,我们面对那伸出的布满色斑的黑手该怎么办?拒绝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一是我们拒绝,他们会因乞讨生涯被迫中断而返回,城市游民会少,环境会好些;其二是,所有的饥饿与贫困都该由各级组织和现政府给以解决,个人的道德觉悟与施舍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还有,人啊,为什么低下

你高贵的头颅？乞讨二字，可是拿尊严作了交换，你真的到了完完全全活不下去的地步？



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理智地追问下去，并给自己的拒绝找

到各种开脱的理由。可是,面对伸出的手,给还是不给,我们该怎么办?设想一下如果薇依面对他们她会怎么办?她能把他们一一领回住处,供给他们食物和住宿吗?她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吗?也许,这样的设问本身就是过于理智和健全者所为,薇依不会拿这类问题令自己手足无措。她的一切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她自虐自戕般的与受苦人结盟,都是听从从内里的一道指派,要求她必须如此。我们不该去想很多,诸如去想给是给不完的,面对庞大的行乞队伍,你个人即使钱财散尽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们也许无法做那力不从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在内心同情那些苦难者(这么一些听起来更是虚伪),再就是我们可以周济一下那些急需的人,给眼前的行乞者一二,自己并不会因此破产。这样,你即使只行了小善,起码做到了良心的安宁。至于市容,至于政府如何解决,那都不是你所能管得了的,我于今只是关心我的良心,仅此而已。

但是,薇依所能告诉我们的好像不是这些具体而琐屑的指向——当然包括这一点一滴的日常行为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有人保存。这保存者也许是牺牲者。谁愿意作这种牺牲者呢?发问时大家都噤口无语。但是每个时代肯定会有站出来应答的人,虽然他们将面临不同的难题。这应答的人或被健全者认为是不健全者、是病态的人。但正是他们,为一个时代争取到荣耀,否则,这时代则真是堕入无法洗清的耻辱里了。

附录

一、《耶拿小组的夜莺》

——卡洛琳娜(德国)

参考书目《谢林传》 商务印书馆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勃兰克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塞纳河畔的火凤凰》

——期达尔夫人(法国)

参考书目《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勃兰克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国文学史》 陈振尧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自由与社群》 三联书店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高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三、《哀泣的缪斯》

——阿赫玛托娃(俄罗斯)

参考书目《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布罗茨基著 漓江出版社

《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著 花城出版社

《阿赫玛托娃传》 阿曼达·海特著 东方出版中心

《我不能沉默》 刘文飞编 花城出版社

《白天的星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赴历史之约》

——汉娜·阿伦特(德国)

参考书目《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著 时报出版社

《存在与时间》 海德格尔著 三联书店

五、《道德的暧昧性》

——西蒙·波芙娃(法国)

参考书目《西蒙·波芙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蒙·波芙娃回忆录》(全译本)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六、《疾病与负轭作为信仰之隐喻》

——西蒙娜·薇依(法国)

参考书目《在期待中》 薇依著 三联书店

《信仰与重负》 雅克·卡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见证与愉悦》 布罗茨基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后 记

今天 是三八妇女节。对于女人来说 ,这是自己的节日。饶有意味的是 ,正是在今天 ,我把这部书稿最后写完了。这本书写了历史上的六个女人 ,她们是女界的骄傲。她们是如此的天才和优秀 ,因为她们 ,哪个时代都会变得亲切而感人。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

在日益的物质主义中 ,人们对于楷模的态度似乎在转变 ,变为对着泛表皮盲从。这其实是在自己的价值观念虚弱不堪时 ,人们仍然受事物摆布的非自觉状态。这与人作为动物类灵长的完美造型相距甚远。曾有优秀的分子走在我们前边 ,只是我们的视线已不朝那里逡巡。那里有男人 :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休谟、帕斯卡尔等等 ;也有女人 ,她们以自己的独异构成女人的真实历史 ,如我所写的卡洛琳娜、斯达尔夫人、阿赫玛托娃、汉娜·阿伦特、

波芙娃与薇依 ,当然还有别的女人 ,由于篇幅所限 ,那只能作为另外的书写了。作为同性 ,我更为这些卓萃不凡的女人动容。她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感情 ,出色的想象力 ;有对严肃事物不倦迷恋和对神秘世界探究的热忱 ;她们有机智灵敏的大脑 ,有清醒的判断力 ,也会借助于直觉的天才般的能力达到那应有的高度。没有她们 ,仅仅有优秀男性的客观努力 ,这世界仍不会那么生动、和谐与美妙。她们是些远去的女人 ,而且与我们国别不同。但她们又是我们目光必须追逮的人 ;并且智慧不分国别 ,它本来就是全人类共同的事物。她们是我所喜爱的女人 ,犹如朋友一般。并且我感动于她们也能以观念、语言的力量 ,改变着世界原本芜杂鄙陋粗俗的场景。我写这本书 ,正是自己对既往对她们阅读的一些札记的拾掇整理。

最后应该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感谢万燕小姐为这本书以及为这套丛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艾 云

2000年3月8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赴历史之约/艾云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当代女学人文丛)

ISBN 7 - 80647 - 201 -

I 赴... II .艾...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307 号

书 名：赴历史之约

作 者：艾 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

字 数：

版 次：年 月第 版第 次印刷

定 价：元

ISBN 7 - 80647 - 201 - 0/I·14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